

##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卡梅洛·梅萨-拉戈是美籍古巴人，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和该校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古巴研究》杂志和《古巴研究中心通讯》的编辑。他曾为美国《世界事务》、《共产主义问题》、《经济问题》杂志等刊物撰写过关于古巴问题的文章，并与别人合编了《古巴革命的变革》、《世界上的古巴》和《对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集》等书。

本书围绕着古巴七十年代实行体制改革，对古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古巴当前的国情以及二十年来内外政策的变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作者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在一些问题上，有错误观点。

参加本书部分章节翻译工作的有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外国经济研究组的同志。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错误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献给古巴国内外的代代新人，  
希望他们将来殊途同归。

# 目 录

第一版序言 .....	1
第二版说明 .....	5
第一章 古巴革命的新阶段：七十年代 .....	7
古巴革命的五个阶段(1959—77年) .....	7
1970年以来苏联影响日益加强 .....	18
理想主义屈服于现实主义 .....	39
第二章 经济：现实主义和合理性 .....	45
加强计划机构 .....	45
提高资本效能和管理效率 .....	49
提高劳动生产率 .....	55
同“社会主义通货膨胀”作斗争 .....	59
扩大物质刺激 .....	64
糖业部门合理化 .....	70
放弃过去的错误作法和实行新政策的影响 .....	77
估价和展望 .....	83
第三章 政治与社会：走向体制化 .....	86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政治结构的批评 .....	87
1970年关于改革的诺言 .....	89
政治职能的分立：政府、党和军队 .....	92
工人运动民主化 .....	110
工会的作用：捍卫工人的权利和参与决策 .....	116
小农群众组织的改组 .....	128

青年群众组织的改组 .....	133
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与知识分子 .....	139
苏联式的体制化 .....	148
<b>第四章 对外政策：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道路</b> .....	152
对拉丁美洲实行现实政治 .....	153
与老盟友的冲突 .....	164
美洲国家组织内部的变化 .....	171
美国和古巴和解的条件 .....	176
对话的开始 .....	185
<b>第五章 分析过去，展望未来</b> .....	191
综合分析的尝试 .....	191
对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展望 .....	202

## 图表

表 1 古巴革命最初二十年内五个阶段的特点 (1959—77年) .....	8
表 2 古巴“社会主义通货膨胀”缩减量 (1970—73年) .....	64
表 3 古巴经济的增长(1963—75年) .....	80
表 4 古巴部分产品的实物产量：1960—75年 与1980年指标 .....	82
表 5 1976年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构成 .....	109
表 6 1970年古巴工会选举 .....	113
表 7 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对古巴问题的立场 (1970—75年) .....	176
表 8 1968年年中社会主义制度的静态对比 .....	195
表 9 古巴制度各阶段高峰时期以及与1973年 苏联制度的动态对比 .....	196

## 第一版序言

古巴革命是一种变幻莫测的现象，所以论述这场革命总要冒一点风险；经过几年积累的材料证明似乎是可靠的东西，有时会在几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发生极大变化。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接管古巴十九年以后的今天，至少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革命的进程不是稳步的发展，也不是朝着同一方向发展，而是变幻无常，受到哲学上和政策上的许多变化的影响。古巴革命现在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1959—60年——消灭资本主义制度；1961—63年——仿效改革前的苏联制度，实行社会主义体制；1963—65年——对社会主义体制可供选择的两种制度进行讨论和试验；1966—70年——采用理想主义的中国—格瓦拉主义制度并使之激进化；自1970年以来——回到现实主义和较为合乎传统的改革后的苏联制度。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篇幅叙述和分析古巴革命的前四个阶段（1959—70年），因此本书不再重复我以前写过的东西。它将集中于当前这个阶段，具体说来，就是从1970年年中到1974年年中经过的四年。目前，对这一阶段的著述还很少，大都是报刊文章，只片断地描述这一进程的某些具体侧面，而缺乏全面的、有条理的分析。

我的论点是，古巴革命已经进入成年时期，并且从其错误中吸取教训后，在苏联的影响下，已经变得越来越注重实效，

越来越体制化了。“最高领袖”的权力付托于科学技术专家，政府、党和军队的职能分立，以及党、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恢复活力，这一切正在改变先前凭领袖个人至上和超凡魅力来进行统治的制度。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显然已经结束，不断革命论者和忠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幻想归于破灭。于是，据报道，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校园里，人们对古巴的兴趣显著下降。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不再是苏联的批评者，而是苏联在第三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辩护士。派出远征军建立游击中心，要把安第斯山脉变成南美洲的马埃斯特腊山，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今天，古巴正忙于同尽可能多的拉丁美洲国家达成贸易、外交和反对劫持飞机的协议。超越社会主义这个过渡阶段，通过提高觉悟、实行精神鼓励和劳动动员，在一个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迅速造就“新人”，这种颇具吸引力的、唐·吉珂德式的尝试，已经悄悄地停下来了。今天在古巴所谈论的，是经济刺激、工资等级以及通过运用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和提高资本效能及劳动生产率来建立物质基础等问题。过去曾被萨特<sup>①</sup>倍加赞扬的古巴革命的独特性，已经逐渐减少了，较为一般的“东欧”式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在这个岛国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然而，古巴革命经过无数的对抗和危机之后还是存在下来了。据报道，古巴人认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今后的日子要好些。六十年代那种令人烦恼的动员和禁欲主义的节俭已经减少，现在的生活似乎好过一些了。古巴的领导人 and 官

---

<sup>①</sup>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当代法国作家和哲学家。——译注

僚们不再试图立即解决本大陆的全部问题，而是已经现实地转向内部，以更大的耐心和更为谨慎、理智的态度来对付国内的日常问题。满足衣、食、住等基本需要，仍然是他们面临的最难解决的问题，但是八年来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些改善。然而，新阶段也有消极方面，例如对思想、教育和文化的控制更严了，而且已许诺的工会民主化和工人参与决策的问题还需要在最近的将来加以试验。

为写本书进行研究工作，需要系统地、详尽无遗地查阅古巴的杂志、报纸和电讯稿，查阅1970—73年在古巴的专题报告和科学杂志中发表的大量专门材料。我担任匹兹堡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出版的《古巴研究中心通讯》的编辑，这一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使我能看到自1970年以来由该刊每年分类整理的数以千计的新闻条目。此外，我们通过交换《古巴研究中心通讯》，可以从古巴得到珍贵的统计公报，还可以得到一些技术性报告，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我通常以英文版《格拉玛每周概要》作为古巴领导人讲话的正式英译文。如果该报没有转载这些讲话，或者某一讲话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就依靠古巴的两份日报，《格拉玛报》或者《起义青年报》，并由我自己翻译出来。

本书的一些片断在我以前写的下列文章中发表过：《古巴革命苏联化在西半球产生的后果》，载于《世界事务》第136期（1973年夏季号），第3—35页；《卡斯特罗的内政方针》，载于《共产主义问题》第22期（1973年9—10月号），第27—38页；以及《古巴经济改行苏联的正统做法》，载于《经济问题杂志》第8期（1974年3月号），第41—65页。我感谢这些杂志的

编辑允许我在本书中引用上述文章的材料。我还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爱德华·冈萨雷斯教授，他为第一章提供了材料并提出了意见；拉特格斯大学的洛尔德斯·卡萨尔教授，她把1973年夏天访问古巴时得到的许多印象告诉了我；柏林弗赖恩大学的亨里奇·布鲁纳博士，他严厉地批评了第二章，并把他在1972年末访问古巴时得出的真知灼见告诉了我；新墨西哥大学的纳尔逊·巴尔德斯教授，他为第三章提供了一些材料。当然，书中所写的内容都由我个人负责。本书得以出版，还由于得到了下列各位的大力协助，他们是匹兹堡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的雪莉·克里格、卡罗林·威尔逊和唐娜·博宾，原稿曾由她们多次编辑、打字；匹兹堡大学的拉丁美洲图书编目员爱德华多·洛萨诺，他总是吝惜自己的时间，并以他对古巴图书的了解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的卡尔·莫拉，他鼓励我写成本书，并由他完成了最后的编辑工作。

我最近写的关于古巴的三本书，每一本快完成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儿降生。这一次生的是海伦尼塔。她同伊丽莎白和英格里德，还有我那永远快乐的妻子埃琳娜，她们在我写这本书占去的时间里对我充满了爱，这是很可贵的。她们的爱也使我更爱她们，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将此书奉献给她们，作为回报。

卡·梅萨-拉戈

1974年6月于匹兹堡



## 第二版说明

由于本书很受欢迎，在1976年进行了第二次印刷。究竟是在1977年进行第三次印刷，还是根据最新的情况加以修订，出第二版，面对这两种可能性，我选择了后者。理由是自1974年年中以来，在古巴国内和古巴的对外政策方面都发生了若干重大的事件：召开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75年）；制定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76年）；建立和扩大人民政权机关（1974—76年）；彻底改组政府结构（1976—77年）；食糖生产带来经济繁荣（1974—75年）；后来又出现经济衰退（1976—77年）；实行1976—80年五年计划和“经济管理制度”，美洲国家组织决定不阻止其成员国同古巴重建贸易和外交关系（1975年）；古巴对安哥拉进行军事干涉取得成功（1975—76年）；以及美国同古巴直接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1977年）。

我在本书第一版序言的开头就强调过，论述古巴革命并预言未来的发展是要冒风险的。我在第一版中所作的某些预言证明是错了，但是总的说来，我认为我所作的分析仍然是正确的，我所看到的趋势也是异常准确的。

近三年来，尽管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未能实现的一个个人愿望，是回到我的祖国古巴去进行实地调查。在我写完本书第一版的时候，古巴政府曾通过驻联合国使团通知我，同意

发给我签证，可以于 1974 年 9 月在古巴停留三星期。然而，在我启程前一星期又通知我签证业已吊销。自那时以来，他们几次告诉我访问古巴的可能性并未排除，但要等待较好的气氛。在此期间，许多具有不同思想色彩的美国社会科学家获准进入这个岛国，美国和古巴关系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我的愿望仍然是能在最近的将来获准进入古巴，亲自核对我在美国通过十五年以上的研究工作得出的许多看法和分析。

卡·梅萨-拉戈

1977年10月于英国牛津

# 第一章 古巴革命的新阶段： 七十年代

自从1959年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起义取得胜利以来，古巴革命经历了五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七十年代，苏联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通过人员和机构间的渠道，一直在扩大对古巴的影响。

表1对1959—77年期间古巴革命的五个阶段中各阶段主要特点作了简要而全面的介绍。下面章节将不再一一考察所有这些特点，而是要集中讨论那些引起变化并标志着各个不同阶段的各种思潮。<sup>①</sup>

## 古巴革命的五阶段(1959—77年)

古巴革命的第一阶段(1959—60年)缺乏一个明确的思想体系，但存在着几种倾向，有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倾向，有人民党的倾向，有取消市场的倾向，有消费主义倾向，有民族主义倾向。新的革命领导人对革命前最有影响的压力集团，即军队、政党、工会、私有农民和各专业协会，有计划地加以取缔或控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组织由大力支持革命的新

---

<sup>①</sup> 关于1959—70年各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详情，参阅卡梅洛·梅萨-拉戈写的《古巴的革命变革》(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71年)。

表1 古巴革命最初二十年内五个阶段的特点 (1959—77年)

特点	废除革命前的 种制度 1959—60年	试图采用苏联体制 1961—63年	关于体制选择的辨 论和试验 1963—66年	采用中国—葡瓦拉 体制并使之激进化 1966—70年	回到现实主义和苏 联体制 1970—77年
发展策略	工业化, 反对倚重 食糖	同上; 食糖产量锐 减, 工业发展延迟	回到食糖生产, 重 工业化延期	重点放在食糖生 产, 1970年达到顶 点, 收成创纪录, 但 指标未完成, 其他 经济部门产量下降	降低食糖的比重; 指标定在可以达到 而不影响其他部门 的水平
生产资料 所有制	1960年后期集体化 加紧进行; 农业例 外, 私人农场和合 作社占优势	1962年农业合作 社改为国营农场; 1963年私人农户籍 减, 并为私有农民 划定收购定额	无重大变化	1968年在“革命攻 势”期间实现国家 所有制 (1/3农业 除外)	强制私有农民扩大 向国家出售农产 品, 并为国家工作
计划模式	经济紊乱, 缺乏控 制, 市场逐渐缩小	试图借助于苏联和 捷克斯洛伐克的技 术人员实行高度集 中的有形的具体计 划	发展策略的改变与 集中计划产生的回 题, 引起非集中化 方法的试行	长期的集中的“巨 型”计划代之以短 期的分散的“微型” (部门的)计划	借助于计算机技术 回到长期的集中计 划

续表 1

筹措资金方式	私营方式(迅速衰减)与预算方式(在国营部门)的混合	主要是预算方式,但存在资本效能问题	1/3 的国营企业试行自筹资金,特别是在农业和外贸方面	预算方式贯穿整个经济,私人农场除外	逐渐回到自筹资金
消费和资本积累	重点在消费(增加工资,提供免费的社会服务);资本积累锐减	限制个人消费,1962年开始实行定量供应;恢复革命前的投资率	继续强调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逐步上升,1968年达到顶点;但由于资本的分配和使用不当,造成大量的投资浪费	有节制的减少资本积累,增加消费,强调资本效能
刺激和平均主义	物质刺激,主要属个人性质,缩小极端不平等现象	减少个人的物质刺激,强调集体刺激(大部分是物质的);定量供应起到平均分配的作用	有限度地试行个人物质刺激,如工资差别、实物奖励、生产奖金	急剧减少个人物质刺激;大力强调精神鼓励和平均主义,以造就无私的“新人”	前一阶段过分强调精神鼓励和平均主义受到批评;回到个人物质刺激
选择管理人員的标准	有异心的管理人員和技术人員逃往国外或被解雇,由忠诚的但不胜任的革命者接替	试图在古巴或国外——主要在东欧和苏联——训练管理人員	日益强调提高管理技能和技术	反官僚主义运动达到顶点;革命热情比业务专长更为重要	再度强调培训;忠诚而不胜任的管理人員必须学到熟练技能,否则将被解雇

续表 1

就业和劳动生产率	在农业和服务行业扩大就业；劳动生产率停滞	几乎做到充分就业，但大量地是因入没事；劳动生产率降低	试图把剩余劳动力转到农业，并实行苏联的劳动定额和工资等级制度，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劳动定额制度被忽视；劳动生产率降到最低点；工人旷工，使人力不足的现象更为严重	劳动定额重新采用，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旷工减少，一些地区出现失业
财政平衡（通货膨胀）	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和进口；库存枯竭；国际收支逆差扩大	冻结物价，实行定量供应，逐渐扩大到大多数消费品；黑市出现	货币供应量与可买到的消费品之间的不平衡扩大，黑市迅速发展；这对劳动起抑制作用	1970年货币过剩现象差不多等于人口总收入时，不平衡创最高纪录；旷工达到最高纪录	通过提高消费品价格和扩大供应，货币过剩量减少到人口总收入的一半以下
军队和准军事组织	起义军有计划地摧毁旧军队的残余，并在实行土地改革中起决定性作用；1959年下半年建立民兵	武装部队部成立，军队由苏联训练和装备；民兵在击败猪湾入侵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部队日益职业化；1963年实行义务兵役制；收回民兵的武器，民兵的作用下降	军人在党、政和经营管理部門中占最高职位；通过组织劳动队使劳动日益军事化	部队实行新的军衔制，更加专业化，并缩小规模；民兵正逐步被淘汰，劳动队分别并入各机构

续表 1

党的发展	只有几个政治组织允许活动：“七·二六运动”、学生指导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	“革命统一组织”由三个政治组织合并而成，但主要受人民社会党控制；清洗宗派主义，结果由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取代“革命统一组织”，受卡斯特罗分子控制	古巴共产党1965年成立，最高职位掌握在卡斯特罗分子手中；党员甚少，很少举行会议，没有党的纲领	政府和党的职能实际上融合在一起；1968年对“小宗派”（一些前人民社会党党员）发动新的清洗	政府和党的职能分立，党进行了改组，党员有所发展，1975年举行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	1959年开始对工会施加压力，1960年采取了控制措施，保卫革命委员会在1960年建立	工会成了行政机关的“传送带”，1961年私有农民纳入全国小农协会，1962年青年联盟纳入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无重大变化	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追随新的路线，工会实际上被先进工人运动所取代	1971年地方工会进行选举，1973年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小农协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也进行改组
动员的方法	大规模集会支持政府的决定和政策；动员基本上是政治性的	由于人力不足，1962年开始劳动动员（“义务劳动”），帮助收割甘蔗和其他作物	劳动动员增多，但较多地运用尖端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经济上和教育上（提高觉悟）的原因，劳动动员显著增多，1968—70年达到顶点，忽视劳动生产率	劳动动员逐渐减少，只有在劳动生产率事先得到保证的时候，才允许进行义务劳动

续表 1

<p>对教育与文化的控制</p>	<p>虽发生过许多事件和争论，但一般是自由的</p>	<p>关闭私立学校和大学；政府的政策规定：要革命，什么都无，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成立</p>	<p>许多“异端”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被送进劳动营，但这种做法后来得到纠正</p>	<p>要求作家更富于战斗精神；有几名家正式受到部队和政府官员的批评</p>	<p>1971年的文化和教育代表大会提出更为机械的教条主义路线；同外国知识分子发生冲突</p>
<p>同苏联的关系</p>	<p>恢复关系；苏联给予信贷，购买以前美国购买食糖数额之一部分</p>	<p>苏联成了古巴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债权国；苏联技术人员涌入；1962年，由于导弹危机，发生第一次对抗</p>	<p>重新和解；卡斯特罗两次访苏，格瓦拉出走；两国签订1965—70年长期经济和贸易协定</p>	<p>由于意识形态、经济措施和外交出现分歧，苏联减少对石油供应，古巴支持石油清洗前人民社会党成员；古巴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开始重新和解</p>	<p>卡斯特罗四次访问苏联，勃列日涅夫访古巴，两国关系改善；古巴委员点：苏联—古巴委员会成立，古巴进入“经互会”，苏联和古巴签订1973—75和1976—80年长期经济协定</p>
<p>向拉美输出革命</p>	<p>准备很差的远征队失败，缺乏明确的思想 and 战略</p>	<p>古巴被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在西半球陷于孤立；古巴对游击队的支持加强了；同一些共产党发生矛盾</p>	<p>对拉美国家共产党采取妥协态度；一致同意向几个国家输出革命</p>	<p>三大洲会议举行，拉丁美洲团结组织成立；正式接受“游击中心论”为革命的唯一道路；格瓦拉试图在玻利维亚实行这种理论而遭杀害</p>	<p>输出革命实际上结束；通过非游击道路实现革命的主张被接受；同几个拉美国家重建关系</p>



组织机构如起义军、民兵、保卫革命委员会等取而代之。在这个阶段，只有少数几个在起义期间很活跃并已接受卡斯特罗领导的政治组织（如七·二六运动、学生指导委员会）加上革命前的共产党（人民社会党）可以活动。然而，一切重要的事情都由新政府的领导人来决定，他们还动员人们举行大型的政治性集会来表示支持。生产资料集体化正在扩大，市场的作用随之减少。市场的作用之所以没有被计划和中央命令所取代，一部分原因在于没有明确的经济纲领，也由于以前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因有异心而离去，而接替他们工作的人往往是有热情而无技术的革命者。这种情况最后造成的后果是普遍的经济失调。然而，领导人却坚决要致力于扩大就业和提高人口中收入低的各阶层的生活水平。这个目标是达到了，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大幅度削减资本积累，而这又转过来影响其他目标的实现，如通过迅速工业化和农业的多种经营来改变只生产食糖这种单一经营的作法。古巴革命是一场强烈的民族主义的革命，它与美国的利益相对抗，而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重建了外交关系并扩大了贸易。由于大陆上存在着团结一致的精神，加上缺乏深思熟虑的战略，于是就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徒劳无益的事，想以此来促进拉丁美洲的革命。

1961年初宣布信仰社会主义以后，开始了第二阶段（1961—63年）。在这个阶段中，古巴企图机械地照搬当时通行于苏联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组织和发展体制。允许活动的几个革命组织合并为“革命统一组织”，后来改为“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即后来的共产党的萌芽。市场的真空状态打算通过集中

的计划制度和苏联的技术援助来填补。重点放在训练管理人员上，工会则变成了传送中央机关命令的渠道。抱着加速工业化进程并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希望，开始削减消费以增加投资。就在这个阶段，古巴击败了美国发动的猪湾入侵，在西半球几乎陷于孤立，更为卖力地输出革命，同时更加靠拢苏联。苏联和美国在1962年导弹危机问题上达成谅解，突然动摇了这种热呼关系，因为古巴官方的看法认为，苏联后退了，而且由于没有同古巴商议，问题就更加严重。计划和发展策略方面的失败，使此刻抱怀疑态度的古巴领导人对苏联体制是否有普遍意义以及对一个岛国的种植园经济是否适用提出了疑义。至此，古巴革命进入了第三阶段（1963—6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围绕组织体制与发展策略的抉择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辩论。<sup>①</sup>

在这场辩论中，受毛的“大跃进”体制影响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及其拥护者主张采取理想主义的思想路线（背离六十年代较为合乎传统的苏联思想），提出了三项主要目标。第一是完全消灭市场或“商品生产”，其办法是：实行生产资料全盘集体化，采用高度集中的并配有电子计算机的计划系统。中央通过预算拨款为所有国营企业提供资金（这笔拨款不用偿还，不付利息，但企业的全部利润上缴国库），以及逐步

---

<sup>①</sup> 关于1963—66年的辩论，参阅伯特伦·西尔弗曼：《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大辩论》（纽约，学者协会，1971年）；罗伯特·M·伯纳多：《古巴精神鼓励的理论》（亚拉巴马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71年），以及作者的文章：《古巴关于物质刺激与精神鼓励争论中的思想、政治和经济因素》，载于《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1972年第14期，第49—111页；《革命道德？》，载于《社会》，1972年第9期，第70—76页。

消灭货币和“物质刺激”。第一步行动要取得成效，还必须同时造就无私的、勇于自我牺牲的、艰苦朴素的、充分社会化的、平均主义的“新人”。通过教育、动员、义务劳动和“精神鼓励”（如奖旗、奖章以及国家提供的免费的社会服务等）去提高群众的觉悟，就可以达到造就“新人”的目标。而这些措施反过来又有利于积累资本和发展经济的进程。第三个目标是将古巴革命模式输出到拉丁美洲。极力主张采取这种行动，是出于这样的前提，即大陆的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在古巴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建立农村游击中心被认为是引起这种革命的唯一途径。格瓦拉派公开批评苏联，因为按照他们的标准，苏联的内外政策跟社会主义应有的政策不相符合。他们赞成不断革命的原则，厌恶体制化，不详细说明党应起的作用，而且宣布工会是不必要的。

同格瓦拉对立的是一个稳健的注重实效的集团，这个集团以经济学家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为首，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前的共产党（人民社会党）亲苏的党员。这个集团在（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大事宣扬并进行试验，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有节制地推行的）利别尔曼主义的影响下，提出了三项不同的主张。一是中央的计划也应建立在控制论和“投入—产出”技术的基础上，但企业一级要有某些自治权，并局部利用市场结构的作用。他们反对预算的方法，在大约三分之一的国营企业中实行自筹资金。这些企业从中央银行接受贷款，使用贷款要付利息，而且必须归还；企业则可以保留相当一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和扩大生产。这个集团的第二个目标是经济上的体制化。这种体制化的基础是有效率的机构，通

过苏联式的劳动定额制度以及物质刺激(如工资差别、超额奖金、加班费、实物奖励)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这个集团还主张有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和苏联式的工会,同苏联保持紧密的联系,以及古巴在同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方面应有较大的灵活性。

在四年中,卡斯特罗避免公开参加论战,但却巧妙地把这两个对立集团的领导人免去职务或派遣出国。前进道路上的潜在对手既已清除,他就开始了革命的第四阶段(1966年年中—70年年中),支持中国—格瓦拉主义,尽管这个主义是以卡斯特罗个人至上的特色装饰起来的。例如,经济方面的重大决定,不是集中在一个“科学的和客观的”中央计划机构里,而是由总理及其忠诚分子组成的核心集团作出,并通过“微型”的或部门的计划来付诸实施。在强调资本积累、动员、精神鼓励、平均主义和取消货币等方面,比格瓦拉的计划更为严重。为以后几年规定的产量指标非常之高,其中1970年糖季的指标是一千万吨。军队的影响大大增加,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党则处于停滞状态。(1965年古巴共产党成立,虽然它仍处于苏联的影响下,但是受卡斯特罗分子的控制)。在此期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进行战斗,要把安第斯山脉变为拉丁美洲的马埃斯特腊山;卡斯特罗谴责苏联限制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并监禁了一批人民社会党领导人(“小宗派”),据说是由于他们从事反政府活动,这样,古巴和苏联关系就达到了最低潮。在1968年春发动的“革命攻势”(某些方面类似中国的文化革命),使激进化运动达到顶点,在这个“革命攻势”下,对残存的私有成分实行了国有化,加强了动员,以牺牲消费为代

价的资本积累创造了纪录。古巴当时声称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所有制、觉悟的提高以及平均分配方面都走在苏联前头。国内和国外两条战线的失败（古巴经济恶化，格瓦拉死在玻利维亚）迫使古巴重新考虑以前的某些政策，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则为古巴提供了大好机会。

卡斯特罗对这次入侵的支持，尽管是有保留的，但却促进了古巴和苏联关系的逐步改善。这种和解，加之认识到大陆革命暂时是不可能的，是对拉美采取较少理想主义、较多妥协的外交政策的关键。从此以后，其他革命变革的道路（除游击中心的道路外），如和平选举和军事政变，也是可以接受的了。输出革命和对外国革命团体的援助都减少了。虽然革命政策对国外变得日益温和，但在国内，则继续推行中国—格瓦拉主义，为1970年的糖季生产加紧进行大规模动员。苏联领导人有准确的情报，知道这个指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他们没有阻挠卡斯特罗执行既定的策略。大概在古巴外交政策上的得益，当时对他们来说已是不小的收获，倘若对内政施加压力，就可能再次发生摩擦。这次糖季生产最后创造了八百五十万吨的纪录，然而没有达到一千万吨的指标，而且是以非糖业部门的生产锐减，整个经济脱节为代价的。结果，中国—格瓦拉主义的模式遭到致命的打击，卡斯特罗的威信和实力受到损害，苏联则增加了讨价还价的力量。

1970年年中以来，苏联在古巴的影响大为增加，形成了有如下特点的古巴革命的第五阶段。<sup>①</sup> 对外方面，古巴比任何

---

<sup>①</sup> 关于古巴革命这一新阶段，参阅夏尔·瓦纳克，《古巴：从空想到现实》，

时候都更靠拢苏联，成为苏联在第三世界反对来自比较革命的左派立场的批评的主要辩护士，并同十几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同的拉美国家重新建立外交和(或)贸易关系。在国内，出现了一个体制化进程，其特点是：从原先几乎具有无限权力的卡斯特罗手里实行分权，加强共产党，军队专业化，以及重新组织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与此同时，加紧了对思想、教育和文化的集中控制。在经济方面，承认过去的政策偏于理想主义，必须采取一个比较现实的、合乎传统的方法。新政策包括加强中央计划机构，比较合理地利用资本和人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物质刺激，大量减少劳动动员，以及制定现实的生产指标(特别在食糖方面)。

### 1970 年以来苏联影响日益加强

大多数古巴问题专家，不论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如何，都认为自从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特别是 1970 年以来，苏联已在古巴事务中起着日益

---

载于《世界报》，1971 年 3 月 17 日—20 日；夏尔·贝特兰：《按照苏联路线进行的古巴革命》，载于《世界报》，1971 年 5 月 12 日；雅克·瓦利埃：《古巴 1968—71 年：官僚主义畸形发展和经济困难》，载于《评论与政治经济学》，1972 年第 6 期；《古巴：从教条到实际？》，载于《波尔沙评论》，(伦敦) 1972 年 4 月；《古巴：新现实主义》，载于《拉丁美洲》周刊，(伦敦) 1972 年 5 月 19 日；爱德华·冈萨雷斯：《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领袖超凡魅力的限度》(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74 年)，第 217—236 页；安德烈斯·苏亚雷斯：《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政治：古巴是怎样的社会主义？》(1973 年 9 月在新奥尔良美洲政治学协会会议上的讲话)；《古巴：革命在前进》，载于《拉丁美洲展望》，第 2 期(1975 年增刊)；纳尔逊·巴尔德斯：《古巴革命与体制化》，载于《古巴研究》，1976 年第 6 期，第 1—37 页，以及同期刊载的题为《古巴：革命的体制化》的文章。

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苏联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对古巴的控制。卡斯特罗已把大部分经济权力授予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总统（苏联人信得过的一个稳健派人物）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主要经济学家，计划制订人，前人民社会党党员，现在掌管对外关系）。总理似乎已把他的精力转移到国外。从1971年底到1977年底，他总共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在国外游历。通过一个政府间的古巴苏联委员会（古巴方面由罗德里格斯控制），苏联对给予这个岛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使用，如何进行监督，已经建立了制度。一大批新的苏联技术人员涌进了古巴，主管苏联援建工厂的本国人员正在苏联接受培训。随着古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古巴的经济及其计划已被进一步纳入苏联集团。两国在贸易、技术援助、债务偿还、信贷、计划、卫星通讯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签订和发表了一系列的协定和联合公报。

1970年12月，罗德里格斯率领一个古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以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伊巴科夫为首的苏联经济学家小组举行会谈。通过会谈，建立了古巴—苏联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1971年2月，古巴和苏联1965—70年长期贸易与支付协定临时延期到1975年。<sup>②</sup>

---

<sup>①</sup> 参阅K·S·卡罗尔：《执政的游击队：古巴革命的进程》（纽约，希尔—王氏出版社，1970年）；爱德华·冈萨雷斯：《同苏联的关系》，载于梅萨—拉戈主编的《古巴的革命变革》，第81—104页；夏尔·贝特兰：《按照苏联路线进行的古巴革命》；里昂·库尔和朱利安·温克尔：《古巴的新靠山》，载于《共产主义问题》，1972年第21期，第68—79页。

<sup>②</sup> 莫斯科广播电台1970年12月9日和1971年2月22日广播；古巴报纸没有报道贸易协定延长期限的消息。

永久性的贸易协定推迟到这个委员会审慎地研究了局势之后才签订。为了完成这个委员会在组织方面的基本的具体事项，巴伊巴科夫在4、5月份访问了古巴，古巴外长劳尔·罗亚在1971年6月去莫斯科。罗亚的代表团(包括中央银行行长和外贸部长)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葛罗米柯。<sup>①</sup>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71年9月初在哈瓦那举行。苏联代表团团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弗拉吉米尔·诺维科夫，成员包括外贸、海运、农业与工业机械制造、电力、民航等各部的高级官员和苏联驻哈瓦那大使。古巴代表团由罗德里格斯任团长(他主持了会议)，成员包括中央计划委员会，外贸、海运、基础工业、矿业冶金燃料等部的高级官员，以及农业机械化与发展、渔业、电力、航空等国家机构的高级官员，还有古巴驻莫斯科大使。罗德里格斯致开幕词，他赞扬了苏联对古巴革命的诞生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古巴革命的支持。诺维科夫以同样的方式报告说，苏联和古巴贸易1970年比1969年增加了60%，每年超过十亿卢布(每天约三百万美元)；他还强调苏联的石油、钢铁、机械对这个岛国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并列举了苏联援建的各种工厂，以及七十八家糖厂(超过现有糖厂的一半)的修理工作。<sup>②</sup>

会议议程包括：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体系来训练古巴人员管理苏联建造的工厂；古巴方面提出报告，说明为1970年

---

<sup>①</sup>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5月2日和16日，第12版和第20版，以及6月27日，第1版。

<sup>②</sup> 《古巴—苏联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9月12日，第7版。



糖季动员而拖延了的苏联援建的一座发电厂和两座化肥厂工程而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在收割甘蔗机械化、扩大发电能力和在古巴建立制药工业等方面将来同苏联合作的可能性。卡斯特罗总理参加了协议的签字仪式，但异乎寻常地一言不发。在官方发表的照片中，他站在正在签署文件的罗德里格斯的后面。罗德里格斯感谢苏联代表“为组织和更好地利用苏联援助而作的努力”。在议定书中，古巴人同意加快苏联轮船在古巴港口的装卸工作，加快苏联援建工厂的工程进度，并把以后领导这些工厂的技术人员派到苏联去。苏联答应送给古巴一台由两国工程师共同设计的新的 KTP—1 型甘蔗收割机，并为古巴准备自行大规模制造“解放者”型和“亨德森”型收割机提供技术援助。1972 年糖季，将在苏联专家的监督下对两种机械进行试验。关于新的发电厂和制药厂方面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sup>①</sup> 诺维科夫回到莫斯科以后宣布，委员会还回顾了 1969—71 年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sup>②</sup>

1971 年 10 月底，阿列克塞·柯西金总理访问古巴。他曾在 1967 年 6 月同约翰逊总统举行葛拉斯堡罗会谈后，返回莫斯科的途中路经哈瓦那。当时正是苏联和古巴关系恶化的时候，这位大人物遭到官方冷淡的接待，古巴报纸也没有怎么报道。他的第二次访问则大不相同，搞得非常热闹，报纸几乎全部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柯西金同卡斯特罗兄弟、多尔蒂科斯总统，当然还有罗德里格斯进行了会谈。与卡斯特罗会晤

<sup>①</sup> 《诺维科夫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签署古巴和苏联合作议定书》（小标题：《卡斯特罗总理出席签字仪式》），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 年 9 月 19 日，第 3 版。

<sup>②</sup> 莫斯科广播电台 1971 年 9 月 25 日广播。

时，双方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地热起来了，苏联总理说，“我们不失时机地同菲德尔同志会晤……不仅在这次会议上，而且在其他问题上，我们同他很快地取得了谅解。”卡斯特罗回答说，“表达我们对苏联巨大援助的感谢，一个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苏联设备的作用，很好地利用这些设备，保持其正常运转。”<sup>①</sup>两国总理签署了一项公报，强调在加强两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方面达成了“圆满的相互谅解”。在这个文件中，卡斯特罗完全赞同苏联的外交政策，而柯西金则谴责美国“非法占领”关塔那摩基地，并邀请卡斯特罗访问苏联。<sup>②</sup>

1971年11月，卡斯特罗部分地承担了过去古巴同苏联冲突的责任；一个月之后，多尔蒂科斯在莫斯科承认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两国之间的摩擦一经消除，柯西金就在莫斯科宣布，签订1972—75年贸易协定的会谈已经开始，这项协定将替代过去曾经临时延长的1965—70年的旧协定。<sup>③</sup>（当时，这个旧协定正使古巴经济遭受损害：1972年国际糖价高于苏联给古巴的每磅六点一一美分。1971年12月，苏联以每磅七点一四美分从古巴的主要敌人巴西购买了二十七万吨食糖。）<sup>④</sup>

---

① 《在阿拉马拉区的讲话》，古巴无线电广播委员会，1971年10月27日广播；另参阅《格拉玛报》，1971年10月25—30日，第1版，（10月27日第1—3版。）

② 《苏联和古巴联合声明》，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1月7日，第1版。

③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1月9日，第10版。

④ 参阅马塞尔·尼德尔冈，《菲·卡斯特罗先生最近的旅行证实他站在苏联一边》，载于《外交世界》，1972年8月；《巴西：向古巴提出糖的挑战》，载于《拉丁美洲》周刊，1972年第2期，第9—10页；以及《不稳定的食糖市场》，载于《进步》，1972年8月，第35—76页。

古巴脱离中国—格瓦拉主义而倒向苏联人一边到了什么程度，这在古巴报纸对待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访问莫斯科、华沙问题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古巴的报纸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报道巧妙地批评了中国。在一期党报《格拉玛报》中，头版分成两部分：上半版登的是美国轰炸越南的新闻和照片，下半版登的是尼克松同毛和周恩来握手的照片。该报还摘要转载了尼克松和周的友好的祝酒词，最后一版整版刊登了精心选择的加有讽刺评注的令人尴尬的照片。<sup>①</sup>与此相反，关于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和华沙，则采用了塔斯社的消息，尽管很短，却是据实报道，也没有登在显著位置，更没有作什么估价或评论。<sup>②</sup>

古巴—苏联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是1972年4月10日至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但有关会议的消息不多。罗德里格斯任古巴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主持会议。两国代表团的组成同第一次会议大致相同。在这次会议中，讨论了甘蔗收割的机械化问题，可能对在1972年糖季进行的各种型号甘蔗收割机的试验结果作了鉴定。苏联在6月份宣布，将把一套苏联人

---

<sup>①</sup> 《尼克松—毛亲切会见》、《周一尼克松的友好会谈》、《纸老虎在北京发表甜蜜的演说》，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2月27日，第1、7、12版。同上，1972年3月5日，第1、12版。1974年1月，新华社将古巴排除在有资格受到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拉丁美洲国家之外（提到的国家有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这时中国和古巴的关系达到了低潮。

<sup>②</sup> 《尼克松启程赴苏联》，载于《格拉玛报》，1972年5月17日，第5版；《尼克松抵达莫斯科》，同上，5月23日，第6版；《尼克松在莫斯科的活动》，同上，5月24日，第5版；《尼克松抵华沙》，载于《格拉玛报》，6月1日，第6版；《尼克松结束在波兰的访问》，同上，6月2日，第7版。《格拉玛每周概要》没有登载关于这次访问的消息。

资助的制造 KPT-1 型收割机的工厂设备送往古巴，这是很说明问题的。委员会还一致决定供给古巴一台电子计算机以促进经济计划工作，这就加强了罗德里格斯的地位，他主张建立一个技术水平更高的、强有力的中央计划机构。（在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同时，两国的中央计划委员会，即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古巴中央计划委员会的代表也在讨论计划方面的合作问题。）会上讨论的其他题目是：港口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装卸苏联轮船的效率不高的问题曾在第一次会议上讨论过）、民航、灌溉、水力发电能力、制药工业、教育、通讯等等。罗德里格斯授予诺维科夫古巴科学院勋章，会见了柯西金，后来就到柏林去了。<sup>①</sup>

虽然军事援助问题没有包括在委员会的两项协定之内，但 1972 年发生的事情已表明这个问题是列入了议程的。1 月初，古巴海军接受了几只装备导弹的快艇，使它的导弹和防空装备增加了一倍。<sup>②</sup> 4 月份，空军又接受了一队技术上最先进的苏联米格-23 飞机。古巴原来只有米格-15、米格-17、米格-19、米格-21，现在也现代化了。由季米特里·克鲁茨金中将率领的一个包括数百名苏联军事专家的小组曾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训练古巴人员使用这些装备。赠送飞机的仪式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克鲁茨金在会上致开幕词，接着，苏联驻古

---

<sup>①</sup> 《古巴和苏联在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签署议定书》，载于《格拉玛报》，1972 年 4 月 17 日，第 6 版。另参阅 A·沃洛诺夫：《苏联和古巴合作进入新阶段》，载于《国际生活》（莫斯科），1972 年 9 月，第 81 页。

<sup>②</sup> 劳尔·卡斯特罗：《在庆祝革命海军节海军阅兵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 年 8 月 13 日，第 5 版。

巴大使尼基塔·图卢别耶夫发表讲话。武装部队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致闭幕词，他说，军事援助是苏联信任的明证。<sup>①</sup>

1972年5月，卡斯特罗开始了非洲和东欧之行，此次出访历时六十三天（5月2日—7月6日），超过他先前出国访问时间的总和。启程之前，这位总理说：“仅仅在几年前，考虑到帝国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考虑到他们的种种威胁，我们当中谁都梦想不到会在国外呆得太久，幸而现在情况不同了。”<sup>②</sup>卡斯特罗不再害怕美国可能直接入侵或策动入侵了。然而他担心苏联致力于跟美国搞缓和，尼克松决定封锁北越港口并使对北越的轰炸逐步升级都没有妨碍他对莫斯科的访问，就表明了这一点。或许正是尼克松要进行这次访问的消息促成了卡斯特罗的东欧之行。按卡斯特罗的想法，古巴和越南处境相同，因而，他在东欧的讲话大部分是攻击美国，保证和越南人团结在一起。卡斯特罗到达波兰时，尼克松刚刚离开。卡斯特罗在讲话中指出，古巴没有参加任何安全条约和军事同盟（这很明显是指华沙条约），而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他显然是企图在到达莫斯科之前对苏联人施加压力。

针对这样的策略，勃列日涅夫以漂亮的言词作了回答。他谴责了美国封锁和轰炸北越以及美国占领古巴关塔那摩基地。他向卡斯特罗保证：和平共处的政策不会削弱意识形态

---

① 起义军电台 1972 年 4 月 18 日广播；另参阅《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 年 4 月 23 日，第 2 版。

② 菲·卡斯特罗：《在五一节游行和工人集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 年 5 月 7 日，第 5 版。有关这次访问的消息来自《格拉玛每周概要》5—7 月各期和古巴广播电台；另参阅《非德尔卡斯特罗之行》，载于《古巴国际》，1972 年第 4 期，第 4—71 页。

的斗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对抗将会变得更加尖锐，而不会缓和下来；各个社会主义小国将受到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保护和平等对待。卡斯特罗显然感到满意，他说，十二年来，美国一直对古巴施加压力，要它断绝同苏联的关系，但两国的关系反而加强了，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古巴对苏联的信任也加强了。接着，他保证古巴永不接受“机会主义、中立主义、修正主义、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不知他这番话是否暴露了他下意识地希望苏联不要搞这样的鬼名堂。

除了对苏联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表示忧虑之外，卡斯特罗这次旅行还明显地表现出他对其他国家采取了新的、比较妥协的态度。本·贝拉支持过卡斯特罗，卡斯特罗也支持过本·贝拉。四、五年前当布迈丁推翻本·贝拉的时候，古巴报纸曾强烈地抨击了布迈丁。然而卡斯特罗这次长时间的访问一开始就在阿尔及利亚逗留了九天，同他后来在苏联逗留的时间一样长。（九天在阿尔及利亚，接着六天在革命的几内亚，一天在没有什么变化的塞拉利昂。）<sup>①</sup>卡斯特罗早先曾经根据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反苏情绪来区分敌友，因而几年前，罗马尼亚深受他的尊重。现在，他在每一个东欧国家停留多久，都明确地同它们的正统观念和对莫斯科的友好态度联系起来。在苏联九天，东德和保加利亚八天，波兰和匈牙利七天，捷克斯洛伐克五天，罗马尼亚四天。

罗德里格斯代替胡安·阿尔梅达少校参加了卡斯特罗旅

---

<sup>①</sup> 此处有误。1972年卡斯特罗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几内亚，而不是阿尔及利亚。——译注

行中访问东欧的这一段。阿尔梅达是个黑人，在访问非洲期间让他参加是有好处的。（古巴代表团中一些在意识形态上不受苏联欢迎的成员也都回哈瓦那去了。）古巴和东欧的新闻机构都把罗德里格斯列为古巴代表团的第二号人物。他在访问好几个国家时被授予勋章，而且在莫斯科，罗德里格斯、卡斯特罗、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进行了单独会晤。罗德里格斯参加重要会谈的照片经常可以看到，他显然是在处理重大事情。卡斯特罗在访问期间，尽一切可能树立他自己的形象。他遵守自己不习惯的各种礼节，如系上领带在保加利亚接受季米特洛夫勋章，在莫斯科接受列宁勋章，在布拉格查尔斯大学举行的授予他名誉博士的仪式上带上方帽穿上长服。另一方面，他扮演自己所熟悉的人民党党员、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角色，访问几十个工厂和农场，有的甚至在偏僻地区。他还同保加利亚人一起踢足球，和波兰人打篮球，并经常与居民混在一起。卡斯特罗原定用三周访问苏联，但只呆了九天。当要离开苏联的时候，这位总理说，1973年或1974年他将再次来苏联进行“一次较长时间的非正式访问”。卡斯特罗离开后，罗德里格斯在莫斯科又继续停留了几天，以准备一项重要声明。

在1972年7月11日“经互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罗德里格斯正式提出古巴加入“经互会”的要求，八个成员国一致表示接受。<sup>①</sup>罗德里格斯答应“永远”消除古巴对社会主义阵营

---

<sup>①</sup> “经互会”在古巴进入以前，是由卡斯特罗访问的七个东欧国家加上蒙古组成。观察员有古巴、北朝鲜、北越和南斯拉夫。1962年阿尔巴尼亚被排除出去。中国从未参加过“经互会”，也未派过观察员。

食糖供应的不稳定状态，要求“经互会”支持古巴发展镍工业和蔗渣副产品，要求加入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间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委员会。柯西金接着指出，古巴经济上的需要应该由“经互会”成员国在1976—80年计划中加以协调。<sup>①</sup>

卡斯特罗出国之前，在西方有这样的印象，不论是他还是苏联的领导人都不急于使古巴加入“经互会”。<sup>②</sup>采取了这个步骤之后，据推测，让古巴加入“经互会”可能是苏联的一个让步，即向卡斯特罗保证，莫斯科改善同华盛顿的关系不会有害于这个遥远的加勒比海岛国。<sup>③</sup>如果真的如此，而且得到这样一种“让步”对卡斯特罗是有好处的，那么他为什么不在莫斯科多呆五天亲自提出要求呢？可能他期望的是允许古巴加入华沙条约，但这对苏联人来说是有过份的要求，因为这样势必危及他们跟美国之间脆弱的新的缓和。古巴进入“经互会”给这个岛国将带来什么重大的好处，是值得怀疑的；相反，现在由于要同七个东欧国家（还有蒙古！）互相协作，其结果可能是古巴的经济计划的灵活性就更少了。就个人来讲，这个步骤将进一步削弱卡斯特罗在经济方面的权力，而加强罗德里格斯在这方面的权力。另一方面，这可能对苏联是有利的。既然苏联控制着“经互会”，它就可以力图把古巴的经济负担较

---

① 卡·拉·罗德里格斯：《在经互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7月23日，第10版。

② 可参考利昂·库尔和朱利安·温克尔的意见：《古巴的新靠山》，载于《共产主义问题》，1972年第21期，第77页，该文发表于古巴进入“经互会”前三个月。

③ 参阅西奥多·沙巴德：《古巴成为苏联经济集团的正式成员》，载于《纽约时报》，1972年7月12日，第2版。



平均地分摊到“经互会”成员国身上。苏联人还希望，通过更多的“科学的和可靠的经济合作”，古巴将履行向“经互会”成员国供应食糖的义务。苏联食糖产量为一千万吨，足以满足国内消费和承担向“经互会”一些成员国出口的任务。但苏联甜菜的生产成本很高，而且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这些土地种植其他产量更高价值更大的作物。如果古巴能稳定地向“经互会”供应食糖，苏联就可以降低它的食糖产量并减少出口。再者，苏联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糖厂，通过精炼古巴糖而提高生产效率。苏联的产糖季节和古巴不是同一个季节，因而苏联的糖厂就可以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开工了。<sup>①</sup>

古巴对苏联的依赖在1972年似乎已达到不能后退的地步了。古巴贸易约60%是同苏联人进行的（70%是同“经互会”进行的），大体上和在五十年代同美国贸易的比例一样。<sup>②</sup>古巴经常不能履行它对苏联的食糖出口任务，结果1965—72年食糖累计差额达二千万吨，相当于三个丰收糖季的产量。<sup>③</sup>根据苏联提供的情况，这个岛国1960—70年对苏联的贸易差额累计达到十五亿美元，而古巴关于这一时期的统计数字则超过二十亿美元。<sup>④</sup>由于1971—72年的糖季歉收（1971年烟草也歉收），1972年古巴对苏联贸易差额累计增加到三十亿

<sup>①</sup> 鲍利斯·戈尔巴乔夫：《古巴：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一些问题》，载于《拉丁美洲全景》（莫斯科），1973年8月1日第171期，第10—12页。

<sup>②</sup> 罗德里格斯说，统计数字的相似不适用于经济和政治方面，参见《与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的谈话》，载于《古巴国际》，1971年第3期，第86—91页。

<sup>③</sup> 参阅梅萨-拉戈主编的《古巴的革命变革》中编者写的《经济政策与发展》一章，第301—303页。

<sup>④</sup> 苏联的资料来源：《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手册（1918—66年）》和《1968年

美元。<sup>①</sup> 如果加上每年偿还债务(一亿三千万至一亿五千万美元) 连同利息、运费以及维持苏联技术顾问和军事顾问的费用,那么,古巴 1972 年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可能接近四十亿美元。据报道,古巴国家银行估计,如果古巴与市场经济进行贸易,这笔债款本来可以减少一半。<sup>②</sup> 古巴的商船尽管过去十年内有显著的增加,但只装运了本国贸易量的 7—8%,大部分是由苏联轮船装运的。<sup>③</sup> 到 1971 年,苏联给予古巴的军事援助为十五亿美元,虽然表面上是不收钱的,但苏联取得了对这些装备进行监督的实际控制权。根据哈瓦那外交人士所作的保守的估计,1971 年夏季约有三千名苏联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在古巴。<sup>④</sup> 1973 年约一千五百名将要居于重要职位的古巴人(其中 85% 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苏联受训,这个数字相当于 1961—71 年在苏联学习的全部古巴人的数目。<sup>⑤</sup>

---

苏联对外贸易》,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7 年和 1969 年,第 69 页和第 15 页;《对外贸易》(莫斯科),1970 年第 6 期,第 55 页,和 1971 年第 5 期,第 48 页。古巴资料来源:中央计划委员会 1970 年《统计简报》(哈瓦那,中央计划委员会,1971 年),第 188—191 页;另参阅埃里克·N·巴克拉诺夫:《国际经济关系》一文,载于梅萨-拉戈主编的《古巴的革命变革》,第 258—276 页。

① 1977 年贸易赤字接近五十亿比索。参阅卡梅洛·梅萨-拉戈:《古巴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载于科尔·布莱齐尔和卡梅洛·梅萨-拉戈主编的《世界上的古巴》(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78 年)。

② 库尔和温克尔:《古巴的新靠山》,第 75 页,材料来源不清。

③ 菲·卡斯特罗:《在纪念吉隆滩胜利主要活动仪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 年 5 月 2 日,第 6 版。

④ 马丁·施拉姆:《今日的古巴:党试图恢复经济》,载于《新闻日报》,1971 年 9 月 13 日;库尔和温克尔:《古巴的新靠山》,第 78 页。根据苏联的官方数字,苏联在古巴的技术人员只有一千人。参阅戈尔巴乔夫:《古巴:一些问题》,第 3 页。

⑤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4 年 2 月 17 日,第 11 版。

在六十年代，苏联和古巴之间之所以产生矛盾，有几个原因。古巴常常感到一个大国以新殖民主义态度对待它。两国之间第一次严重的危机发生在1962年，当时苏联（没有跟古巴协商）就答应美国把造成十月危机的导弹撤走。六年之后，卡斯特罗指责“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类似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商业手段，特别谴责苏联限制对古巴的石油供应，以至妨碍了古巴的发展。其他方面的摩擦是由理论上的分歧引起的，因而在1966—68年（中国—格瓦拉主义阶段），卡斯特罗指责苏联人为发展物质基础而忽视思想觉悟和政治认识，并且实行了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经济改革。<sup>①</sup>

这位古巴总理在1972年7月26日的讲话中表露，由于依赖苏联，他是怎样放弃以前批评苏联的立场而后退的。他说，古巴和苏联的关系是“建立在原则和信条的基础之上的”，又说“古巴革命〔及〕其有原则性的政策获得成功”应当归功于苏联，并且是由苏联保证实现的。他报告说，自从他1964年访问苏联以来，苏联在技术、经济、科学、城市各方面取得的进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且说，在发展物质基础的同时，“觉悟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和腐败没有在苏联任何地方取得立足之地，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马克思列宁主义依然存在，〔它〕是苏联人民每日的食粮。”最后，卡斯特罗说，苏联领导对古巴人民怀有“深厚的团结、友爱和尊重的感情”，而古巴人民也因苏联“珍贵的、无私的、革命的友谊而感到骄傲”，“古巴和苏联的经济关系是

---

① 参阅冈萨雷斯：《同苏联的关系》，第82—86页。

最慷慨的、最革命的……这种关系是各国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明天的世界虽然会千变万化，但我们同苏联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我们也将感恩不尽。”<sup>①</sup>

1972年11月，古巴政府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组：权力凌驾在部长会议之上的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会由十个副总理组成，直接掌管经济与行政各部门，每个部门集中几个中央的部和机构。卡斯特罗担任新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仍保留部长会议总理的职位，并保持对几个部和机构的控制，主要是在武装部队和国内安全方面。但是，很明显，他以前的无限权力分出去了一部分。罗德里格斯被任命为掌管对外政策的副总理，控制古巴—苏联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多尔蒂科斯总统掌管中央计划委员会、外贸部、劳工部、国家银行和其他较小的机构。<sup>②</sup>不过，罗德里格斯对外事部门的控制使他在对外贸易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此外，这个部是由马塞洛·费尔南德斯领导的，他是罗德里格斯的经济思想的信徒），同时由于他擅长搞计划，实际上也在控制着中央计划委员会。

古巴—苏联委员会成立，古巴加入“经互会”，古巴的计划机构加强，以及罗德里格斯和其他受苏联信任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影响日益增加，这就使苏联相信：古巴今后会更有效地利用苏联援助，会执行一个比较近乎传统的、合理的经济政策，并且会尽力完成它所承担的出口任务。然而，古巴累积的债务是如此庞大，以致危害到新的经济策略。必须作出重大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十九周年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8月6日，第3—6版。

<sup>②</sup> 《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成立》，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12月3日，第2版。



年以来作出的许多让步终于得到了经济上的报偿，但是这个岛国对苏联的依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重，并且要延续到二十一世纪。

古巴—苏联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1973年2月至3月在哈瓦那举行，以履行在莫斯科签订的新的经济协定。会议由罗德里格斯主持，他在开幕词中对苏联的让步大加赞扬。<sup>①</sup>会议结束后，发生了两件耐人寻味的事。1973年3月13日，罗德里格斯在学生指导委员会攻打总统府十六周年纪念会上致闭幕词。<sup>②</sup>这历来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或学生指导委员会的代表的事。这次委派罗德里格斯致闭幕词，是给人民社会党“昭雪”的象征。1964年，几个人民社会党党员曾被卡斯特罗分子控告，说他们把几名1957年攻打总统府的学生指导委员会成员的躲藏地点泄露给巴蒂斯塔的警察，结果这些成员被警察杀害了。<sup>③</sup>1973年4月，华金·奥尔多基（被控告的前人民社会党党员之一，自1964年以来一直被软禁）因“通敌无据”，未经审讯就获得释放。这是卡斯特罗向苏联作出的两个重大的政治方面的让步，大概是为经济协定付出的代价吧。

1973年，随着东欧一些重要人物对古巴进行正式访问，古巴同东欧的关系更进一步加强了。4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听到了卡斯特罗的赞扬，赞扬

---

① 《古巴—苏联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3月4日，第3版。

② 参阅《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3月25日，第4—5版。

③ 参阅哈内特·阿贝尔，《向宗派主义发展的过程》（布宜诺斯艾利斯，由豪尔赫·阿尔瓦雷斯编辑，1965年）。

他的国家在六十年代初期第一个向古巴运送武器，赞扬他的国家向这个岛国出售许多工厂设备。<sup>①</sup>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卡斯特罗曾指责捷克斯洛伐克向古巴出售过时的武器和工厂设备，现在这样说，就是明显地收回当时的指责了。<sup>②</sup>5月，轮到了波兰，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亨·雅布翁斯基和国防部长沃·雅鲁泽尔斯基访问古巴。6月，一个在古巴访问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正式代表团邀请卡斯特罗访问南斯拉夫，卡斯特罗接受了这一邀请。<sup>③</sup>这在五年前当卡斯特罗谴责这个党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铁托主义是右倾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sup>④</sup>8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访问了古巴，并同意为新建一个水泥厂提供六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

1973年9月，卡斯特罗参加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他这次旅行用了两个多星期，因为他对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几内亚、巴格达、新德里、布拉格、

---

①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4月15日，第4版。

② 菲·卡斯特罗：《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分析》，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68年8月25日，第2—3版。

③ 新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1973年6月27日。

④ 菲·卡斯特罗：《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分析》，第3版；《纪念吉隆滩击败美帝国主义七周年的报告》，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68年4月28日，第6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期间，卡斯特罗和铁托举行会谈，开始了古巴和南斯拉夫两国“关系的新阶段”。1974年2月劳尔·卡斯特罗率领古巴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为铁托和共产主义者联盟而欢呼，赞扬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同意扩大两国之间的合作，并邀请铁托访问古巴。参阅《格拉玛每周概要》，1974年3月3日，第10—11版，和1974年3月10日，第11版。1976年2月，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了南斯拉夫。

河内以及越南南方共和在南越控制的地区进行了短暂的访问。<sup>①</sup>在阿尔及尔的讲话中，卡斯特罗反对“两个帝国主义”（美国和苏联）的理论，说这种理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家鼓吹的，得到不结盟国家领导人的随声附和”，因而他们就“从所谓的革命立场出发背叛了国际主义事业”。他提醒与会的人不要忘记苏联“对人类所作的光荣的、英勇的和非凡的贡献”，并把任何对苏联的批评都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虚构一个假敌人〔苏联〕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回避真敌人〔美国〕”。这番讲话造成了会议的分裂，使得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愤怒地打断他的发言，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也予以强烈反击。卡扎菲说：“我们反对古巴出席这个不结盟国家会议。古巴同任何东欧国家毫无区别，或者说，同乌兹别克和苏联本身毫无区别一样。”<sup>②</sup>据报道，此事使东道主布迈丁很为难，也促使古巴很快同以色列断绝关系以讨好阿拉伯国家。古巴报纸只报道了卡斯特的讲话，而没有报道会上发生的事情，既没有发表布迈丁的讲话，也没有公布会议的决议。经济协定在莫斯科签订还不到一年，就产生了优厚的政治报偿：卡斯特罗不仅变得“可靠”了，而且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外国都最坚定地、最无条件地充当苏联的辩护士。这一系列事件以 1974 年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而达到顶点。

这位苏联共产党书记的访问，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商议才实现的。卡斯特罗在 1972 年 7 月和 12 月访问苏联期间，

---

<sup>①</sup> 有关这次访问的报道，参阅《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 年 9 月 15、23、30 日。

<sup>②</sup> 转引自乔治·沃尔斯基：《十五年后的古巴》，载于《现代史》，第 66 期（1974 年），第 13 页。



曾亲自邀请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1973年6月，当这位苏联领导人在美国会见尼克松的时候，古巴人希望勃列日涅夫在返回莫斯科途中能在哈瓦那停留。但他没有这样做，考虑到这样的访问会被美国视为不友好的表示。而在他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宣布已接受卡斯特罗的邀请，在年底访问古巴。12月初，罗德里格斯去莫斯科讨论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的计划，但这位苏联领导人可能担心他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革命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将使美国恼火，又把这次访问推迟到1月底。<sup>①</sup>在前往古巴的飞机离哈瓦那只有一小时航程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还小心翼翼地在飞机上向尼克松总统致意说：“我确信，苏美关系将进一步朝着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有利于国际安全和普遍和平的方向发展。”<sup>②</sup>

古巴准备隆重地接待勃列日涅夫，这是他首次访问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在古巴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最重要的”事件。访问的前一周，古巴的宣传机构广泛地介绍了勃列日涅夫的生平。他到达的当天，《格拉玛报》用第一版整版刊登了这位苏联要人的大幅照片，报头上登有俄文的“欢迎”字样。哈瓦那到处都用古巴和苏联国旗装饰起来。劳工部长宣布，全国放假一天，为了方便这次访问，哈瓦那的交通线路也改变了，古巴人用俄文高呼欢迎。居民被动员去参加机场欢迎仪

---

<sup>①</sup> 《古巴：感伤的历程》，载于《拉丁美洲》周刊（1974年1月4日），第4—5页。

<sup>②</sup> 见1974年1月29日塔斯社的报道和美联社的转播。关于西方对这次访问的报道，参阅《古巴：勃列日涅夫的访问》和《古巴：苏联的观点》，载于《拉丁美洲》周刊（1974年2月1日和8日），第34—36页和第46—47页；《欢迎勃列日涅夫》，载于《时代》，1974年2月11日，第37—38页。

式以后的群众大会，而且还为此目的发行了地图。<sup>①</sup>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抵达、机场的欢迎仪式和群众大会，在苏联通过彩色电视向约一亿七千万观众进行了实况转播。<sup>②</sup>一百万古巴人参加了这次群众大会，人们认为这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壮观的、规模最大的、最不平常的一次集会”。

卡斯特罗在群众大会上致欢迎词时，回顾了革命以来的十五年以及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作了一个重大的让步：第一次承认，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苏联在使古巴避免美国的武装入侵并保证这个岛国的安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他批评了美国，但他间接地支持苏美和解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停止军备竞赛。古巴总理在结束讲话时，反对“假左派”对苏联的攻击，并为其进行辩护，他许诺说：“我们将永远忠于苏联，永远不会对苏联忘恩负义。”<sup>③</sup>勃列日涅夫的讲话首先赞扬古巴人民“已进入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们正“积极地和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讲话

---

① 本章所讨论的这次访问的有关材料，来自1974年1月26日—2月4日的《格拉玛报》和古巴广播。1月29日的《格拉玛报》全部都是关于这次访问的报道。

② 1970年12月，由三十名苏联工程师组成的小组开始修建古巴和苏联之间的双向卫星站。三年后，古巴加入苏联卫星通讯系统，第一次从莫斯科直接转播到哈瓦那的电视节目是1973年11月7日在红场举行的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六周年的阅兵式。1974年1月2日向莫斯科转播了古巴纪念革命十五周年的阅兵式。第三次转播是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规划的最后阶段是两国直接进行电话、电报通讯。这样，古巴就在东欧之前与苏联建立了通讯联系。（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本来要在1974—75年首先同苏联建立卫星通讯联系。）《在古巴的卫星站》，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4年1月20日，第6版。

③ 菲·卡斯特罗：《在欢迎勃列日涅夫同志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报》，1974年1月30日，第2—3版。

的突出点是和平共处。他说，苏联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无疑是走向世界和平的一步，它们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谈到拉丁美洲时，勃列日涅夫说：“苏联认为任何人试图输出反革命都是不能容许的，都是犯罪的行为……。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共产党人并不热衷于输出革命。革命应该在各国的土地上成熟起来。它如何出现，何时出现，采取什么方式方法，那只能是各国人民的事情。”好象这还不足以使古巴人十分明白似的，他结束讲话时说：“在古巴人手中的苏联武器既不应进攻任何人，也不是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工具。它们是用于（古巴国内的）正当的防御事业的。”<sup>①</sup>

在访问结束时，由勃列日涅夫和卡斯特罗签署的古苏公报中，两国宣布对世界事务的意见和立场“完全一致”，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紧密团结，反对任何分裂这个运动的企图（这是间接地指中国）。它们也谴责来自右的或左的修正主义，反对使用武力，并一致认为苏联和美国关系正常化是走向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sup>②</sup>勃列日涅夫的访问巩固了古巴革命的新阶段，并显示了苏联的影响对这个阶段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 理想主义屈服于现实主义

按照中国一格瓦拉思想，“主观条件”（思想、意识、意志，

---

<sup>①</sup> 列·勃列日涅夫：《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报》，1974年1月30日，第4—5版。

<sup>②</sup> 《古巴—苏联宣言》，载于《格拉玛报》，1974年2月5日。1968年卡斯特罗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经常地开展愚蠢的、莫明其妙的争取和平的运动”，现在则改变了以前的立场，古巴支持苏联为了同美国搞缓和，为了国际和平而采取的行动。卡斯特罗：《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分析》，第2版。

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都属于上层建筑）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影响“客观条件”，即物质基础、生产力以及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决定上层建筑的结构。（因此，尽管物质基础不成熟，但由于有游击中心的意识，在古巴还是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意识的发展（先于物质基础的发展）获得成功，可以使一个国家越过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发展的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或者象古巴人所说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苏联反对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不能超出其物质基础发展状况所允许的限度。这里，苏联强调的是首先建立物质基础。苏联的理论家把发展的阶梯由原来的两级改为四级：“建立社会主义基础”、“完全的社会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基础”和“完全的共产主义”，并认定苏联处于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世界中最先进的国家。

1970年8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更加严肃、更加成熟、更加深刻的阶段”。<sup>①</sup>他解释说，古巴革命初期，很多人认为它的胜利“是某种魔术的效果”，另外一些人过低估计革命政府所面临的困难，说这些困难“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克服”。卡斯特罗告诫说，为了获得成功，古巴人今后必须采取审慎的现实主义态度。他说：

不要象我们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当我们有了一种想法，就马上付诸实践，后来只有推翻这种想法，因为……它是从头脑直接产生出来而应用到现实世界的，结果由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纪念古巴妇女联合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0年8月30日，第4—5版。

于缺少起码的〔客观〕条件而失败……。一些〔不讲实际的理论家〕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现实，而不愿让现实影响他们的观点。<sup>①</sup>

9月，卡斯特罗对是否可能越过或加快发展阶段提出怀疑：“可能我们的严重的理想主义是相信一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能够一跃进入一个人都按伦理与道德标准行事的社会。”<sup>②</sup>三个月之后，他建议说，“慢则快，慢则好，慢则有把握达到！”<sup>③</sup>1971年五一节，这位总理说：

走向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个觉悟的问题，还必须发展生产力。……

不能陷入理想主义，认为觉悟已经提高了，我们已经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事实绝非如此……〔“就提高而言，我们的觉悟还有一个漫长的道路要走”〕……必须懂得，我们是处在过渡阶段……我们不能装作似乎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假如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只凭主观愿望走得很远，超过了可能，迟早还得退回来。<sup>④</sup>

1971年11月，他在访问智利期间痛心承认：“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那就是自发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改变结构要比改变人的意识容易得多。”在回答一个新闻记者问他古巴

---

① 菲·卡斯特罗：《在全国基础工业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0年12月20日，第2—3版。

② 菲·卡斯特罗：《工人关于旷工和自愿劳动的自由辩论》，载于《格拉玛报》，1970年9月8日，第5版。

③ 菲·卡斯特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第4版。

④ 菲·卡斯特罗：《在庆祝五一节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5月16日，第7—8版。

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有矛盾时，他说，“我们不时发生矛盾，有时矛盾应归咎于〔我们这方面的〕某种理想主义。……当时我们希望事情照我们想象的那样去发展。”<sup>①</sup>

1971年末，古巴报纸《格拉玛报》在头版报道了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正在苏联访问的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消息。多尔蒂科斯谈到了为在古巴“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所作的努力，勃列日涅夫则通报了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所取得的进展”。<sup>②</sup>这样，古巴就承认自己是处在苏联发明的实现完全共产主义的四级阶梯的最底下一级，比它的保护者低两级。多尔蒂科斯还“对于苏联公开承认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的意义”表示感谢。这种谄媚的态度如果在六十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古巴人企图领导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因而向苏联人提出了挑战。新的气氛是要实现和平共处和缓和，因此在另外一次会谈中，柯西金热烈欢迎越来

---

① 菲·卡斯特罗：《在丘基卡马塔和工人的谈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1月28日，第6版；会见记者的谈话，见《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2月19日，第12—13版。1977年卡斯特罗会见巴巴拉·沃尔特斯时更加歉意地说，“我们有时也公开与苏联的不同意见。然而……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政治上不成熟。……〔我们的苏联同志〕总是非常耐心地对待我们的意见分歧。”巴巴拉·沃尔特斯：《与菲德尔的一次谈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7年7月24日，第4—5版。

② 在古巴—苏联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罗德里格斯说，古巴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后来，在柯西金访问时发表的公报中，苏方说，古巴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多尔蒂科斯和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些话是在莫斯科讲的，使用的是准确的苏联术语，然后在古巴的报纸上转载的。参阅《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1月2日，第12版。1974年1月28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接见苏联的电视记者时说，“在苏联已经造就了一种新人，这种新人是符合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并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的。”（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越多的拉丁美洲国家赞成同古巴重新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

1972年11月，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五周年的正式讲话中，巧妙地篡改了古巴的历史，使之适应当前的形势。首先他指出，在古巴革命的初期，格瓦拉对苏联是非常钦佩的，回顾一下1960年格瓦拉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得到的“深刻印象”是，那里不仅在物质方面正在进行巨大的变革，而且有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苏维埃人”。其次，罗德里格斯引用卡斯特罗1972年访问苏联期间，赞扬苏联的物质基础的发展给人以深刻印象时所说的一番话。他说，在发展物质基础的同时，在思想领域、政治文化和革命的坚定性方面，苏维埃人的觉悟程度也有了提高。他还断言，在苏联没有资本主义“思想渗透”的迹象。接着，罗德里格斯（跳过了从1962—70年近十年的古巴历史）得出结论说，卡斯特罗和古巴共产党在整个古巴革命过程中，执行了苏联人阐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①</sup>

1972—73年党员“政治教育课程”所使用的材料批评了理想主义和社会意识自然发展的说法，认为是不科学的，完全拥护苏联的标准解释，即生产方式（或物质基础）产生社会意识，而绝不是社会意识产生生产方式。<sup>②</sup>

1973年卡斯特罗在纪念他的革命的起点攻打蒙卡达兵营

---

<sup>①</sup> 参阅《格拉玛报》，1972年11月19日，第8—9版。参阅《与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的会见》，此文慎重地评论了关于刺激问题的辩论，载于《经济与发展》，1972年第14期，第149—153页。

<sup>②</sup> 弗利佩·卡内阿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便是一例，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4月1日，第2版。

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马克思说，最大的权利莫过于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文化〔意识〕的发展。”接着他承认，在古巴发展的现阶段，不能按需分配，只能按劳分配，滥用精神鼓励将会导致理想主义。他最后说：“如果我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时候，觉得仿佛〔少数自觉的领导人的态度〕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一样，那我们就犯了理想主义的错误，会对经济产生消极的影响。”<sup>①</sup>过了几个月，卡斯特罗又谈到这个题目，他说：

过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曾试图取得更大的进展，但我们却没有足够的准备。……假如你超过自己的可能，试图走得更远，你势必要退回来。……自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实行了一系列具有一定共产主义特点的措施和原则……很多事例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过共产主义生活。……我们应该有勇气纠正〔过去〕犯的理想主义错误。<sup>②</sup>

可以看出，古巴人沉痛地谴责了过去的理想主义，并且承认了现实，与此同时，他们在这个岛国又在慢慢地、谨慎地、不声不响地实行改革后的苏联体制。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二十周年的主要仪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8月5日，第5版。这次，卡斯特罗一反过去即席发言的习惯，照稿宣读。

<sup>②</sup> 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工会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于《起义青年报》，1973年11月16日，第2—11版。



## 第二章 经济：现实主义 和合理性

六十年代后半期，革命的经济政策不顾许多基本的经济规律，把造就“新人”置于突出的地位。这样一种政策的特点是极端理想主义、劳动动员、平均主义、精神鼓励以及大搞蔗糖生产，但却忽视集中计划、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以及财政稳定等方面。宏大的目标未能实现，1970年经济混乱，以及苏联加紧施加压力，要求经济合理化，是改变这一政策的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新的注重实效的经济政策按苏联的标准是比较合乎传统的，它强调实行集中计划和发展电子计算机，有效地分配和使用资本，改进管理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财政上的不平衡（“社会主义通货膨胀”），增加物质刺激，以及建立一个不太强调糖业的比较平衡的经济。从工业产量、总的经济增长情况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等方面来看，这个政策的经济效果是肯定的。从相反的方面看，这种政策也许会导致自私和某种程度的等级分化，以及局部地区出现失业现象。在一个实行平均主义的、依靠动员的社会里造就“新人”这个目标被推迟了，但对一般人说来，这种注重实效的决定也许看起来毕竟还是不错的。

### 加强计划机构

在1963—65年古巴的辩论中，双方都主张建立一个合理

的、有效的、集中计划的制度，运用数理技术和电子计算机，但有一个显著的分歧：格瓦拉梦想有一个完善的机构，能完全代替市场的作用——这是控制论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在苏联得到保守的政治家和老式计划人员的支持。与此相反，比较注重实效和较有见识的罗德里格斯也主张搞集中计划，但要有限度地利用市场的作用——这是走1962—65年苏联实行的那种缩手缩脚的经济改革的路子。卡斯特罗对这两种主张都不赞成。在1966年，他大力地削弱了中央计划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能，抛弃了中期计划（只在1962—65年部分地试行过），大概年度计划也不搞了（在1965—70年），采纳了计划人员以前作出的若干决定，严重忽视了计算和统计资料，开始实行一连串“微型的”、“额外的”或者“专项的”计划。这些用来对付经济方面某一特别问题的计划享有优先权，并且都被委托给只需向总理报告的忠诚的“菲德尔派”。资金和人力资源经常从正在施工的工程项目上抽出来（致使工程不能完工或进行得很糟），以便开始执行新的“微型”计划，而这些计划在许多情况下又以失败告终。<sup>①</sup>

1965年，罗德里格斯被卡斯特罗免去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被委派为“不管部”部长。罗德里格斯被调离了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中心。在这以后，他就把全部精力用来研究计划工作。他组织了一个班子，有十一位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这个班子在1968年首次（虽属初步的和不完全

---

<sup>①</sup> 关于六十年代计划工作的细节，参阅卡梅洛·梅萨-拉戈和卢克·泽菲林合著的《中央计划工作》，载于梅萨-拉戈主编的《古巴的革命变革》，第145—184页。

的)用电子计算机算出了古巴经济中工业部门的“投入—产出”图表。“投入—产出”的创制者列昂节夫,于1969年访问古巴时,对罗德里格斯班子的专业才能有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这个班子已迁到中央计划委员会办公。<sup>①</sup>

1970年,当革命的新阶段开始时,罗德里格斯兼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他领导着古巴第一流的集中计划和计算机技术的专家队伍;同时——因为革命前曾是人民社会党党员——得到了苏联人的信任。国内迫切需要使经济合理化,苏联也施加压力要求以技术观点来对待计划工作,这就把罗德里格斯又推到显要地位上来。他接连不断地取得成功,于是他就成了古巴—苏联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古巴方面的)创始人和主席,负责外交政策的副总理,外贸协定的主要谈判者,参加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贸易和电子计算机技术方面的跨国委员会的古巴代表,还是实际上控制着国内计划工作的一个人。

采纳了苏联“模式”,科学技术专家崛起,这就引起了两个明显的变化:“微型”计划被短期和中期的集中计划所代替;电子计算机(特别是应用在计划和管理方面)迅速地使用起来。此外,还采用了某些市场手段,来改善投资的分配和使用以及管理效能。这一方面将在下面加以讨论。

看来1971年是过渡性的一年,准备在计划方面进行重大的改革。大概在这一年,也为改进收集统计资料的制度(这在1966—70年曾被忽视)打下了基础。到今年年底,中央计划委

---

<sup>①</sup> W·列昂节夫:《访问古巴拾零》,载于《纽约书评》,1969年8月21日,第16页。

员会发表了双年度统计公报；在补充上 1966 年中断了的全面经济指示数字以后，公报将会大为充实。<sup>①</sup>1972 年初，中央计划委员会已经在编制 1973—75 年全面经济规划。<sup>②</sup>这个规划将把古巴经济纳入经互会成员国已在执行的 1971—75 年计划的后三年中。据说在 1972 年年中就已经在制定 1973 年、1974 年和 1975 年的年度经济计划。（这是自 1964 年以来首次发布的有关年度计划的消息。）关于 1973 年的计划，没有再发表什么消息，但到了 1973 年底，据说部长会议和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已经讨论了 1974 年的计划。1976—80 年的五年计划于 1972 年开始研究，并于 1975 年底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是古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古巴曾有过一个 1962—65 年的四年计划，但在 1964 年就放弃了。）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全国宏观经济计划重新成为经济的主要工具，一切下级的计划（如微观计划和部门计划）都将从属于它。<sup>③</sup>古巴的计划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类似计划是经过协调的。<sup>④</sup>

---

① 到 1977 年底，古巴已出版了三期双年度统计年鉴和四期年鉴。参阅古巴共和国中央统计局：《1966、1968、1970、1971 年统计公报》（哈瓦那，1968、1970、1971 和 1973 年）以及《1972、1973 和 1974 年古巴统计年鉴》（哈瓦那，1974、1975 和 1976 年）。关于古巴统计资料的来源和准确性，详见我的文章：《社会主义古巴的统计资料的可用性与可靠性》。载于《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 4 期（1969 年），第 53—91 页和第 47—81 页。

② 奥·多尔蒂科斯：《经济控制和古巴经济发展的前景》，载于《经济与发展》，第 11 期（1972 年 5—6 月），第 10、27—28 页。

③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决议》，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 年 1 月 11 日，第 10—11 版。

④ 根据阿·柯西金的一次讲话，引自《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 年 7 月 23 日，第 10 版。

到1970年底,古巴已经有一个全国计算和应用数学中心在开展活动,而且看来已对这个中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sup>①</sup>1972年,苏联答应送给古巴一部大型电子计算机,1973年又答应派出一组技术人员帮助古巴把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于1973—75年的年度计划。从1972年以来,古巴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政府间委员会的成员。<sup>②</sup>在七十年代,古巴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1971年将一千五百万比索的投资用于购置新计算机,1973年有七十部计算机在进行工作,成立了两个计算机中心,许多古巴专门人员被送到苏联受训,古巴开始制造小型数字计算机,并在1972年举行了第一次计算机科学会议。<sup>③</sup>

### 提高资本效能和管理效率

1962—70年期间,古巴在消费方面作了巨大的牺牲,从国民生产总值中节省出越来越大的一部分(1968年增大到百分之三十一)作为投资使用。这样积累起来的资本有一部分并未象预期的那样收到效益,因为它大都通过“微型”计划被武断地分配到一些后来失败了或未能完成的工程上去,或者

---

① 《工人的自由讨论》,载于《格拉玛报》,1970年9月8日,第5版。

② 见第一章。

③ 奥尔兰多·卡诺塔:《发展中国家古巴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应用计算机的情况》,载于《经济与发展》,第9期(1972年),第84—129页;《古巴与计算机》,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4月2日,第5版;路易斯·古铁雷斯:《古巴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载于《经济与发展》,第12期(1972年),第144—149页;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管理干部在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展》,载于《经济与发展》,第20期(1973年),第27—57页;以及拉蒙·C·巴尔金:《古巴:控制论时代》,载于《古巴研究》,第5期(1975年),第1—23页。

由于没有发挥效能和管理不善而浪费掉了。1966—70年期间,在使用资本方面没有发挥效能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来是由于中国一格瓦拉派忽视客观条件,兴建野心过大的工程,强调实物的固定产量指标,又厌弃财务会计和成本分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过分依靠自发性。多尔蒂科斯总统曾说:“在六十年代后期,有些人抱有一种反常的见解,对成本不重视,把它看作资产阶级经济的一个要素,好象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成本就不起关键作用似的。”<sup>①</sup>

1971年这一年被形象地称为“生产效率年”,从此明显地脱离了以前的政策,要逐步做到更有效地分配和使用资本。11月间,卡斯特罗说:“在一个短时间内要做完许多事这样的愿望,常常使我们集中大量的物资。结果我们并没有最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是滥用了。”例如,1959年以来进口的大约五万台拖拉机被用于种种非生产活动,如开去看棒球比赛,去海滩,去参加聚会,和探亲访友。很快成了拖拉机手的人们并不懂得如何正确地使用和保养机器。卡斯特罗说,结果是“以前私营企业主有一台拖拉机,可持续使用二十年,但到后来,当那个生产单位的所有权转到国家手中时,一台拖拉机只能持续使用两、三年或者四年。”<sup>②</sup>就使用年限来说,这五万台拖拉机减少到七千台左右了。

一个月之后,卡斯特罗还指出了其他一些投资使用不当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放弃集中计划和大搞“微型”

---

① 多尔蒂科斯:《经济控制》,第30—31页。

② 菲·卡斯特罗:《在麦哲伦的里奥维尔德牧羊场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2月5日,第8版。

计划造成的。进口的设备放置多年不予利用（有时在码头上生了锈），因为安放这些设备的建筑物尚未建成。一个大热电厂和有些工厂差不多已经完工，但不能投入生产，因为缺少一个重要的部件。轻便吊车因起重过度而损坏。因为忽视了电力设备和供水系统的维修，经常停电、缺水。（1971年仅在哈瓦那市就损失了一亿二千万立方码水。）房主和房客对住宅不爱护、不修缮的情况也很普遍。在哈瓦那东部的新型住宅区，住户把盥洗室的设备拆下来卖掉，或者拿门板当柴烧。<sup>①</sup> 农业方面，修了小型堤坝，却没有修起相应的灌溉系统，因而许多储水未能利用或者浪费掉了。多尔蒂科斯总统在1972年初的报告中说，铁路运输出现了严重危机，因为三百个火车头中只有一百三十四个在运行，其余的都被粗心大意的工人弄坏了。他还说，由于对设备爱护得不好，按人口平均的备件消耗量古巴是全世界最高的。在另一个场合，多尔蒂科斯指出，1970年从苏联进口的一百四十五个油罐，到1972年还未曾安装。<sup>②</sup>

古巴领导人宣布采取种种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根据国家的发展水平，未来的项目要比较现实一些；要先把尚未完成的项目完成后，再开始进行新的项目；设备的保养、修理和维修人员一定的训练要受到优先考虑；质量标准要在所有企业严格实施；成本会计和成本分析应是提高效率不可缺少的一

---

① 菲·卡斯特罗：《在群众参加计划建设的第一座建筑物开工典礼上的讲话》，1971年4月26日哈瓦那电台广播。（报纸上只刊登了这次讲话的几段摘录。）

② 奥·多尔蒂科斯：《古巴经济发展的分析与前景》，载于《经济与发展》，第12期（1972年），第49—53页及《燃料：维持经济活动的基本因素》，同上，第80页。

个工具。<sup>①</sup>有三项具体措施特别值得考虑：培训技术人员；采用一种新的“经济管理制度”；以及精心设计提高投资分配效率的一套办法。

1966—70年期间曾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和会计方面的教学活动，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已在古巴得到恢复。而且还设立了两个新的专业，培养“系统分析员”和“经济审计员”。这些专业的课程包括数学分析、微积分、统计学、经济理论、计划制订、系统分析、情报技术、会计学、经营管理和生产过程。<sup>②</sup>毕业生兼有会计师、经济学家和企业管理人员的才能。1972年8月，罗德里格斯痛惜失掉了宝贵的技术人员，他们在革命初期由于领导上采取过分激烈的作法以及其他错误而逃走了。他许诺说，现在受雇的那些相信资本主义的好处但“爱国”的技术人员可继续为革命工作。他还承认，以政治干部代替科学技术专家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招致了1970年糖季的失败。<sup>③</sup>一年以后，多尔蒂科斯总统警告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他们必须取得必要的资格才能担任这个职务，不然的话，不管他们的革命资历如何也要撤职。<sup>④</sup>在1973年底，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采取了下列鼓励措施：职位提升必须在掌握了必要的技能的基础上进行；考入高等学校就有权享受脱产带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第一届全国材料工业生产和生产率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12月21日哈瓦那电台广播。

<sup>②</sup> 奥尔兰多·卡诺塔：《系统分析家和研究经济控制的硕士：管理信息化的主要专家》，载于《经济与发展》，第10期（1972年），第121—134页。

<sup>③</sup> 参阅智利杂志《今日智利》于1972年8月9日对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的访问记，转载于《经济与发展》，第14期（1972年），第154—155页。

<sup>④</sup> 奥·多尔蒂科斯的话，见《拉丁美洲》（1973年11月2日），第252页。



薪学习的待遇，脱产时间根据学习水平高低从一小时增到四小时；学习期满就自动增加薪金，以资鼓励。处罚也是有的，那些无故退学或学业完成后改变专业的人，应把脱产学习期间所领工资退还国家。<sup>①</sup> 1976年，一所国立经营管理学校和十四所省立经营管理学校办起来了。在国立经营管理学校开学典礼上，劳尔·卡斯特罗说：“〔在六十年代〕我们不让干部经管预算、全国财政计划、（企业间的）收支、利润与税收等项事宜，而所有这些对于管理、指挥经济和促使人们提高效率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我们还教育〔干部〕轻视〔这些基本经济手段〕，把它们看作与共产主义精神和意识背道而驰的东西，因为我们对经济事务无知，认为这些事资本主义的味道太浓了。”<sup>②</sup>

党的代表大会“根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数十年取得的广泛经验”，于1975年批准建立“经济管理制度”。这个制度将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或供求规律）的基础上，并将考虑到“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货币交换关系”。作为衡量管理效能的标准，并且为了提高资本、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利用率，这个制度将运用诸如利润、信贷和利息、合理价格、预算、“经济核算”（与自筹资金有关）、税收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等市场手段。国营企业将享有相对的独立性（如雇用工人、请求贷款、作出关于投资的决定等），但也有平

---

<sup>①</sup> 《关于工人文化和技术的训练与专业队伍的培养的决议草案》，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73年11月11—15日。

<sup>②</sup> 劳·卡斯特罗：《在全国管理学校三个学程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年3月14日，第2版。

衡收支和创造利润的责任。象在苏联一样，古巴企业的效率也要有一套衡量的标准，这包括产量、质量、成本、生产率和利润。国家银行将向国营企业和农场提供贷款，但要归还本息。对企业和批发商规定的价格，包括生产成本（劳动、资本摊提和利息、折旧等）和一笔利润。从这笔利润中，企业必须向国家交纳利润税和社会保险税，同时建立一项“奖励基金”，其中一部分用来增添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此点将在下面加以论述）。零售价格则还要加上旨在平衡供求又为国家增加收入的一种“营业”（销售）税（私有农户和个体经营者也要交税）。推行这个经济管理制度的时间表如下：在1977年，实行国家“经济核算”制度，国家预算和建立企业间的购销关系；1978年，实行价格、税收和银行一信贷一利息等方面的新制度，同时在选定的企业实行自筹资金的试点计划；1978—80年，把试点计划扩展到全部企业。<sup>①</sup>

关于选择何种经济组织制度的辩论，在1963—65年曾活跃一时，在1966—70年则停了下来。1971年，这一辩论又逐渐重新出现了，这次只限于技术方面的小题目。例如，一位外国的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以利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中衡量管理效率的主要标准（这正是苏联自1965年以来实行的作法）。古巴的官方经济杂志《经济与发展》转载了这篇文章。接着，一位古巴经济学家撰文，小心翼翼地为这一制度辩护。<sup>②</sup> 讨论大部分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要通过衡量投资对

---

<sup>①</sup> 同第53页注释<sup>②</sup>；及《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决议》，第10—11版。

<sup>②</sup> 马里奥·努蒂：《反对利润》和里卡尔多·A·埃尔南德斯的答复：《反

象来选出效率最高的项目，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一位古巴专家说，苏联的“相对有效性系数”的老方法（曾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实行过）已被社会主义国家更为先进的一些方法所代替（其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利息率）。党的代表大会在1975年决定恢复自筹资金制度，1976年有九百个企业经理在学习这个制度。虽然在1977年几乎所有企业仍然在实行预算拨款制度，但“经济核算”制（自筹资金制的必要基础）已开始采用。自筹资金的一个试点计划将在1978年试行。两位苏联专家已经承认，在1966—70年期间古巴人曾试图取消自筹资金制，但是社会主义阶段的现实迫使他们恢复这一制度。另一位苏联专家曾说，古巴的最终目标是根除预算拨款制，而代之以自筹资金制。<sup>①</sup>

### 提高劳动生产率

1968年对二百多个企业进行了关于时间损失的研究，研究报告直到1970年年中才发表。据报告透露，一个工作日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是浪费掉了。<sup>②</sup>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企业配备的人员过多，同时从1966年以来（在中国一格瓦拉

---

对利润：一则评论》，载于《经济与发展》，第8期（1971年），第3—17页。另参阅索伊拉·冈萨雷斯·迈卡斯：《关于投资估价的一些考虑》，载于《经济与发展》，第12期（1972年），第150—171页。另参阅马努埃尔·卡斯特罗·塔托：《对投资计划的决定性根本阶段的总分析》，同上，第15期（1973年），第30—47页；爱德华·希宁：《古巴共产党改善经济管理的方向》，载于《拉丁美洲》（莫斯科），第4期（1976年），第41页。

① 鲍里斯·戈尔巴乔夫和奥尔加·达鲁申科夫：《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载于《社会科学》（莫斯科），第3期（1973年），第91页。

② 《我们可以增产》，载于《流浪者》，1970年5月，第32—37页。

派相信自觉性的影响下)，对于1963—65年期间在古巴采用的苏式工作定额制度执行不力。分配给每个工人的工作定额（或劳动定额），规定了在一定时间内（月、周、日、小时）他应该生产多少，这种工作定额也是用以控制劳动生产率的一种管理手段。<sup>①</sup>

1970年7月，一位新闻记者问劳工部长，是否真要恢复工作定额，这样做是否与精神鼓励有矛盾。这位部长对恢复定额一事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回避了棘手的第二个问题，说定额是衡量工人是否努力所必须的。<sup>②</sup>多尔蒂科斯总统后来说得比较明确：“在劳动定额的建立和管理〔这两个〕方面，我们已丧失了曾经达到的水平；同时也失去了定额管理的专门人材，这些专门人材目前正在做不那么重要的工作。〔过去〕过份相信自觉性，认为即便没有劳动定额，每个人也会自愿地工作，而且讲求效率……。我们必须拟订一项严肃的连续的劳动定额政策，并且把有关的专门人材找回来。”<sup>③</sup>

从10月到11月，由管理人员、党员、专家和技工组成的委员会讨论了恢复劳动定额的问题，12月实际开始实行。到1971年5月，差不多六百个企业实行了定额，同年底实行定额的企业增加到一千五百个，包括一部分制糖工业在内。1972

---

① 详见本人的著作：《古巴的劳动部门与社会主义分配》（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8年）。

② 豪尔赫·里斯克特：《关于劳动力和生产率问题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报》1970年8月1日，第4版。

③ 奥·多尔蒂科斯：《在轻工业部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转引自《五百家大工厂中的劳动组织与劳动规章》，载于《格拉玛报》1970年9月16日，第5版。

年被称为“竞赛年”，到“五一”节时，三千多企业和七十多万工人（占国家雇佣人员的三分之一）都纳入了工作定额制度。到1973年底，大约五万三千个企业实行了定额制，这些企业雇用的工人占全国国营企业工人的70%。1976年初，雇佣着一百六十万零二千九百名工人的六万八千零九十一个企业实行了定额制。<sup>①</sup>

除了劳动定额之外，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其他措施是，新近采用的对工人提高技艺的刺激，某些操作的机械化以及劳动组织和劳动条件的改善。有一个被广为宣传的成功的事例是，在古巴港口装卸苏联商船过去耽搁的时间长，现在缩短了。对这项工作规定的平均时间是十一天，但码头工人经常要花多达二十天的时间（每超过一天古巴人都得交付一笔罚金）。抓紧了劳动定额，苏联派来了专家，在哈瓦那港修建了一个新的机械化码头，协调了船舶到达的时间，同时工作条件也大大改善了（甚至在码头上播放音乐！）。这样，耽搁的时间在1972年就缩短了一半。<sup>②</sup>

上述措施使得劳动生产率在1972年总共提高了21%。<sup>③</sup>但是，这些进步集中在工业和那些对经济特别重要的服务行

---

① 根据菲·卡斯特罗：《在全国基础工业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0年12月20日，第5版；《在庆祝五一节集会上的讲话》，同上，1971年5月16日，第6版；以及菲·卡斯特罗：《在五一节游行时的讲话》，第2版；《全国第一次组织与规则会议》，1972年1月24日哈瓦那电台广播；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发表的消息，1973年11月11—15日；《格拉玛报》，1976年3月1日。

② 米内尔瓦·萨拉多：《内港》，载于《古巴国际》第5期（1973年），第36—45页。

③ 参阅注释①。

业上。而农业则仍然被很低的劳动生产率所困扰。1973年下半年，劳尔·卡斯特罗宣称，单是劳动成本就超过了产值，这在国营农场是屡见不鲜的。他列举了一个国营农场的数字，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这个农场全年工资额是四万八千比索，而产值仅为八千比索，这样，不计其他生产成本也亏损四万比索。劳尔的结论是，大量的工人是不必要的，这样的剩余劳动力不应当存在。<sup>①</sup>

事实上，在非农业部门，大部分人浮于事的现象已经解决了，而且政府也已限制雇用不必要的工人。在1971年，最初估计全国要增加三十万工人，但这个数字被减到只有四万八千人。1972年全国的抽样调查表明，就业人数减少了1%。<sup>②</sup>1972年年中，据多尔蒂科斯总统说，虽然人力不足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但是有两个省（奥连特省和拉斯维利亚斯省）则存在着相反的情况，已经有了某些失业现象。<sup>③</sup>1973年底，菲德尔·卡斯特罗承认，就业的“钟摆”正在摆向另一边，人力不足很快填补上了，现在是要求提供更多的工作。他说：“我们要为所有要求工作的人找到职业这样令人头痛的时刻也许就要到来了。”但是，他答应会找到解决办法以避免再出现一支“失业大军”。<sup>④</sup>古巴工人联合会在其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要求修改在人力严重不足时期通过的条例，显然，这是对

---

<sup>①</sup> 劳·卡斯特罗：《在全国农牧业工人工会成立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报》，1973年9月10日，第2—3版。

<sup>②</sup> 参阅第57页注释①。

<sup>③</sup> 多尔蒂科斯：《分析与前景》，第52页。

<sup>④</sup> 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起义青年报》（1973年11月16日），第7版。

付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详细论述，参看第三章。）原条例专为女性保留某些服务作业的工作，迫使男性到更需要他们的体力的其它方面去工作。现在情况变了，那样的服务行业的工作应向男性工人重新开放了。<sup>①</sup>

### 同“社会主义通货膨胀”作斗争

1961年以来，古巴就一直存在着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这是由于消费品供求差额日益扩大而引起的。充分就业，糖业工人即使在非生产季节没有工作做也有保证得到年薪，最低工资和养老金提高了，免费的社会服务（即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殡葬、公用电话、水、体育和部分住房）扩大了，以及其他公用事业（即电、煤气和公共交通）费用减少了，这一切使人们可支配的收入增加了，需求因而步步上升。对许多服务项目（如电、水、电话等）的需求之所以增加，还因为消费者浪费，同时这类服务不用收费或非常便宜，因而使用无度。另一方面，消费品的供应则受到了消极的影响，因为国内生产停滞或增加甚少，进口减少，有些原先内销的商品也出口了。

如果在市场经济中，这种不平衡势必已经引起了价格的逐步上涨。而古巴领导人却采取一种平均主义的方法，决定从1962年起实行配给制，以后再配给制扩大到所有消费品。但是，大多数家庭的总收入远远超过每月购买配给商品所需的费用。流通中的过剩货币开始多起来了。1970年，过剩货币有三十四亿七千八百万比索，同时，全体居民的总收入

<sup>①</sup> 《关于妇女工作的决议》，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73年11月11—15日。

几乎超过可以供应的物品价值的两倍，因此居民能够生活一年而不必工作。<sup>①</sup>结果，政府虽然限制，黑市还是盛行起来了（在那里，商品售价为官价的五至十倍）。<sup>②</sup>

1970年底，卡斯特罗说：“富裕不是由命令或法律创造的。依靠命令，你能够分配现有的东西，但是命令却不能分配没有的东西。〔我们必须〕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否则〕黑市价格就会上涨。<sup>③</sup>香烟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1971年烟草因天旱损失了40%，但在此之前这种产品就有如何满足国内消费和出口需求的问题。因此，黑市的香烟价格暴涨，吸烟的人每买一包烟要花十二到十五比索，即为官价的六十到七十五倍。不吸烟的人则用配给的香烟在黑市上换取其他东西。<sup>④</sup>

为了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作出了减少需求和增加供应的决定。为避免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取消房租（计划于1970年实行，这会使七千万至八千万比索进入流通领域）和提高最低

---

① 多尔蒂科斯，《分析与前景》，第38页。

② 最近去古巴访问的人对黑市的重要性发表了不同的看法。1969年，吉尔·格林（《古巴式的革命》〔纽约，国际出版社，1970年〕，第22页）没有发现黑市的迹象，但勒内·迪蒙（《古巴：是社会主义的吗？》〔巴黎，瑟尔出版社，1970年〕，第242页）却在哈瓦那发现了黑市。在1971年年中，卡斯特罗说在古巴还存在着黑市（《在庆祝五一节集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5月16日，第6版），但是当时在古巴进行访问的一个美国记者说，卖食品的黑市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但还有卖服装的黑市，尽管正在逐步缩小。（小乔·尼科尔森：《古巴内幕：一个记者的笔记，革命十四年之后》，载于《哈泼斯》月刊，1973年4月，第56页。）

③ 菲·卡斯特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第6版。

④ 同上；《在集会上的讲话》，第6版；以及洛德斯·卡萨尔在古巴收集的资料，1973年8月。



工资(这是卡斯特罗于1968年答应了的),这两项都被无限期地推迟了。①用以减少需求的措施包括:提高香烟、啤酒和罗姆酒的价格;提高大量使用水电的人应交的水电费;提高诸如长途运输和饭店进餐等服务业的收费(在工人食堂吃午饭现在每月收费十比索)。1973年年中,非配给香烟每包二点四比索,而配给香烟每包二十分。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似乎也有所上升,例如,八百五十比索一台黑白电视机,五百五十比索一个小电冰箱,七百比索一部手提式电唱机,一百二十五至五百比索一架苏制照相机,以及一百二十五比索一部手提式收音机。②为了进一步压低需求,1973年下半年,政府取消了以前的某些慷慨政策。对先进工厂中患病或退休的工人给予百分之百的工薪这一条被取消了,这样,估计每年节省一亿四千万比索。糖业工人保证给以年薪,这一条要作重大的修改,因为否则就等于把补助金发给在四、五个月的非生产季节中闲散的工人。③1976年秋季,公用电话免费的作法停止实行,现改为收费五分。④1977年谣传观看体育活动要买门票,电

---

① 然而,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在二十五美元以下的家庭免收房租。《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月17日,第8版。

② 《拉丁美洲》(1971年2月19日)第60页和(1972年5月19日)第154—156页以及(1972年9月8日)第283页;《古巴人实行刺激计划,提供更多的商品和食品》,载于《纽约时报》,1972年5月15日,第12版;洛德斯·卡萨尔在古巴收集的资料,1973年8月;乔安妮·奥曼:《古巴存在的问题:钱太多》,载于《华盛顿邮报》,1976年1月4日;杰里·弗林特:《古巴人承认他们的经济处在严重的困境中》,载于《纽约时报》,1977年4月25日。

③ 《古巴工人中央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议题》,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9月2日,第9版;拉萨罗·培尼亚《古巴工人中央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心报告》,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11月18日,第4版。

④ 《纽约时报》,1976年11月25日。

彩票也要加价。

增加消费品供应的第一步大概就是在1971年把资本积累的比率降低到28%左右,1974年又降低到22%,从而把较多的资源分配于消费方面。<sup>①</sup> 1972年,官方和外国通讯社都报道有较多的消费品供应了。虽然从7月开始的每月新定量大多数都不变(糖已在2月份从六磅减为四磅,12月又减到三磅半),黄油定量则有所增加。鱼、牛奶、某些薯类(马铃薯、丝兰)、某些水果(香蕉)以及含酒精的和不含酒精的饮料,供应比较正常了;服装、鞋和化妆品的供应则明显增加。国内生产了大约三万台电冰箱,三万一千部收音机和三十五万个压力锅。大量非基本物品,有的则进口(如晶体管收音机),有的由国内生产(如香水、墨镜)。1974年,国内用品的增产情况是:电冰箱和收音机四万二千台,压力锅四十五万个。1976—80年计划要求生产十万部黑白电视机,并引进彩色电视机。政府还打算向日本购买大量的摩托车、空气调节器和小汽车。饭店和工人食堂的饭菜已经有些改善。还计划兴建旅馆,开辟工人休假胜地,甚至狂欢节也搞得更高级更奢侈了。<sup>②</sup>

1973年下半年发的新配给证在食品方面保持不变,而在

---

<sup>①</sup> 据美国记者詹姆斯·希金斯说,古巴官员1971年初曾告诉他,投资比例从1968年的31%增加到1970年的33%,但1971年却下降到28%。1971年5月14日在哈佛大学的谈话。1974年的情况来自《经济与发展》第32期(11—12月),第196页。

<sup>②</sup> 参阅第61页注释<sup>②</sup>;《古巴:笼罩狂欢节的阴影》,载于《拉丁美洲》(1971年7月23日),第239页;《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12月24日,第3版;《1974年古巴统计年鉴》,第128—129页;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1976—80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示》(哈瓦那,1976年)。

工业品方面则有重要修改。许多工业品不限量了，甚至去内地旅行时也能买到下述商品：胶卷、普通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放映机、电唱机、自行车零件和炊具、咖啡和水晶玻璃杯、结婚戴的银戒指、文具、塑料鞋和拖鞋、除臭剂以及某些化妆品和香水（包括以“红色莫斯科”和“保加利亚玫瑰”这类外来名字做商标的化妆用品）。若干商品实行有限制的分配。每个消费者一年有两次或三次可对下列物品选择一件或几件：牙刷、手帕、袜子、内衣、便裤、睡衣、胶鞋、雨衣、游泳衣、线、除垢剂、炊事用具、烫斗、绞肉机、软管和某些家具。饭店和度假胜地则供应方便的、不限量的东西，如游泳衣、救生用品、墨镜、化妆品和文具等。大约二十种工业品保持严格的定量配给，如裤子、衬衣、服装、裙子、罩衫、皮鞋和纺织品。为了采购方便，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个购货证，可以直接买东西。某些物品（如圣诞节卖的玩具）则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出售，以免排长队，同时开办了专门商店（例如婴儿商店）。<sup>①</sup>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流通货币的数量在1971年下半年开始下降。据卡斯特罗说，在1972年第一季度，流通中的货币回笼是由于价格的提高（占13%）以及商品和服务的增加（占87%）。<sup>②</sup>从1971年年中到1973年末回笼的货币总共有十二亿三千万比索：1971年一亿五千万，1972年六亿八千万，1973年估计四亿。货币剩余与居民总收入的比率从1970年的零点八七下降到1973年的零点四七。（见表2）现在这个五年计划预计，居民收入与可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将在1980年

① 《购货本的变化》，载于《流浪者》，1973年8月1日，第26—31页。

② 菲·卡斯特罗：《在五一节游行时的讲话》，第3版。

**表 2 古巴“社会主义通货膨胀”缩减量(1970—73 年)**

(单位: 百万比索)

	收		入		
	工资总额	付给农民、学生和支付养老金的款项	总额(居民收入)	累计货币剩余	货币剩余与居民收入的比率
1970年	3,111	895 <sup>a</sup>	4,006 <sup>a</sup>	3,478	0.87
1971年	3,187	948 <sup>a</sup>	4,135 <sup>a</sup>	3,328	0.80
1972年	3,367	1,005 <sup>a</sup>	4,372 <sup>a</sup>	2,648	0.61
1973年	3,690	1,060	4,750	2,248	0.47

<sup>a</sup>是作者估计数。

资料来源: 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的讲话》,载于《起义青年报》,1973年11月16日,第6—7版。

达到平衡。

1973年底,卡斯特罗高兴地说:“货币开始有一些价值了!”<sup>①</sup>人们可花的钱比较少了,因而受到刺激要去多做点工作,以便增加收入,购买新供应的消费品。这就部分地说明了前一节谈到的劳动力供应有所增长的原因。

### 扩大物质刺激

国民生产总值中消费部分的比率显著提高,新的免费的社会服务推迟实行,市场价格一部分开始发挥作用,以及消费品供应增加,这些迹象都清楚地说明已经脱离了精神鼓励的做法。1966—70年期间过分强调精神鼓励,不一定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所促成,而可能是由于资本积累比率过高,货币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第6版。

流通量太大和消费品极端缺乏所引起的。因而，突然强调工资差别这一过去平均主义倾向强烈反对的典型的物质刺激，也就不足为奇了。在1966—70年，在上述情况下，以工资差别作为经济刺激是没有意义的，而强调平均主义倒是合乎逻辑的。关于这一点，卡斯特罗说过：

“……在猛烈的通货膨胀当中，实行物质刺激是无用的、无效的……当人人都用钞票把口袋塞满了的时候，这些东西〔工资差别、物质刺激〕没有一样顶用。……过多的钞票对许多人的劳动起了抑制作用。”<sup>①</sup>

1971年“五一”节，卡斯特罗解释说，工资不能人人平等；工资差别作为一种手段，对刺激那些有劳动技能或肩负重任的人，激励那些干重活的人或在缺少起码的工作条件的地方工作的人，将来会有重要意义。卡斯特罗说，如果工资差别取消了，那些特别努力去获得技能或是干重活的人就会泄气。<sup>②</sup>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主题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分配制度，而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按需分配制度。卡斯特罗说，象1966—70年实行的按需分配不能再实行下去了：“干同类的活就给以同样的工资，而不考虑这种活所需要费的工，这是一种平均主义原则，必须改正。”再者，这种“工”不仅要用体力来衡量，而且要用工作的复杂性来衡量。于是，卡斯特罗在1974年宣布，将拨出一亿三千二百万比索米提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以便对他们的技能给予比较恰当的报酬。他还宣布将进口小汽车卖给技术人员，“以提高他

<sup>①</sup> 同第64页注释<sup>①</sup>。

<sup>②</sup> 菲·卡斯特罗：《在集会上的讲话》，第7版。

们的生产率。”<sup>①</sup>

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其他议题涉及恢复物质刺激（例如各种生产奖金、加班费）、取消“历史工资”，<sup>②</sup>实行新的社会主义竞赛制度等。工资再次同劳动定额联系起来（象在1963—66年那样）。工人如果完成定额，就能得到他的全部固定工资；如果不完成定额，他的工资就要按照他未完成部分的同样比例予以扣除。最后，如果他超额完成定额，他的工资就按比例增加，发给奖金。（奖金不仅恢复了，而且比从前的比例还要高：在1963—66年是按超额部分的50%，现在是按超额部分的100%。）1976年，在雇用六十万工人的九千八百六十个企业中实行了新的工资制度。<sup>③</sup>

在1968—70年的各次运动中，加班费大都被工人放弃了。现在则认为这是错误的：“在许多情况下，无报酬的加班比正常的有报酬的工作时间成本更高〔因为不必要的加班加点是强加于工人的，他们不好好干活，而其他的生产成本则是固定的〕，致使实际生产和每人的时产量下降。”大会一致认为，只有确实必要时才得加班，而且应该发给加班费。因工人的过失而加班，就不应该发加班费，而且要在他的劳动纪录中记上一“过”。<sup>④</sup>

---

① 菲·卡斯特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第2、7、9版。

② 参阅本书第67页。——译注

③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议题》，第8—9版。（后面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参考材料除注明具体来源者外，都出自这一来源。）另参阅《格拉玛报》，1976年3月1日。

④ 《关于劳动组织和工资的决议草案》，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73年11月11—15日；培尼亚：《中心报告》，第4版。

“历史工资”是指工人在1963—65年实行工资等级（以及七十年代修订）以前确定的工资和实行后相应等级的新工资之间的差额。这个多出的部分，对在实行工资等级制度后参加工作的新工人起抑制作用，因为他们得到的工资比做同样工作但较早受雇的工人要少。古巴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决定由行政部门和工会联合逐个审查，取消“历史工资”。如果发现某个工人具有专门技能，可以给他更高的职位；如果他不具备这种技能，就给他训练的机会。如果这个工人拒绝调动或重新受训练，那他的“历史工资”就被取消。<sup>①</sup>

大会通过的新的社会主义竞赛制度（这是自1961年以来所实行的第五个社会主义竞赛制度），对个人和集体生产竞赛中的优胜者实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办法。对个人的物质奖励包括优先享受假期和文娱生活，对集体（例如企业）则优先得到拨款，以建立或改善日间托儿所和体育、文化设施。精神奖励包括奖状、奖章、奖旗，以及诸如“全国劳动英雄”或“英勇奋斗企业”等光荣称号。评判竞赛的标准应是“客观的”，例如完成计划无需加班，降低成本，适当维修，提高质量等。<sup>②</sup>

政府正在作出努力，把新的物质刺激同工人的生产率密切联系起来。过去各种物质奖励在激发工人的积极性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之一是，这些鼓励大多数是公共性质的（如免费的社会服务），而不是直接同个人的劳动成果联系起来。为了解

---

① 培尼亚，《中心报告》，第4版。

② 《关于社会主义竞赛的决议草案》，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73年11月11—15日。

决这个问题，政府于1971年实行了一项“CTC—CI计划”。根据这个计划，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压力锅、手表等）不在商店供应，而由国内贸易部分配到企业去。供应品的单子贴在企业的布告栏上，有兴趣的工人就填表登记。工人委员会主要是根据申请人的态度和成绩（如完成定额的情况、生产率）而不是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安排先后。<sup>①</sup>

上述政策也适用于去海滨休养胜地度假，还特别适用于住房的分配方面。住房严重不足（尤其是在哈瓦那和其他城市）是由于1960年私营建筑完全停止以及大约在1962年大量削减国家房屋建筑而引起的。要防止住房短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每年至少要为十万户修建新的住宅。但在六十年代只建筑了少量的房屋。据卡斯特罗说，找他的人十个人有九个是为了房子问题；有多到十个人同住一间房的，许多离了婚的夫妇不能分居，许多未婚夫妻因为没有地方住而结不了婚。卡斯特罗说，房屋分配已经引起了混乱、不正常和不满情绪。人们未经许可就搬进房子里；另外也有些情况是分配不公平。<sup>②</sup>大批古巴人外流到美国去，使这一问题有所缓和，但1971年古巴政府限制了这种外流。1972年，人员外流暂停六个月，到同年年底在较小的规模上有所恢复，而在1973年年

---

<sup>①</sup> 参阅尼科尔森：《古巴内幕》，第56页；《关于民用电器分配的决议草案》，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73年11月11—15日。

<sup>②</sup> 菲·卡斯特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第3版；《总理会见来自四百八十七个哈瓦那劳动中心的代表》，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4月25日，第2—3版；《在庆祝保卫革命委员会成立十一周年集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0月10日，第3版。



中则停了下来，从而关闭了这一安全阀。

1971年年中，卡斯特罗提出一项减轻房荒的计划。国家提供建筑材料，产业工人则通过两条途径提供人力：正式工人每天自愿加班劳动两三个小时，加上星期六和星期天；通过实行“定额”从企业中解脱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可以长期做建筑房屋的工作，其余工人必要时自愿进行额外劳动，以保持生产水平。显然，第二种办法使用最多，但政府一直小心谨慎，以避免抽走那些离开就会使生产受到损失的工人。到1971年8月，组织了包括三千名工人的一百个“小队”。两年以后，小队逐渐增加到一千零六十八个，三万五千工人。每个小队约由三十三人组成，每天劳动十至十五小时。1973年年中，这些小队已建成住宅六千三百八十五所，还有三万七千五百所在建设中（另外还有人修建了学校、日间托儿所和医务室）。在这项计划开始时，有十个小队要求享有他们建造的房屋的权利。以后，就确定房屋可拨归劳动中心，这样，“生产单位〔企业〕与其工人所居住的房屋之间就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房屋根据工人的表现（主要是生产率），而主要不是根据他们的需要进行分配（按工资6%付房租，而没有所有权）。政府预计，按照这项计划，从1974年开始，每年将建成七万至八万所住宅。<sup>①</sup>

---

<sup>①</sup> 《在集会上的讲话》，第3版；哈瓦那电台在1971年末和1972年初的几次广播；菲·卡斯特罗：《在集会上的讲话》，第4版；《在五一节游行时的讲话》，第2版；以及《在国际劳动节庆祝游行时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5月13日，第2版；《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8月19日；《二十年以后的建设》，载于《流浪者》，1973年8月31日，第23页。

最后，这个新的经济管理制度还规定了一种“经济刺激基金”，以加强企业经营成果同工人所得的物质刺激之间的联系。这种基金的多少取决于企业的盈利率。除了别的用途之外它将用来提供企业工人的个人物质奖励，建设企业食堂、日间托儿所和文娱设施。<sup>①</sup>

### 糖业部门合理化

1970年的经济混乱，是以牺牲其他经济部门为代价而过分强调糖业部门所造成的。这个国家的基础结构和人力物力（糖厂设备、联合收割机、运输、技术人材）显然都不足以达到一千万吨的指标；再说，如果不严重消耗其他部门的人力物力，他们连大大超过六百万吨也是不可能的。野心过大的指标破坏了一部分糖厂，在1971—72年，它们还没得到修理或更换。<sup>②</sup>面对现实，糖的生产指标已经逐渐降低，劳动动员已经大为减少，重点放在寻找适当的替代办法（如澳大利亚的烧蔗法）、改进并扩大机械化等方面。

1965—70年的糖业计划要求投资十亿多比索，用于糖厂的扩充和现代化，但是1970年只落实了四亿比索。现代化显然是因为1971—72年机械的供应延期而推迟了。1959年有一百六十一家糖厂（大部分为二十年代末期以前兴建的）；但是十年之后，由于损坏、缺乏备件、拆用配件等等，糖厂的数字已减少到一百五十二家。1970年糖季利用陈旧设备全力以

---

<sup>①</sup>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管理和计划的决议》，第10—11版。

<sup>②</sup> 这一节关于糖的情况是引自梅萨-拉戈主编的《古巴的革命变革》，第301—311页；若干期《格拉玛每周概要》和哈瓦那电台的广播。

赴，又使四家糖厂停工。在1971年糖季，开工的工厂据说不断发生故障。1972年糖季开始时，据宣布将有一百四十四家工厂开工；但是到2月底只有一百三十六家工厂在生产，而两个月之后就只有一百一十五家在开工了。

专业的砍蔗工人，1958年是三十五万人，到1971年已减少不到七万三千人。动员城镇工人（“志愿劳动者”）并不足以代替专业的砍蔗工人，因为志愿劳动者缺乏技术，生产效率低。再者，1970年糖季过多地耗用城镇人力（约十七万人）使得工业产量急剧下降。1971年糖季动员的志愿劳动者约减少了六万人，1972年减少三万五千人，1973年减少二万五千人，1974年减少二万八千人。（政府预计在1980年糖季把总人力减至五万人。）糖季的天数从1970年的三百三十四天减至1972年的二百三十天。（在1969—70年糖季中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参加为期二至四个月的劳动，这在1971—72年糖季已悄悄地但大大地缩短了，因为他们的时间花在学习上要有益得多。）<sup>①</sup>

1973年，古巴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把无报酬的义务劳动一般限制在确实必要的任务上，对于糖季所需要的义务劳动尤其如此。各地工会应该挑选效率最高的砍蔗工人，以便减少义务劳动者的人数。过去，动员义务劳动者的费用（运输、伙食、电力、投入值）往往比他们创造的产品价值还要高。<sup>②</sup> 现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二千零九十五名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12月17日，第9版。

<sup>②</sup> 关于六十年代义务劳动的详情，参阅本人的文章：《社会主义古巴义务劳动的经济意义》，载于《工业与劳动关系评论》，第22期（1969年），第339—354页。

在,这种费用必须事先加以计算,如果“劳动成果还不足以补偿投入的人力、物力,那末这项动员就不合算,就是浪费。”决定使用义务劳动的工会必须仔细地衡量动员的几个因素:工人人数、工具、运输、伙食、临时住处、投入值和劳动定额。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必须对所作工作的效率作出分析。根据新的经济管理制度的规定,企业应向动员机构交付义务劳动“净值”(即毛产值减去动员费用),而动员机构将这笔收入再转交国家。宣传工具除有充分资料以衡量生产效率的情况外,均不报道义务劳动方面的活动。<sup>①</sup>

糖料收割的机械化,是代替大规模劳动动员的合理的办法,但正如卡斯特罗所承认的,这是“一个非常难搞的问题”。(另一方面,收割水稻、马铃薯的机械化已差不多完成了。)1967年,在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里成立了一个全国机械化指导组织,以主管机械化、进口设备和修理等工作。最轻而易举的任务是犁地;在1970年,已有二千台古巴制的糖料犁田机(“赫列拉”型号)在工作,甘蔗种植有一半实现了机械化。但约有一千台在1963—65年运来古巴的苏制砍蔗机太笨重、复杂,又易于损坏,因此在1967年就把它它们抛弃了。(在1970年的糖季中,曾试图再次使用这些砍蔗机,但仍未奏效。地势不平整是砍蔗机遇到的一个问题。1972年,在卡马圭省开始对大的甘蔗种植园的土地进行平整工作,这个省是地势最平坦而人力最缺乏的一个省份。)1967—68年,试用了古巴制造

---

<sup>①</sup>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议题》,第8—9版,《关于义务劳动的决议草案》,古巴工人中央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73年11月11—15日。

的砍蔗机(“亨德森”型和“解放者”型),效果尚好,但必须安装在进口的推土机上,而且能够生产的数量不多(如1969年只生产了一百五十台,而需要量约为三千至四千台)。1970年底,卡斯特罗抱怨说,“用手工制作一台机器是一回事,而大量生产机器并使它们运转自如却完全是另一回事。”<sup>①</sup>1971年9月,古巴向澳大利亚马西·弗格森公司购买了一百台砍蔗机,用于1972年糖季生产(据说这个糖季一共动用了二百五十台机器)。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在古—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苏联同意帮助古巴制造经过改进的“解放者”型和“亨德森”型砍蔗机,并提供一种新型的砍蔗机(称为KTP—1型),这种新机器是苏联和古巴的工程师根据1971年糖季的经验而设计的。1972年年中,苏联宣称将向古巴运去一套制造KTP—1型砍蔗机的新工厂设备;有五十台在苏联制造的这种砍蔗机已在1973年糖季中试用。1973年初,据说古巴KTP—1型砍蔗机厂的建设工程将在当年在奥连特省的奥尔金动工。从KTP—1型身上看到的一些缺点显然已经去掉,从而产生了性能较好的KTP—2型。工厂终于在1977年年中举行开工典礼;预计在1978年生产二百五十台KTP—1型和五十台KTP—2型,1980年总数将达到六百台。糖料收割的机械化发展情况如下:7%(1972年),12%(1973年),19%(1974年),26%(1975年),33%(1976年),42%(1977年)。1980年的指标是60%。<sup>②</sup>

---

① 菲·卡斯特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第3—5版。

②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12月10日,第9版和1973年1月14日,第2—3版;何塞·巴斯克斯:《关于糖季的五个问题》,载于《古巴国际》第5期

当前使用的砍蔗机不仅数量少，而且还不能清除甘蔗的叶子和废料(据说只有“解放者”型砍蔗机能干这种工作)，而这种工作占了收割甘蔗的工作量的一半。甘蔗清理中心(它使用机械方法清除蔗叶)曾在1966年进行试验；到1971年底建立了二百个中心，还计划在1972年糖季再建立三百个中心。要是这些中心建成的话，它们会清理全部砍下的甘蔗的一半，但是据说实际上在这些中心加工的甘蔗只有20%。到1977年，只有五百个中心在工作。砍下的甘蔗的装车工作(装入车辆、铁路货车)，机械化程度在1973年达到80—90%，使用约四千台安装在旧式美国拖拉机上的吊车和进口的、专为装运甘蔗而制造的苏联起重机。1977年，机械装车已达到98%。1971年下半年，苏联同意给古巴一千六百部车子(2—PTT—6型)，作1972年糖季运输甘蔗之用，同时，一家制造这种车子的工厂在1973年初开始兴建，使机动车辆运输增加到60%。

为了减轻上述的一些难题，甘蔗研究中心在1970年糖季进行了一次关于澳大利亚烧蔗砍蔗方法的调查研究。<sup>①</sup>(除澳大利亚外，过去二、三十年中在夏威夷、墨西哥、秘鲁和南非也采用这个方法。)在1971年1—2月，小规模试行了这种澳大

---

(1973年)，第16—17页；马塞洛·费尔南德斯·丰特：《1973年联合国糖业会议》，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6月24日，第10版；《古巴：甘蔗机械化》，载于《直接来自古巴》，第173期，1977年7月15日，第5—6页；《奥尔金KTP—1型甘蔗收割机制造厂》，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7年7月24日，第10版。

① 甘蔗研究中心：《蔗田火烧法对蔗糖生产的影响》，载于《经济与发展》，第10期(1972年)，第92—118页。

利亚方法；随后有 60% 的甘蔗采用烧蔗法。<sup>①</sup>这种方法显然节约了多达 62% 的大量人力。烧过的甘蔗不需要清除叶子和污物，用不着再砍为两截，重量也减轻了，并且不用堆起来。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方法也造成了新的麻烦。为了顺利地使用这种方法，必须整理好土地，需要一种特别品种的甘蔗（蔗茎要同样大小），必须更频繁地移植，要把蔗苗种在一定的深度和保持一定的距离，还必须使用特别的肥料。烧的过程要慎重计划：要根据甘蔗的成熟程度拟订一个计划；烧蔗要在日落时进行；烧得过度会招致糖分的损失，烧得不够则会使废物遗留在甘蔗上，这两者都要避免。经常存在着火势蔓延，以及烧过的甘蔗放在田里太久才送去压榨而造成损失的危险。既然甘蔗不砍为两截（象用人工砍的那样），也不堆起来，这样，当时使用的传统设备就遇到了问题。起重机难以吊起没有堆在一起的甘蔗。长长的甘蔗杆儿卡在过于狭窄的车皮里，而运到糖厂的甘蔗有 70% 是靠铁路运输的。在砍蔗中心，发动机太热了，有时烧坏了。古巴人最普通的砍蔗工具砍刀（在收割中，58% 使用这种砍刀）太长太窄，而澳大利亚工具（要短些和宽些）又不受砍蔗工人的欢迎。最后，还必须穿戴特殊的衣服和安全设备（护腿的钢垫和加厚的手套），而工人们不肯戴手套，因为戴上以后动作不便，而且磨手。

1971 年下半年，试行了几种措施来解决这些难题。例如，

---

<sup>①</sup> 甘蔗研究中心、科学技术情报中心和哈瓦那大学：《1971 年糖季使用的澳大利亚砍蔗法》，第 8 辑，第 8 期（哈瓦那：农工业考察中心，1971 年 12 月）和《古巴引进澳大利亚砍蔗法》，载于《经济与发展》，第 15 期（1973 年），第 48—71 页。

在起重机上安一个“推动器”把甘蔗堆积起来；在清理中心把甘蔗砍为两截；为了避免清理中心的发动机过热，减低送料带的速度；试用中国砍刀（比古巴砍刀小些和宽些，类似在古巴32%的收割工作中传统使用的“宽砍刀”）；取消手套。结果形成一种略加改变的澳大利亚方法，据说其生产效率为古巴沿用的传统方法的两倍，但只及纯粹澳大利亚方法的效率的三分之一。

没有得到1972年糖季有关略加改变的澳大利亚方法应用效果的数据，但是有产糖率的数据，表明事情并不如意料的那么好。（产糖率是工厂榨得的糖与已收割甘蔗的重量的百分比。每一百吨甘蔗可榨出原糖八到十四吨，这取决于蔗叶是否除净以及甘蔗的含糖量和糖厂设备的效率如何。）革命前的产糖率一直在12%以上，但在1965—69年下降到11.8%，1970年糖季的产糖率很低，为10.9%，主要是由于甘蔗的产量过大。1971年糖季，产糖率上升到11.5%，但1972年糖季又降到10.5%。<sup>①</sup>产糖率下降不能归咎于干旱，因为这两季都受旱灾影响；事实上1971年甘蔗成熟期的降雨量比1972年同期还要少。设备日益陈旧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不是重要原因，如果我们假定那些机器运转有困难的糖厂在1972年并未开工的话，（这或许影响一季的总产量，但不一定影响其产糖率。）这两季收获有一个重要的差别：1971年糖季中实行澳大利亚方法的不到三分之一，但1972年糖季却全面实行。也许是烧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庆祝攻打蒙卡达兵营十八周年集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8月1日，第4版；菲·卡斯特罗：《在五一节游行时的讲话》，第3版。



蔗不当,甘蔗处理中心少而造成积压,以及因使用新技术而产生的困难,致使甘蔗糖份受到损失。由于这些问题,1973年就不再实行澳大利亚方法了。

1972年7月1日,多尔蒂科斯总统宣布,从1973年开始,古巴将不试图生产大量的食糖,而只生产这个国家能够生产的适当数量的食糖。<sup>①</sup>食糖工业部同时宣布糖厂的维修在1973年占优先地位。后来据说肥料将在1974年增加30%。<sup>②</sup>国家科学院院长宣布在1973—77年将把电子计算机技术运用于糖业生产。<sup>③</sup>合理化的趋势似乎在继续,但澳大利亚方法在未来将起什么作用就不清楚了。

### 放弃过去的错误作法和实行新政策的影响

卡斯特罗在1975年底古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心报告中检查了1966—70年古巴领导人在经济方面所犯的“错误”。他的讲话十分惊人地证实了我在六十年代末期的几部著作和本书的第一版中所分析的中国一格瓦拉派的缺点。卡斯特罗是以下面的话开始作痛苦的自我批评的:

必须谈一谈〔唯心主义的〕错误。革命往往要经过空

---

① 奥·多尔蒂科斯的讲话,1972年7月1日哈瓦那电台广播。两个月以后,总统肯定了他先前的讲话,并说1973—75年的指标“在数量上已差不多确定下来了”,1976—80年指标的制订工作已经开始,但他没有宣布关于这些指标的任何数字。《在第四十次蔗糖技术员会议上的闭幕词》,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9月10日,第2版。

②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5月20日,第11版。

③ 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古巴科学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3月5日,第4—5版。

想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领导者们……认为历史性的目标已经很近了,人的意志、希望和意愿高踞于客观事实之上,可以实现一切。……有时随着这种乌托邦式的态度还会有点轻视别人的实践经验。……从一开始起,古巴革命就没有利用其他国家的人民远在我们之前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如果我们谦虚一些,我们就能懂得革命理论在我国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我们确实缺少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真正有意义的贡献。……虽然当时由于经济封锁和我国的不发达状态,我们的条件极为困难,但是如果利用得当,这些经验本来是会给我们很大帮助的。①

接着,卡斯特罗更加具体地谈到所犯的一些错误。他说:“按照预算提供资金的制度〔是〕格瓦拉搞起来的”,但是“结果使经济高度集中,并在利用经济杠杆、商品关系和物质刺激方面限制太死。”自筹资金制度只是部分地、有限制地实行;这种制度,我们“当时似乎认为资本主义味道太浓了”。这两种制度同时实行了一阵子,然后“我们作出了不那么正确的决定,即创造一套新的作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并脱离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经验,而确定了我們自己的办法”。卡斯特罗派的“创造”既不是自筹资金制度,也不是真正按照预算提供资金的制度,因为国家预算和簿记制度都已经取消了。工资和产量之间的联系割断了,完成不完成定额失去了意义,提倡自觉地实行工时计划,鼓励放弃加

---

① 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年1月4日,第2版。

班费，取消了贷款的利息，停止向农民征税，并在大学里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和公共会计学课程。“由于没有注意按劳取酬（再加上需要消灭失业现象），在缺少商品和公用事业的情况下，过剩的流通货币显著增加了。这就……造成了旷工现象并引起了劳动纪律问题。当时可能看起来好象我们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形式更接近了，其实我们背离了先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法。”<sup>①</sup>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旧政策和新政策对生产的影响。表3概括了古巴在三个时期内总的经济状况：1963—65年（关于选择制度的辩论），1966—70年（中国—格瓦拉主义），1971—75年（苏联方式的现实主义）。表里的数据是指物质总产值，它不包括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服务事业（如运输、商业、教育、保健）的价值。没有1959—61年的数据；表中数字以1962—63年度为基数，这是整个革命时期经济工作的低潮年度，因此1964年的增长给人以错觉；1967—75年的数字没有根据通货膨胀来校正，因此增长率就比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数字要高（例如，真正的物质总产值在1967年下降9.3%，但在这个表上增长2.4%）。<sup>②</sup>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仍可以认为表3适当地反映了整个革命时期的增长情况。它表明1963—65年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低，然而稳步发展的，按绝对值平均增长3.8%，按人口平均增长1.2%。但在1966—70年，经济严重恶化，按绝对值平均下降到0.4%，按人口平均下降到-1.3%。在1971—75年，经济迅速恢复，出现了革命时期增长率的最

① 同第78页注释①。

② 参阅梅萨-拉戈主编的《古巴的革命变革》，第331页。

表3 古巴经济的增长(1963—75年)

年 份	年增长率	物质总产值 <sup>a</sup>	
		各个时期的平均增长率	
		按绝对值	按人口平均
1963	1.0	3.8%	1.2%
1964	9.0		
1965	1.5		
1966	-3.7	0.4%	-1.3%
1967	2.4		
1968	7.2		
1969	-4.5		
1970	0.6	14.7%	13.0%
1971	14.7		
1972	25.3		
1973	11.1		
1974	10.5		
1975	12.1 <sup>b</sup>		

注：a. 1962—66年按不变价格计算，1967—75年按现行价格计算；

b. 全部社会产品。

资料来源：古巴共和国中央计划委员会中央统计局，《1966年统计公报》（哈瓦那，1969年），第20页；《1971年统计公报》（哈瓦那，1973年），第44—45页；《1972年古巴统计年鉴》（哈瓦那，1974年），第30—31页；《1973年古巴统计年鉴》（哈瓦那，1975年），第35页；《1974年古巴统计年鉴》（哈瓦那，1976年），第35页；《1975年古巴经济》（哈瓦那，无出版日期），第1—3页。

高记录：按绝对值平均增长14.1%，按人口平均增长13%。这个使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一部分是由于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特别是在1971—72年），同时也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破纪录的糖价（每磅从1970年的四美分增长到1974年11月的六十五美分）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两个原因的影响是无法分

开的。<sup>①</sup>

表4概括了二十六种主要的农业、矿业、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趋势，分四个时期加以比较：经济实现集体化以前（1960年），实行中国—格瓦拉主义的前夕（1965年），中国—格瓦拉主义的末期（1970年），经济恢复以后（1975年）。除下面将谈到的少数情况外，农业和传统工业的生产或者是（1）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增加，1966—70年下降，随后又恢复了（如电冰箱、雪茄、纺织品、盐、煤气灶、收音机、酒、汽水、水果罐头、肥皂、西红柿）；或者是（2）在六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下降，但到1975年又恢复了（如烟草、咖啡、丝兰、芋头、马铃薯、水泥、纺织品、啤酒）。在少数现代的、资本集中的、机械化的部门（如蛋品、鱼、镍、电），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生产都在逐步增加。食糖生产情况特殊，1970年创造了高达八百五十万吨的纪录，但在七十年代却下降了。水稻的种植面积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大为减少，1966年古巴同中国（古巴主要的大米供应国）发生争吵，迫使古巴再次扩大稻田，但直到1975年才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除了少数例外，1970年产量水平低于1965年，不过，在1975年大多数产品的产量已经恢复过来，超过了1965年的水平。

所以，表3和表4生动地说明了试行中国—格瓦拉主义的灾难性的失败。五年间的经济损失，估计在20%（如以1963—65年平均增长率计算）与70%（如以1970—75年平均

---

<sup>①</sup> 关于1971—77年古巴经济情况的全面分析，参阅科莱·布莱齐尔和卡梅洛·梅萨-拉戈合编的《世界上的古巴》（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78年）一书中卡梅洛·梅萨-拉戈著的《古巴经济的现状和前途与国际经济关系》。

**表4 古巴部分产品的实物产量：1960—75年与1980年指标**  
(单位：除注明者外，均为千公吨)

产 品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糖	5,943	6,156	8,528	6,200	8—8,700
烟草	45	43	32	43	60
柑橘	73	160 <sup>d</sup>	155 <sup>e</sup>	199	350—400
咖啡	42	24	20	29 <sup>f</sup>	—
蛋品(百万个)	430	920	1,509	1,770	2,000
大米	323	50	291	338	—
丝兰	255	62	22	83	—
芋头	257	47	12	32	—
马铃薯	97	84	77	88	—
西红柿	116	120	62	184	—
鱼	31	40	106	144	350
镍	13	28	37	37	100
盐	92 <sup>c</sup>	106	89	138 <sup>f</sup>	—
电(百万度)	2,981	3,387	4,888	6,583	9,000
水泥	813	801	742	2,083	4,000
纺织品(百万平方米)	116 <sup>c</sup>	96	78	140	260—280
轮胎(千个)	364 <sup>c</sup>	197	202	391 <sup>f</sup>	—
肥皂	34 <sup>c</sup>	37	33	40 <sup>f</sup>	—
电冰箱(千个)	0	12	5	50	100
煤气灶(千个)	9 <sup>c</sup>	10	6	45 <sup>f</sup>	—
收音机(千台)	0	82	19	42 <sup>f</sup>	300
啤酒(十万升)	1,394 <sup>b</sup>	993	659 <sup>e</sup>	1,808 <sup>f</sup>	—
酒(十万升)	154 <sup>c</sup>	170	170	198 <sup>f</sup>	—
汽水(十万升)	2,372 <sup>c</sup>	2,406	871	1,710 <sup>f</sup>	—
水果罐头、蔬菜	64 <sup>c</sup>	80	39	84 <sup>f</sup>	—
雪茄(百万支)	591 <sup>a</sup>	657	277	378 <sup>f</sup>	—

注：a. 1959年，b. 1961年，c. 1963年，d. 1966年，e. 1969年，f. 1974年。

资料来源：卡·梅萨-拉戈：《社会主义古巴的统计资料的可用性与可靠性》，载于《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4期(1969年春季和夏季)，第53—91页和第47—81页；《1971年和1974年古巴统计年鉴》；《1975年古巴经济》；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革命方针部：《关于1976—80年五年计划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针、议题和决议》(哈瓦那，1976年)。

增长率计算)之间。这两个表还显示了七十年代前半期的现实主义经济政策的实际效益。但在1976—77年,由于糖价猛烈下跌(1977年初低落到每磅七美分),还可能由于古巴在安哥拉进行军事活动对经济产生了副作用,经济增长显著地减缓了。

### 估价和展望

走向现实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于1970年开始实行。接着,工业和渔业生产作出了好成绩,但是糖业情况糟糕,糖业以外的农业生产也不很突出。造成这种不同结果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旱灾,这是本世纪中最严重的旱灾之一,水坝拦蓄的水比平均水位下降了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sup>①</sup>牲畜的疫病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使由于1970年糖季的动员而陷于严重混乱的经济恢复产量,必须大量削减从工业方面抽调的人力,而这样做就不能不影响到糖业部门。1972年糖季大规模采用澳大利亚收割法和机器设备日益损坏也可能影响了产量。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苏联的援助、修理和维护以及组织方面的改善和对劳动产量(如工作定额)的控制,能够轻易地使工业产量和生产率特别是在现代的、集中的工厂里的工业产量和生产率得到迅速增加,但是在分散的、落后的和无法预测的农业部门就不那么容易了。七十年代实行的大部分经济刺激(如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住房计划)基本上只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全国小农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1月9日。

能吸引城市工人，而不能吸引农村劳动者和私有农民。最后一个重要原因是，走向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只有到1980年才能彻底完成。

假定当前的现实主义趋势继续不变，就总的经济增长来说，前景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虽然不是非常壮观的。在这方面，古巴总理说过：“我国人民在物质方面的目标不能雄心很大……。在今后十年中，我们应该以平均每年增长6%的速度发展我们的经济。”<sup>①</sup>然而，随着糖价的下跌，实际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6%的目标。今后三、四年内古巴的生产情况可以谨慎地预测如下：在糖业部门，将有五、六百万吨的中等水平（七十年代末期，机械化将有所发展，可能达到七百万吨）；在糖业以外的农业部门，将恢复以前的产量（如烟草），机械化农业部门（如大米、马铃薯、西红柿）或现代化企业（如家禽、蛋品）可能有较大的进展；在畜牧业方面，肉类的产量将停滞不前，但奶的产量会有所增加；渔业产量将持续稳步上升；在工业方面，特别是能够推动发展的部门（基础工业、矿业——尤其是镍——燃料、冶金和电力）将有稳步的、适度的增长。钢的生产在八十年代以前将不会开始。到一九八〇年（特别是如果美古关系完全实现正常化），旅游业将大大发展，并再次成为这一岛国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从历史趋势和1976—77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如在糖业、柑橘、镍、渔业等部门）的情况看，当前的五年计划为1980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二十周年主要仪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8月5日，第5版。



年所定的并在表 4 列出的大部分产量指标，都太乐观了。如果能实现某些必要的前题，有些指标是可以达到的（如蛋品、电力、电冰箱）。

### 第三章 政治与社会： 走向体制化

六十年代末期，古巴的政治结构成了一些同情古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批评的对象。他们认为，决策都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组成的小集团来制定的，他不愿意把权力付托于别人。党和工会几乎失去了作用。政府领导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群众，而不与他们商量，古巴社会已经逐渐军事化。因此，改革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已经刻不容缓了。不管是由于这一批评的结果，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在1970年下半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承认了批评者所指出的一些缺点，答应要大力进行改革，分散国家行政管理权，使工人运动和其他群众组织恢复活力和民主化，允许群众参加决策和对国家职能进行监督。

本章首先概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和卡斯特罗关于改革的诺言。接着，将详尽地叙述七十年代所进行的旨在分散政府职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党、整顿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并使之民主化、以及实行群众参政的各种形式的改革。此外，将讨论与改革同时采取的加强政府对工人、小农、青年和知识分子控制的措施。本章结尾将分析古巴正在进行的这种类型的体制化，这种体制化包括两种相反的趋势：一种趋势是实行权力分散和民主化；另一种趋势是在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实行

集中和严格的控制。

###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政治结构的批评

在古巴的“革命攻势”(1968—69年)中,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访问了这个岛国,其中绝大多数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邀请的。<sup>①</sup>这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访问者都是世界著名的各种问题的专家,从前都到过古巴——有些当过古巴政府的顾问——后来又曾写过同情古巴革命成就的报道。他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赞同实行一种更为民主的、群众参政的社会主义。如果说他们最初曾期望在古巴看到他们所梦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的话,那么1969年和1970年他们所发表的著作和文章,虽然总的说来还是支持古巴革命的,但在这一方面却表示了失望。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和已故的利奥·休伯曼最先指出古巴革命正走向专制独裁,并且建议另外一种作法,即让人民参加决策并分担责任。<sup>②</sup>法国计划专家、思想家夏尔·贝特兰在同斯威齐争论时,批评古巴的领导人是小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集中一切权力于自己手中,因而形成了一个阶级。他还指责这个阶层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强加在群众头上,剥夺了群众独立行动的权利,而且没有为民主地行使无产

---

<sup>①</sup> 关于古巴这些年形势的叙述,参阅作者的文章:《古巴的思想激进化和经济政策》,载于欧文·路易斯·霍罗维茨主编的《古巴的共产主义》(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会报书店,1972年),第93—122页。

<sup>②</sup> 利·休伯曼和保·斯威齐:《古巴的社会主义》(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9年),第201—218页。

阶级权力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创造任何必要的条件。<sup>①</sup>

美国社会学家莫里斯·蔡特林发现古巴共产党没有实权，工会似乎已经失去作用。他还指出：“建立制度以保证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一致意见之中也能听到反对的意见，保证对各种有意义的选择方案进行辩论，以及保证一般公民不仅执行政策而且提出政策，在这些方面，迄今为止，古巴革命者所做的工作微乎其微。”蔡特林断定，古巴人必须在专制独裁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体二者之间进行抉择。<sup>②</sup>

法国农学家勒内·迪蒙在第三次访问古巴时观察到，卡斯特罗由于对基础缺乏信心，不愿意与他人分工负责，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是在政府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制定，其结果导致了个人至上、家长式统治和强迫命令的发展。中央强行控制居民、大学和新闻界，在教育、劳动力、农业、经济等方面和整个社会普遍实行军事化。迪蒙建议：卡斯特罗放弃一些权力，或者由他的可靠的同僚促使他这样做；要精简行政机构；多给地方单位一些自主权和主动权；重大的问题经由公众讨论；党和国家机构由工人控制。<sup>③</sup>

波兰血统的英国新闻工作者、作家K·S·卡罗尔断言，到1968年，古巴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名存实亡了，工会既不是自治的组织，也没有权利表达和捍卫会员的要求，古巴的统治者认

---

<sup>①</sup> 1968—69年的《每月评论》发表了这次争论的文章并汇编成《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1年）。

<sup>②</sup> 莫·蔡特林：《古巴内幕：工人与革命》，载于《壁垒》，第8期（1970年3月），第20、70—78页。

<sup>③</sup> 勒·迪蒙：《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巴黎：青年时代出版社，1970年），第134—223页。

为，他们最知道如何理解工人阶级的思想和需要。按照卡罗尔的说法，卡斯特罗既不同意中国的文化革命，也不同意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之春，因为他害怕不受约束的、自发的力量所发动的变革，也怀疑广大群众的独立行动。<sup>①</sup>

1970年年中，经济混乱，工人普遍旷工，随着甘蔗的歉收群众不再抱有幻想了，在这种情况下，古巴领导人似乎重新考虑了他们以前的看法。7月26日，卡斯特罗承认了他自己的错误；8月，他宣布了古巴革命的“新阶段”；在秋季，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提出了几项措施，以纠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指出的绝大部分缺点。

### 1970年关于改革的诺言

1970年从5月到12月，卡斯特罗发表了很多讲话，强烈地批评政府过度集权和官僚主义化、古巴共产党承担行政职责、夸大政府在所有国家事务中的作用（此种做法扼杀了群众的积极性）、国营企业一长制（这种制度不允许工人发表意见）、以及群众组织缺乏战斗力和不民主的状态。他提出若干分散行政权力的措施，把任务分散给各主要政府机构，允许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加强群众组织并使之民主化，建立渠道以便使这些组织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首先，卡斯特罗宣布，今后古巴共产党的作用将限于协调和监督行政职责。<sup>②</sup> 为在党内分清政治与行政职责，卡斯特罗

<sup>①</sup> K·S·卡罗尔：《执政的游击队：古巴革命的进程》（纽约，希尔—王氏出版社，1970年），第329—330、410、457—458页。

<sup>②</sup> 菲·卡斯特罗：《关于1970年糖季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0年5月31日，第12版。

建议，除政治局外，在中央委员会设一个“社会生产局”，以协调行政管理活动。另一个步骤是，卡斯特罗承认仅仅通过部长会议指挥整个国民生产已经不可能了，他宣布把职责相关联的中央各部分成几个组，这些组将帮助制定计划和协调各部职责。这样，一个组将管理资本货物（或中间产品）的生产（包括基础工业部和矿业、冶金、燃料部），另一组管理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包括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国内贸易部），再一组管理劳动力（包括劳工部、教育部和武装部队部）。第三，卡斯特罗说，企业的行政管理将不只是管理人员的任务，而是由管理人员主持的与工人、党和青年及妇女组织的代表相结合的“集体机构”的任务。<sup>①</sup>几天之后，劳工部长豪尔赫·里斯克特说：“管理人员的错误可能一个接着一个，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出现，到处都在发生，……工人对此毫无办法。……如果一个工人只是个生产者，他从不提什么意见，也不能做任何决定，从来也不与他商量工厂的管理事宜，又怎么能够使他更加关心自己的岗位工作和生产目标呢？”里斯克特又说，正在讨论群众参加生产管理的形式，以便与工人共同讨论企业的产量计划和长期的决策。<sup>②</sup>

群众参加管理不限于企业，卡斯特罗宣布：“我们必须开始以民主的方法代替行政的方法，行政的方法有产生官僚主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十七周年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0年8月2日，第2—6版。

<sup>②</sup> 豪·里斯克特：《关于劳动力和生产率问题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报》，1970年8月1日，第5—6版。

义的危險。”<sup>①</sup>民主化进程将是群众参加制定决策的基础，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要经历这一进程。<sup>②</sup>他承认工会运动的状况不好，必须通过民主化（自由选举），使其恢复活力。应该允许工人运动捍卫工人的权利。其他群众组织（如青年、小农、妇女组织）都要效法工会的民主化。卡斯特罗进一步说：“从群众组织开始，〔我们将〕成立其他组织机构，有工人、妇女、青年代表参加，目的是使他们对地方一级的一切活动〔包括党的活动〕实行严密的监督和控制。”<sup>③</sup>

今年年底，卡斯特罗详细地说明了他所提出的群众参加管理的方案：“〔为什么每件事〕必须直接由政府管理呢？……这立刻就需要有超级组织机构，〔结果使得公民漠不关心〕……。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有责任建立一些环节和机构，通过这些环节和机构将使公民意识到他的责任并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中央机构只应行使具有全国性因而必须集中行使的职能，其他职能应转让给由工人代表和青年代表、妇女和学生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县、区机构。卡斯特罗举例说明如何才能完成这件事：“〔国内贸易部〕应继续经营批发业务，并制定商品销售方针，但应取消其经营杂货店的任务……。应该由群众组织的代表来处理有关公众的事宜。”他报告说，在哈瓦那东部的佩涅尔维尔这个小镇进行了一项试

① 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妇女联合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0年8月30日，第4—5版。

② 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省一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0年9月20日，第4—5版。

③ 菲·卡斯特罗：《在纪念保卫革命委员会成立十周年集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0年10月4日，第4—5版。

验,镇上约有八户邻居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点,用国家供给的  
建筑工具和材料修建了一个棒球场和一个公共车库,并维修  
了一些道路。但他警告说,在动员群众力量之前,要拿出必要  
的时间认真研究所提出的任务。<sup>①</sup>

### 政治职能的分立:政府、党和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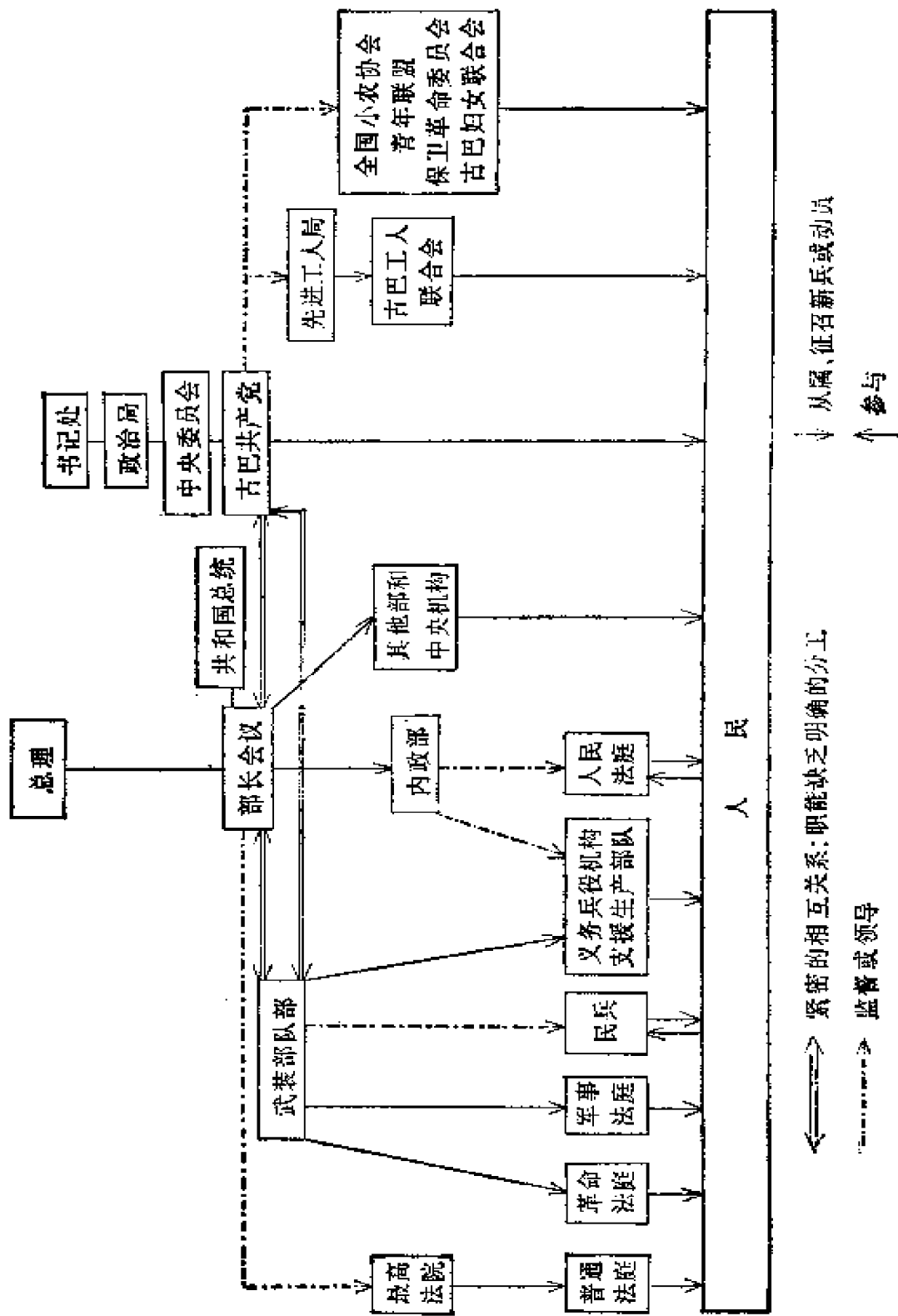
当1970年卡斯特罗认为需要分立政府和党的职能时,他  
指的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六十年代古巴政治结构的主要特  
点是纷乱不清,中央政府、党和军队三个主要机构及其职能无  
明确的划分。卡斯特罗操纵着一个迷信领袖超凡魅力的个人  
崇拜式的政府,其特色是权力集中在“最高领袖”及其忠诚分  
子的核心集团手里,而缺乏体制化。以卡斯特罗为首、由其最  
亲密的伙伴组成的部长会议,控制着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职  
能的政府。不过中央机构中大多数部长和主任都来自起义  
军。除了刚成立的一段短时期(1961—62年初,当时人民社会  
党党员还有很大的影响),党一直掌握在卡斯特罗分子手里。  
1965年,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三分之二来自军队。  
实际上,卡斯特罗及其小集团占据了党、政、军的最高职位;他  
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身兼任总理、党的第一书记和武装部  
队总司令的职务(图1)。尽管不断地出现变化和危机,军队  
是唯一日益变得专业化、体制化和有效率的组织。因而军队  
承担越来越多的非军事职能(如组织生产,批判反抗的知识分  
子,收割甘蔗),到六十年代末期,军队已渗透到古巴社会的很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全国基础工业全体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  
拉玛每周概要》,1970年12月20日,第2—3版。



图1 六十年代末古巴政治-行政体制



从属、征召新兵或动员

参与

紧密的相互关系: 职能缺乏明确的分工

监督或领导

多方面。<sup>①</sup>七十年代实行的改革表明，已宣布的政府内部职能的分立不仅涉及政府和党，而且也牵涉到军队。此外，这三个机构都正在经历一个改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下放权力，但由中央进行协调，党恢复活力，军队实行专业化。七十年代总的趋势看来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走向体制化。

1972年底，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的成立，似乎是总理权力下放、实行中央协调的一个步骤（见第一章）。执行委员会由总理担任主席，和九名“副总理”共同组成<sup>②</sup>，副总理是古巴从前没有的、典型的苏联等级制度的职位。每个副总理协调几个部和国家机关，各部和国家机关是按下列部门组合在一起的：基础工业和能源；消费品工业和国内贸易；糖业；非糖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劳动、计划和外贸；对外关系；教育和文化。<sup>③</sup> 这项措施是卡斯特罗 1970 年宣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协调计划和生产。

继行政权力改组之后，1973 年年中又进行了司法制度以及刑法典和程序法典的改革。1970 年开始的这项改革是“革命新阶段”的一部分，是在布拉斯·罗加领导下进行研究的。

---

<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参阅安德烈斯·苏亚雷斯：《古巴：1959—66 年卡斯特罗主义与共产主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7 年）和《领导、思想和政党》，载于梅萨—拉戈主编的《古巴的革命变革》，第 3—21 页。

<sup>②</sup> 此处有误。应为八名副总理。根据古共中央政治局旨意，部长会议于 1972 年 11 月 24 日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由菲德尔·卡斯特罗任主席，同时任命了七名副总理，加上原第一副总理劳尔·卡斯特罗，共八名副总理，组成执行委员会。——译注

<sup>③</sup> 《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成立》，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 年 12 月 3 日，第 3 版。

罗加是个外行，但他是前人民社会党主席，自1965年以来是古巴共产党法律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sup>①</sup>该委员会也正在从事制定新政治宪法和改革民法典的工作。1973年的改革反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制度，而确定部长会议是包括三权和宪法职能的“最高的、唯一的权力机关”。这一改革使司法系统依照等级从属于行政部门。司法系统最高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委员会”，“由它〔向下级司法机关〕传达革命领导人发出的强制执行的各项指示，而不遵循司法机关独立解释法律的制度。”新的司法系统统一了四个司法部门：普通法庭、军事法庭、革命法庭（政治犯罪）和人民法庭（触犯社会道德的轻微罪行）。<sup>②</sup>统一法庭不得对共和国总统、总理、副总理和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行使司法权，他们犯罪只能由党的特别法庭审判。<sup>③</sup>废除私人律师，所有律师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必须坚持和宣传革命思想。希望律师们“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以战斗的精神支持革命事业。被告在受审时只能请国家律师，即便在国家作为案件之一方的情况下也不例外。<sup>④</sup>

古巴共产党在中央一级有两个执行机构：政治局和书记

---

<sup>①</sup> 布·罗加：《新的司法制度》，载于《古巴国际》，第3期，（1971年）第72—75页。

<sup>②</sup> 何塞·加夫列尔·古马：《司法制度的统一》，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9月5日，第8版。另参阅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在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委员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7月15日，第4—5版。

<sup>③</sup> 拉丁美洲通讯社（哈瓦那），1971年7月1日。

<sup>④</sup> 古马：《司法制度的统一》，第8版。

处,最初分别由八个和六个成员组成,都以卡斯特罗为首。党的审议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初期是由约一百名委员组成,按理说,政治局和书记处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但实际上都是在1965年任命的,几乎十年没有任命新的成员(以补上因死亡和清洗造成的空缺)。在党成立初期,中央委员会的构成情况如下:军人占67%(包括五十七名少校),专业人员占26%,工人占7%。在六十年代,古巴共产党执行和审议机构很少开会。古巴六个省都设有党的书记处,由它们领导下一级的区、县委书记处。在多数的重要企业、国营农场、政府机关、军事单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975年以前没有召开过党代表大会,没有党纲和党章,党员人数很少。<sup>①</sup>

1973年,书记处增加到十人,四个新职位都已配齐(新书记之一是古巴驻苏联大使)。<sup>②</sup>古巴共产党执行机构也定期召开会议了:每周召开一次书记处会议,两个月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却没有消息。这一年,据报道,除了六个省的书记处外,有六十个区书记处,四百零一个县委书记处,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个地方基层组织。<sup>③</sup>

1969年只有五万五千名党员,在此后的六年里,通过挑选发展对象、政治教育和吸收新党员,悄悄地努力开始增加党员人数。1971年党员人数增加到十万零一千,1972年为十二万

---

<sup>①</sup> 作者的估计是根据公布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载于《橄榄绿》,第6期(1965年10月10日)。

<sup>②</sup> 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胜利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4年1月13日,第3版。

<sup>③</sup> 乔治·沃尔斯基引自《党的生活》(莫斯科),1973年4月10日;《十五年后的古巴》,载于《现代史》,第66期(1974年),第11页。

二千，1973年为十五万三千，1974年为十八万六千九百九十五，1975年为二十万二千八百零七。<sup>①</sup> 1975年古巴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虽仍很少（只占人口的2%，占劳动力的7%），但在六年中几乎增加了四倍。据报道，也曾努力扩大党员的无产阶级成份。<sup>②</sup> 党员和发展对象都上政治教育课，这种政治教育课完全照抄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sup>③</sup>

1966年卡斯特罗宣布，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下一年召开，但没有举行，接着代表大会又预定在1969年举行，之后又以全国的力量必须集中于1970年的蔗糖生产为借口而取消了。1973年下半年，卡斯特罗又许下诺言，代表大会将于1975年举行，不再改动。<sup>④</sup> 会前，精心地起草了准备提交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和决议草案。这些文件发至省、区、县委书记处以及地方基层组织进行讨论。<sup>⑤</sup> 经过地方、省和中央的各级选举，产生了一千一百一十六名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提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

代表大会终于在1975年12月17日—22日召开了，其

---

① 同上，奥·多尔蒂科斯：《第一次全国党内教育活动》（哈瓦那，革命指导委员会出版，1971年第16期）；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年1月4日，第2版。

② 1973年8月洛德斯·卡萨尔在古巴收集的情况。

③ 1973年很多期《格拉玛报》上发表了这些课程中所使用的材料。

④ 苏亚雷斯：《领导、思想和政党》，第10、18页；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起义青年报》，1973年11月16日，第10版。

⑤ 塞昆迪诺·格拉·伊达尔戈：《代表大会：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决定性的会议》与《党纲关于改变客观现实的分析与目标》，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12月23日，第8—9版。

结果正如一位著名的古巴学者所说的，“充分吸收正统的苏式体制和作法〔使古巴共产党〕在形式和实质上都与苏联的党极其相似”。<sup>①</sup>大会通过了：（1）社会主义宪法草案；（2）五年经济计划；（3）行政区划的调整；（4）新的经济管理制度；（5）党纲（该党纲一直适用到1980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正式的党纲为止）。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意识形态斗争、教育和文化、宣传工具、宗教、妇女以及农民等项决议。此外，大会选出：（1）新的书记处，其成员扩大到九名，菲德尔任第一书记，劳尔任第二书记，排除了前总统多尔蒂科斯，第一次包括了三名“老”共产党员（其中有罗德里格斯和罗加）；（2）新的政治局，其成员扩大到十三名，包括三名“老”共产党员；（3）新的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扩大到一百一十二名，包括二十六名老共产党员。现在党的执行机构中有了老共产党员，在中央委员会里老共产党员大约占了四分之一；三个机构的组成成分也还表明，专家—官僚阶层的代表增加了。尽管这个执政党的领导成员已大为扩充，但仍被菲德尔及其亲密伙伴牢固地控制着。<sup>②</sup>

古巴共产党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宪法没有进行任何重大修改就通过了，并于1976年2月15日由全民投票批准，九天之后颁布了这部宪法。古巴宪法是以苏联宪法为蓝本制定的：

---

<sup>①</sup> 爱德华·冈萨雷斯：《党的代表大会与人民政权：正统化、民主化和领袖的主导地位》，载于《古巴研究》，第6期（1976年），第1—14页。

<sup>②</sup> 同上；《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75年12月17—22日，哈瓦那），文件汇编》（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6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使革命体制化》，载于《古巴研究中心通讯》，1976年，第3期。古巴共产党三个机构成员的名单刊登在1976年1月4日《格拉玛每周概要》第12版上。

1976年的古巴宪法的条款中，有32%来自苏联1936年的宪法，36%来自1940年的古巴宪法，18%是受这两个宪法影响，但突出的还是苏联的影响，仅有13%的条款总算还有些创新。<sup>①</sup>在古巴宪法的序言中提到了苏联的名字——一个国家的宪法中出现外国的名字，这在近代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新宪法中提出的基本政治机构也与苏联的机构极其相似，例如，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相当于最高苏维埃，国务委员会相当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部长会议、司法部门和人民政权机关都相当于苏联的同类机构。然而，在两种政治——行政制度间有个很大的不同：古巴的类型是权力明显地更为集中。本着体制化的精神，宪法清楚地区分了党、国家、政府、军队和群众组织的作用。但如同一位古巴学者所指出的，把几个机构（国家、政府、军队）的指挥权统一到一个人手里，实际上是将卡斯特罗的中枢作用通过宪法形式确定下来。<sup>②</sup>或者象另一位学者所断定的，宪法是那些要求充分使古巴革命进程体制化的人和那些仍想保持领袖的超凡魅力这一特征的人之间的一种折衷产物。<sup>③</sup>

现在让我们叙述一下古巴新的政治—行政结构中的主要机构：人民政权机关、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图2）。1970年菲德尔答应建立由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县—区机构，在地

---

① 莱昂内尔—安东尼奥·德拉奎斯塔：《古巴宪法的独特性及其在体制化过程中的作用》，载于《古巴研究》，第6期（1976年），第15—30页。宪法全文刊登在1976年3月7日《格拉玛每周概要》的特别增刊上。

② 冈萨雷斯：《党的代表大会》，第6页。

③ 德拉奎斯塔：《古巴宪法》，第29页。





方一级密切地监督国家行政部门和党。然而在1974年初，劳尔却宣布了一个不同的方案：从1974年年中到1975年年中，将在马坦萨斯省试验一项关于建立人民政权机关的试点方案。<sup>①</sup>1974年5月，通过了对1959年根本法（过渡性的革命宪法，其有效期到1976年）的两个修正案。一个修正案规定：凡年满十六岁的古巴公民（包括军队）有参加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年满十八岁的公民有被选举权，可以担任公职。另一个修正案提出成立一个委员会——由布拉斯·罗加领导——以调整和指导人民政权机关的选举。<sup>②</sup>在马坦萨斯省进行了选举，人民政权机关行使职权直到1975年底。古共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和一项决议进一步调整了全国的人民政权机关及其作用。人民政权机关分为县、省、中央三级。县、省级人民政权机关受托管理（通过“行政部门”）服务机构，如学校、日托托儿站、医院、商店、旅馆、饭店、电影院、夜总会、运输、零售商、住房、公共事业、体育以及一些地方工业（未具体说明）。县、省人民政权机关也为同级人民法院选派法官。中央一级的人民政权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把立宪权和立法权结合起来；从代表大会成员中选举国务委员会；任命人民最高法院法官和司法部长；批准对内对外政策总方案、经济计划、国家预算、金融信贷管理制度；修改和取

<sup>①</sup> 劳尔·卡斯特罗：《在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第2—3版。

<sup>②</sup> 1974年5月9日颁布的第1269号法，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4年5月19日，第1版。另参阅N·基辛、E·斯米尔诺夫和A·别兹维涅日尼格，《苏联：人民的政权机关；苏维埃的机构与作用》，载于《流浪者》，1974年1月11日，第30—35页，以及布拉斯·罗加：《马坦萨斯省：人民政权机关》，同上，1974年5月3日。

消任何国家机构制定的法令、政令和决定；对国家机构和政府行使最高监督权。1976年7月这个岛国的行政区划作了修改，原来的六个省分为十四个省，现有的四百零七个县合并为一百六十九个县。<sup>①</sup>同年10月进行了选举，选出一万零七百二十五名代表参加县人民政权机关，任期二年半；经过这些代表的选举，产生了一千零八十四名省人民政权机关的代表，任期二年半，并产生了四百八十一名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任期五年。1976年12月2日组成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罗加当选为主席。（县、省人民政权机关还同党和群众组织协商，从其成员中选出了人民政权机关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上面已提到，该委员会管理“行政部门”。）<sup>②</sup>

国务委员会由三十一人组成。（在每年举行的两次大会闭幕期间）代表全国代表大会贯彻执行代表大会决议，颁布法令，并监督部长会议、司法部、人民政权机关和外交使团。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时主持部长会议，也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并有权改组部队），可以负责领导任何中央机构，并监督司法系统和人民政权机关。菲德尔当选了这个职位，从而成为国家元首（原来由多尔蒂科斯担任）和政府首脑；劳尔当选为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是古巴“最高执行和行政机关”。它的成员经国家和政府首脑提名，由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任命。1976年

---

① 此处有误。应为一百六十八个县和一个青年岛特区。——译注

② 在宪法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政权机关的决议》中规定了人民政权机关的职能，该决议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年1月11日，第8—9版；全国人民政权机关选举法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年7月25日，第1版；选举结果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年10月24日，第11版；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年11月14日，第7版。

底，制定了关于调整部长会议和中央行政机构职能的法律。<sup>①</sup>部长会议主管社会经济发展、行政、货币与财政政策、外贸、国防和国际安全、对外政策、国际条约等事宜。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由部长会议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其他副主席组成，决定紧急事情。在部长会议管辖下有四十三个国家中央行政机构，可分三类：（1）管理一切国家机构的各国家委员会（如中央计划委员会，国家银行，价格、劳动、建筑和财政等各个委员会）；（2）主管一个或几个行政部门的各部（如农业、国内贸易、外贸、教育和国防）；（3）管理一个行政部门的组织，但其领导不是部长会议成员（如科学院、广播和电视、旅游）。<sup>②</sup>

在七十年代，武装部队也经历了重大改组。<sup>③</sup>部队虽然进行了减员，但为了集中从事纯军事活动，已经日益专业化，等级变得越来越森严。从前的劳动部队，如“支援生产部队”和“常备步兵师”的剩余人员已同“百年青年纵队”和“卡米洛与切·格瓦拉拥护者”等民间（虽然是以军事方式组织的）劳动队合并而成为“青年劳动军”。这个组织已成为武装部队部的准军事性机构，但完全同正规军分开。这次改组的原因之一是出于集中的需要，避免“那些分散和牵制力量的小分队激

---

① 《中央国家机构组织法》，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年12月19日，第12版。

② 同上。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成员名单公布在1976年12月12日《格拉玛每周概要》第5版上。

③ 关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古巴武装部队的详细研究，参阅豪尔赫·I·多明格斯：《古巴的民兵》，载于凯瑟琳·凯莱赫主编的《政治—军事制度：一个对比的分析》（贝弗利希尔斯，贤明出版社，1974年）及《古巴的体制化与军民关系》，载于《古巴研究》，第6期（1976年），第39—65页。

增,逐步发展为一个与正规军的行政领导平行的机构”。另一个原因是使征召过程体制化,日益加强军队的专业化。正规军将不参加生产,而“青年劳动军”则将征召那些既不适合参军也不适宜于学习的青年,给予三年的纪律训练,并从事农业劳动。<sup>①</sup>

在集中军事活动方面的另一步骤是吸收并逐步淘汰民兵。这个由武装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早年在巩固革命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63年建立义务兵役制的时候,民兵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第二年,民兵的武器就被军队接收了。十年后,1973年4月,所有民兵都转入“预备役”,授予革命武装力量名誉少尉军衔,发给身份证,并命令将其灰制服换成传统的橄榄绿的军队工作服。民兵只是在正式活动或成为现役预备队时可着军装。一旦现役预备队期满,民兵就不再需要服役了。<sup>②</sup>

七十年代,军队向现代化和专业化发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苏联供给古巴最现代的武器,并训练古巴军事人员使用这些武器(见第一章)。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国防部长或军事头目都访问过古巴并参加军事演习。劳尔·卡斯特罗也周游东欧进行回访。

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在1973年和1976年古巴武装部队的军官的军衔制根据其不断发展的复杂情况,改为更加符

---

<sup>①</sup> 《古巴:纪律与鼓励》,载于《拉丁美洲》,1973年9月21日,第302—303页。

<sup>②</sup> 《民兵日》,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4月22日,第1—2、6—7版。

合传统的等级制。在武装起义期间，为了避免和抛弃巴蒂斯塔军队的逐步升级的军衔制，卡斯特罗决定起义军的最高军衔为少校。在制度上他和他的弟弟以及格瓦拉的军衔一样，都是很不起眼的少校，然而十分明显，有些少校就要比其他少校有更多的权力。事实上，这种局面随着1973年实行的第一次等级制度改革就正式形成了。在军队中分三类军官，即高级军官、中级军官和下级军官，每一类又有三或四级。高级军官包括从“军长”（大将仅授予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到“旅长”（少将）四级。劳尔·卡斯特罗“师长”（中将），比他哥哥低两级。中级军官包括从上校到少校（从前是最高军衔）三级。下级军官包括从大尉到少尉四级。海军也分三类（包括十级），从海军上将到海军少将，从海军准将到海军中校，从海军少校到海军少尉。<sup>①</sup>（原文如此。——译注）<sup>②</sup>卡斯特罗解释实行新等级制的原因说，过去军队是以服装和军衔朴素而著称，但革命和军队都变得更加成熟了。官方公布的其他原因是，军队日益变得复杂，同时需要规定与其他国家相等的军衔（如苏联、秘鲁），他们有另外一种等级制度。<sup>③</sup>实行新的等级

---

<sup>①</sup> 1973年12月1日颁布的第1257号法。参阅《部长会议关于革命武装部队新的军衔制度法》，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12月16日，第2版。

<sup>②</sup> 古巴革命武装部队在1973年和1976年两次实行军衔改革。1973年规定的军衔：总司令（相当于元帅），陆、空军分高级、中级和下级军官三类，高级军官从大将到少将三级，中级军官从上校到少校三级，下级军官从大尉到少尉四级；海军也分高级、中级和下级军官，高级军官从上将到少将三级，中级军官从上校到少校三级，下级军官从大尉到少尉四级。1976年第二次军衔改革又增加了陆、海、空军一、二级准尉。——译注

<sup>③</sup> 参阅菲·卡斯特罗关于这个法令的解释，同注释<sup>①</sup>，第3版。

制度,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增加高级军官的薪金,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新的军事领导人物的一种经济刺激。

1973年的等级制可能是作为从起义军的混乱军衔向革命武装部队的最后军衔过渡而采取的一个步骤。过渡的等级制在术语上还保留着陆军高级军官和海军中、下级军官的“司令官”的头衔。但事实上已建立了(报纸、广播也已公布)与世界普遍采用的军衔制相等的古巴军衔制,例如,劳尔·卡斯特罗称“师长”,也称“中将”。为了消除这种混乱和建立古巴国内的军衔制(也可能是为了奖励军队在安哥拉取得的胜利),1976年底实行了第二个等级制。新的等级制同以前的结构一样,只是“司令官”被“将军”二字所代替。菲德尔和劳尔现在都是四个星的“陆军将官”,虽然他们两人的军衔拉平了,但卡斯特罗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仍居于最高职位。<sup>①</sup>新军衔制法特别提到在反西班牙战争期间,古巴的曼比军<sup>②</sup>(独立战士)采用过同样的军衔,并以此作为法律根据。<sup>③</sup>菲德尔更坦率地说明了采取等级分明的、普遍采用的军衔的必要性,批评了中国人企图在文化革命期间取消军衔,并承认以前的军衔制没有发挥作用,决定从此以后对将军就要称呼将军。<sup>④</sup>

1976年底,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经过十年的革命之

---

① 此处有误。卡斯特的军衔相当于元帅,与劳尔·卡斯特的军衔不同。——译注

② 曼比军是古巴历史上当地人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起义军。——译注

③ 《古巴共和国革命武装部队军衔制度法》,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年12月5日,第12版。

④ 菲·卡斯特罗:《在建立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会议上的讲话》,同上,1976年12月12日,第3版。

后,体制化的进程已基本结束,作为一个标志,要把1977年称为体制化年。<sup>①</sup>但这里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七十年代后期的政治体制(图2)与六十年代的体制(图1)是否有实质上的不同;另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体制是否是真正民主的,代表群众的,并允许群众真正参与制定决策。遗憾的是目前尚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新体制仅仅实施几个月,关于它的作用还没有具体的报道。然而,我们可以根据情况,根据现行的法律、领导人的讲话、古巴报刊披露的不很充分的材料,作一些推测。

首先,政治制度的体制化进程,毫无疑问,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各国家机构应有的职能现在已经有了规定,那些高级的职位已确定了具体的职责和界限,军队和老百姓现在看来已分得比较清楚。自从革命以来,第一次进行了选举,而且开辟了使人民能够参加一些行政管理的渠道。

第二,古巴制定决策的中心(虽然稍有扩大)仍旧高度集中在原来的小集团内。菲德尔现在是国务委员会主席(因而他承担了多尔蒂科斯过去行使的一些职权)、部长会议主席、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见106页注释<sup>①</sup>。——译注)、全国经济管理制度执行委员会主席,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担任任何中央国家行政机构的领导。劳尔是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古巴共产党第二书记、武装部队部部长、大将。唯一没有被兄弟俩控制的国家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但它一年只举行两次会议,而且很难看

---

<sup>①</sup> 同第106页注释<sup>④</sup>,第2—3版。

出代表大会可能对抗或削弱卡斯特罗家族的权力。菲德尔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式和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把中国作为他攻击的目标，激烈地抨击中国政治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任用私人、搞革命小集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sup>①</sup>

第三，全国代表大会的构成情况（表5）生动地说明它具有杰出人物统治的特点，典型的代表是：男性，或是行政长官、技术专家或是军人，四十岁以上，受过教育，党员。虽然劳动力的三分之二是工人和农民，但他们的代表却仅占代表总数的31%；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只有22%的代表；既不是古巴共产党党员也不是青年联盟盟员的占人口80%以上，而他们只有3%的代表；三十岁以下的占人口的60%以上，仅有10%的代表；没有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占人口绝大多数，他们只有12%的代表。

第四，省、县人民政权机关的权力和职能受到很大限制：（1）谁适合担任人民政权机关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实际上由党来决定，这个委员会是人民政权制定决策和进行管理的机构；（2）人民政权机关管理一些最不重要的经济部门（基本上是服务行业），主要工业、全部农业、采矿和财政都由中央国家机构管理；（3）调拨给人民政权机关管理的服务行业的物资多少和如何分配也是由中央决定；（4）国务委员会监督人民政权机关，部长会议（通过国家中央机构）对人民政权机关的行政部门实行领导和监督；（5）国家和政府的其他机关

---

<sup>①</sup> 同第106页注释④；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同上，1976年1月11日，第3版。



表 5 1976 年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构成

职 业	人 数	百 分 比
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的领导人①	199	41.4
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技术人员	38	7.9
军人(没有其他职业的)	35	7.3
生产和服务业的工人和教育工作者	144	29.9
农民	7	1.5
其他(上面未列举的)	58	12.0
共 计	481	100.0
<b>性 别</b>		
男	374	77.8
女	107	22.2
共 计	481	100.0
<b>政治面目</b>		
共产党员或候补党员	441	91.7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盟员	24	5.0
无党派人士	16	3.3
共 计	481	100.0
<b>教育程度</b>		
高等教育	137	28.5
中等教育	287	59.7
初等教育	57	11.8
共 计	481	100.0
<b>年 龄</b>		
18—30 岁	51	10.6
31—40 岁	196	40.8
41—50 岁	158	32.8
51 岁以上	76	15.8
共 计	481	100.0

① 国家领导人占 12.3%；地方领导人占 29.1%。

资料来源：《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 年 12 月 12 日，第 4 版。

可以废除、修改和撤销人民政权机关的决议。

### 工人运动民主化

工人运动，正如一古巴官方刊物所说的，从1959年到1970年经历了一个衰退阶段，由于借口“政府和工人利益完全一致”，“工人运动几乎完全解体”。经济要求从前是工会极其重要的活动，这时候不再是为之斗争的问题了，“因为可以指望政府来满足这些要求”。为工会规定了新的任务，如“为革命争取工人，同反革命进行斗争，推动生产”等。但是，由于这些任务也是政府和党的任务，工会便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辅助工具”。“工会的民主是受限制的，是形式的……既不受到鼓励也不实行。”由于没有制度上规定的途径，比如定期举行会议，妨碍了工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六十年代的十年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工会究竟起哪些作用？很多人认为，取消工会对国家没有什么损失，因为政府、行政机关和党显而易见能够做工会所做的事情。”从1967年开始，由于发动先进工人运动而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先进工人运动是由企业中最有生产能力的、最革命的工人组成的。“在很多企业中，在理论和实践上，〔由选出的少数人组成的〕先进工人运动代替了〔拥有大多数工人的〕工会。”先进工人开始以工人的名义自己决定工会所管的少数几件事情。<sup>①</sup>

1970年5月，卡斯特罗承认工会运动被忽视了，应该加强并使之民主化。两个月之后，劳工部长里斯克特在古巴革

---

<sup>①</sup> 利昂内尔·马丁：《古巴重新建立工会》，载于《古巴国际》（1971年4月），第28—30页。

命后一次最精彩的自我批评讲话中说：

从理论上说，行政官员代表工农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理论是一回事而实际又是一回事……。工人应该享有的革命所规定的权利〔没有受到尊重，或者对政府有所指责〕，但没有人为他辩护。他不知道向何处求助。他向党求助，但党不了解〔工人的权利〕或忙于动员人们从事生产……。党竟如此专心于经营管理，以致在很多情况下不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群众的问题已变得有点麻木不仁……。如果党和政府合二而一，那么工人就没有地方反映他的问题……。工会或者不复存在，或者变成了先进工人的办事处……①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里斯克特建议采取两项具体措施：（1）全国所有工会的地方分会理事会必须经过选举产生。他说，选举代表丝毫不用害怕以致于规定各种条件，选举应该是自由的、公开的。（2）工会应该有机会发挥其正常的作用。他们首要的责任是注意实施劳工法和保护工人权利（这一点将在下节讨论）。② 9月，卡斯特罗批准了第一个措施，宣布：“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工人，准备在所有地区举行工会选举……。选举将是绝对自由的，工人将挑选候选人，选举自己的领导人。”③

宣布之后，古巴工人联合会全国理事会和全国委员会都召开了会议，决定了选举日期（1970年11月9日至12月9

---

① 豪·里斯克特：《关于劳动力问题的讲话》，第5—6版。

② 同上。

③ 菲·卡斯特罗：《在集会上的讲话》，第4—5版。

日)，通过了选举程序，明确了地方工会的组成和职能。选举之前，在企业里将召开全体工人参加的大会。在大会上，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公开地、自由地被提名为候选人，不管他是否是工会的官员。接着，大会将讨论候选人担任这项工作有何“优点”，这个讨论仅仅是为了提供情况，所有候选人最后都将列入候选人名单。每个职位至少应有两三个候选人，以便投票者更好地进行选择。职位数要取决于企业的大小：有十至五十名工人的企业，三至五个职位；五十一至一百名工人的企业，七至九个职位；一百名工人以上的企业，十一个职位。由工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将组织和指导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工会总书记将由工人直接选举产生，其他职位在那些被选上的人中分配。<sup>①</sup>

选举按照宣布的那样举行了，并广泛地进行了宣传。12月初，报纸报道了部分选举结果，之后再没有其他报道，直到1971年五一劳动节，卡斯特罗发布了关于选举的一个数字（所建立的工会数）。一年之后，卡斯特罗公布了最后的结果（见表6）。此表说明候选人与职位的比率原计划是二或三比一，部分结果的比率大约是二比一，而最后结果的比率则是一点五比一。看来小企业（它们可能上报得晚）选票上只有一个候选人。大约只有预计工人的一半参加大会选举候选人，而很多参加大会的工人未投票。最后被选上的官员的数字比预计数字低35%。每个工会分会选上的官员平均数是四人，与选举程序提出的三到十一人的数字相比是相当低的。在全国

<sup>①</sup> 《古巴工人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决议》和《选举程序的方针》，载于《格拉玛报》，1970年10月30日，第2版。

表 6 1970 年古巴工会选举

	计划数字 1970年10月	部分结果 1970年12月	最后结果 1972年5月
已建立的分会	—	26,427	37,047
选候选人大会出席人数	2,000,000	887,525	1,244,688
投票人数		867,373	—
候选人人数	500,000—750,000	224,875	262,967
当选的官员数	250,000	117,625	161,367

资料来源：第一栏：《古巴工人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决议》，《格拉玛报》，1972年10月30日，第二版；第二栏：《格拉玛报》，1970年12月3日，第一版；第三栏：菲·卡斯特罗：《在五一节游行和工人集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5月7日，第2版。

范围内，当选的人中大约 27% 是老的工会官员，但在哈瓦那，40% 的在职官员设法保住了他们的职位。<sup>①</sup>

选举真正是自由和民主的吗？照官方的新闻机构所说，是自由和民主的。但有些迹象表明，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政府施加了压力并操纵了选举。当古巴工人联合会讨论选举程序时，一些工会成员强烈地批评和反对传统的程序。使那些老工会领导人很窘迫，其中一位直言不讳地抱怨说：“猎手的枪还没准备好，我们就把兔子放出去了。”劳工部长不得不出面干涉制止批评者，称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和“蛊惑人心的政客”，并警告说，这种“消极局面必须彻底改变”。<sup>②</sup>

卡斯特罗在宣布要进行选举的消息时就曾说过，“〔当选

① 起义军广播电台，1970年12月2日和3日的广播。

② 豪·里斯克特：《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省一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报》，1970年9月9日，第4—5版。

的官员)将有其当选的道义上的权威,一旦革命制定一条路线,他将全力以赴为捍卫这条路线而奋斗。”<sup>①</sup>因而他设想,只有那些无条件地遵循政府、管理部门和党的命令办事的工人才能够当选。重要的是选举使具有六十年代特点的一种作法合法化了。

选举程序禁止候选人采取任何手段为自己进行宣传,只能由选举委员会在布告栏和壁报上公布候选人的“优点”。<sup>②</sup>古巴工人联合会没有对优点规定确切的标准,但卡斯特罗却间接地强调了对革命的忠诚和战斗精神,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选举委员会是很重视这方面的优点的。正如表6所指出的,参加选举的工人低于所预料的数字(占劳动力和政府宣布数字的一半),也许因为他们知道不会真正有什么变化,也许因为他们只能投票选举一个候选人。

绝大多数新官员(几乎占当选官员的四分之三)达到了政府的要求(四分之一继续留任者显然也都达到了这些要求)。一些少数不符合忠诚标准的人不久就受到了攻击。劳工部长里斯克特就曾透露:

绝大多数工厂群众选举了他们最好的代表……。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应该说,在极少数情况下,当选的工人优点不足,或不具备使他们成为领导人的优点……。〔任何这样一种情况〕对工人运动和党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指出了我们的政治工作失败的地方或失败的情

---

① 菲·卡斯特罗:《在集会上的讲话》,第4—5版。

② 《格拉玛报》,1972年10月30日,第2版。

况……。每一盏警灯都是对我们的政治力量和革命思想的力量的一种挑战……。<sup>①</sup>

在地方工会进行选举的同时,开始了全国工会的改组,这一工作直到1973年末才完成。1970年10月,古巴工人联合会批准了全国工会的改组条例。改组前,将召开由政府、行政机关和工会代表参加的全国生产大会,讨论生产和生产率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工会是在革命进行接管以前建立的(尽管1961年和1966年有了某些变化),工会结构没有随着行政结构的根本改革而改革。因此决定,所有工人都组织到与中央各部和机构平行的垂直工会系统之中,不要有一部分工人按行业组织,换句话说,中央一个部或机构所雇用的全部工人不管什么行业都在一起成立工会。每个全国工会以中央部或机构为顶点形成一个宝塔形,下面是行政区分会,最基层的是合成一体的企业和工厂(农场或机构),这样便于管理生产和提高生产率。<sup>②</sup>

从1970年11月到1973年9月,总共建立了二十三个全国工会:基础工业、矿业和冶金、轻工业、食品、食糖、石油、烟草、渔业、农业和家畜饲养、林业、新闻和书籍出版、建筑、运输、交通、民航、海运和港口、教育和科学、旅馆和饭店、商业、公共卫生、公共管理、部队职工以及艺术和娱乐。第一批建立的全国工会是在工业、运输和军队方面,接着在其他生产部门,然后

---

<sup>①</sup> 豪·里斯克特:《在中央工会第六次全国委员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0月24日,第4版。

<sup>②</sup> 参阅菲·卡斯特罗在全国基础工业工会成立时所作的说明,《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第2版。

服务行业，最后是农业。<sup>①</sup> 第一批组织起来的工会是一些成员相对少、高度集中、纪律严明、有技术的部门，这些恰恰是最要害的部门（这些工会组织得很快，不到一年就组织起十一个工会）。服务业和农业，工人人数多，通常是分散的而且缺乏技术，组织得慢（建立余下的这十二个工会用了两年时间）。

### 工会的作用：捍卫工人的权利和参与决策

1970年秋，大家公认工会是政府完成生产计划的传送带。为纠正这种状况，已经答应，允许工会发挥其正常的作用（捍卫工人权利）并参加制定国家的决策和企业管理。一年之后，官方关于工会作用的想法并没有重大的改变。劳尔·卡斯特罗曾经强调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会是组织和领导工人群众为实现正当要求而斗争的工具……。然而，当工人阶级掌权之后，工会的作用就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革命政权〔政府〕没有对抗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的主要职能之一是象运载工具一样帮助革命政权把必须传送的方针、指示和目标传送给工人群众……。工会〔也〕是党和工人群众最强有力的联系纽带。这是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此外，工会的工作要帮助和支持行政部门的工作……。〔工会必须参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生产率、维护劳动纪律、更有效地利用工作日、搞好定额

---

<sup>①</sup> 材料来源于哈瓦那电台、《格拉玛报》和卡斯特罗的一些讲话，特别是《在国际劳动节游行时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5月13日，第5版。



和组织工作、保证人力物力的质量和储存以及最有效最合理地加以利用。<sup>①</sup>

工会还越来越多地担负着为会员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的职责，如组织休假（1972年宣布了一个二十五万人的休假计划）、教育（吸收青年工人上技校的运动正在进行）和娱乐活动（如1972年的狂欢节）。<sup>②</sup>

关于已经许诺的由工人代表参加“集体机构”管理国营企业一事，豪尔赫·里斯克特提出了严格的限制：

菲德尔和我建议必须同工人协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党必须起的先锋作用……。〔不应该〕期望什么魔术式的解决方法……。<sup>③</sup>〔在企业里〕要由管理部门作决定、负责任，管理部门的任务是根据生产过程的要求，每天采取必要的措施……。有一件事是完全清楚的，管理部门应该有——而且确实有——一切权力行使自己的职责。它承担着责任，因此有权作决定。<sup>④</sup>

1971年年中，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72年底举行，会上将讨论工会捍卫工人权利和工人参加制定国家和企业的决策等问题。<sup>⑤</sup>（第十三次

---

① 劳·卡斯特罗：《在全国革命武装部队文职人员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9月26日，第5版。

② 马丁：《在古巴重新建立工会》，第30页；《古巴：工会》，载于《拉丁美洲》（1972年7月28日），第234、236页。

③ 里斯克特：《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4—5版。

④ 里斯克特：《在第六次全国委员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第4版。

⑤ 菲·卡斯特罗：《在庆祝五一节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5月16日，第2版；《在庆祝攻打蒙卡达兵营十八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8月1日，第1版。

代表大会是从1966年算起，六年内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66年举行的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中国—格瓦拉路线。1962年召开的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当时盛行的苏联路线。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革命后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是在1959年举行的。）而1971年的气氛对这样的讨论是不利的。地方分会选举前的简短讨论已经预示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受约束的会员可能要求些什么。这些选举的“可靠”结果为避免出现麻烦的事情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证，但政府可能要完成全国工会的改组，而且需要足够的时间准备讨论的问题。因此，代表大会推迟了一年，推迟到1973年11月。在此期间，完成了遗留的全国工会改组事宜，古巴工人联合会公布了九个“议题”供代表大会前讨论。<sup>①</sup>虽然在国营部门的工人约88%参加了讨论，并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些议题还是为讨论的范围设置了框框，提出了限制。下面从官方文件中引来的这段话对讨论的气氛作了生动的描述：

在讨论〔以上议题〕的时候，每个想要批评政府具体工作的工人都有机会提出批评……。对他不施加政治、精神或任何其他压力……。〔然而〕会上提出的批评不能看作是反政府倾向的反映，因为如果出现这种倾向，古巴工人联合会将首先起来反对……。〔所发表的批评意见都是〕和工会运动能够起而且应该起的作用相一致的。<sup>②</sup>

---

<sup>①</sup> 《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议题》，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9月2日，第11—12版。下面引述或提及这些议题均根据此来源。

<sup>②</sup> 拉萨罗·培尼亚：《古巴中央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心报告》，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11月18日，第4版。

所有议题都以超过99%的票数通过，反对一个议题的最高反对票数是0.2%。据官方报道：（1）表决是以公开举手方式进行的；（2）反对票的数目是精确的，因为只有少数几票，因此，计算票数和认出投反对票的工人显然是容易的；（3）没有人要求讨论议题范围以外的问题。<sup>①</sup>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个决议案，与提出的议题并不完全一致。有些议题没有包括在决议案之中，有些议题在决议案中作了修改，在议题没有涉及到的地方也通过了一些决议案。代表大会选举了人民社会党元老拉萨罗·培尼亚为古巴工人联合会总书记。（培尼亚早在1939年就是古巴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1939—47年任第一任总书记，大部分是在人民社会党同巴蒂斯塔组成人民阵线期间。此后的十五年他几乎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由于苏联非常信任他，在1962年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当选为古巴工人联合会总书记，此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66年古巴和苏联关系恶化。1970年，六十多岁的培尼亚又回到社会活动中来，致力于工会的改组，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99%的票数当选为总书记，任期从1973年至1977年。他任职四个月后，于1974年3月逝世。）本节其余部分里，将说明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议题和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是如何处理工会捍卫工人权利以及工人参与制定国家决策和企业管理等问题的；也将讨论这些议题贯彻执行的情况。

---

<sup>①</sup> 《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工人参加讨论第十三次工人代表大会的九个议题》，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11月4日，第4—5版。

提出的议题没有包括关于工会捍卫工人权利的任何革新办法。根据这些议题,国家行政部门、党和工会之间没有冲突只有协作,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即“永远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古巴工人运动的新章程和原则宣言以代替1966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和宣言。新的原则规定工会是自治机构,它既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不是党组织的一部分,但政治上受党的领导和指导,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章程中所列举的工会任务,与1966—70年间实行的,与1971年劳尔·卡斯特罗概括的,没有什么不同。总的任务是:支持革命政府;参加国家安全和保卫活动;配合改进经营管理工作;加强劳动纪律,同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提高会员的政治觉悟。更具体的任务是提倡做到:按时上班;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作日;增加产量,提高生产率,提高质量;节约原料和动力;适当维修设备;发明创造,增加生产;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文件也一般地提到,工会应该保护工人的权利,检查劳工法的实施和安全措施,帮助有困难的会员。<sup>①</sup>

提出的议题只承认工会参加国家决策的一种形式,即对有关重大劳工问题的法律草案进行公开讨论,提出意见。这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是一种通常的做法,特别是当不得不实行易于引起波动的法律(如反游手好闲法)的时候。事实上,最后通过的法律与草案完全一样,使人感到,工人运动实际上是无权进行修改的。提出的议题建议采取各种改革措施以纠正这一局面:(1)草案应该尽早提前分发下去,并应附

---

<sup>①</sup> 《古巴工人联合会章程及关于原则或基础的说明》,1973年11月11—15日,哈瓦那,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第1—10页。

有简要的说明材料；(2)所有对草案提出的意见，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或是修改的意见都应听取；(3)在公开讨论中提出的合理建议应该吸收到法律里，如果这样的建议被拒绝，官方要予以解释。总书记培尼亚在向代表大会作的中心报告中，要求工会更直接地参加社会治安管理，参加制定价格政策和某些商品的分配。<sup>①</sup>（到1977年底，并没有采取措施实行这些议题或培尼亚的建议。）卡斯特罗在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建议，邀请古巴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出席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参与制定计划和重大的行政决策。<sup>②</sup>（三年后，卡斯特的建议照办了，授予了古巴工人联合会总书记出席部长会议和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权利。）<sup>③</sup>

提出的议题规定，工会应该通过两种机构参加企业管理，即“生产大会”和“管理委员会”。生产大会不是新建的机构，其目的也未改变，生产大会在六十年代就很普遍。1971年劳工部长关于生产大会的职责是这样说的：“〔工会必须〕尽一切努力使所有工人参加大会，〔使他们〕赞同生产计划和有关的活动，并将其看作是自己的事情，使大会成为一种工具，以便我们通过它日久天长能够做到〔充分〕动员，引起高度的关心和热情，以实现生产目标。”<sup>④</sup> 议题列举的新的生产大会的任务是：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严格劳动纪律，提高生产率，更合理地利用物力，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代表大会之

---

① 培尼亚：《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第5版。

② 卡斯特罗：《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第5版。

③ 《中央国家机构组织法》，第9版。

④ 豪·里斯克特：《在第六次全国委员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第4版。

前，生产大会可以向管理人员提出关于生产问题的建议和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但是接下去的步骤没有作详细说明。议题规定管理人员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执行还是拒绝大会的建议，但在下次大会上他必须说明拒绝的理由或采纳建议的结果。对没有履行生产大会规定的职责的管理人员没有规定制裁。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生产大会的简短决议没有详细说明议题中提到的各项细节，只提出了生产大会的总目标，并要求政府宣布一项规定其职责的法令。<sup>①</sup>关于“管理委员会”，提出的议题建议工会代表应该参加，但未决定代表名额、选举程序和具体职责。根据议题，委员会的职能是通过管理人员按照“国家的指示”所制定的生产计划，或提出修改建议。管理人员如果决定改变生产计划，应该“通知”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什么决议。

1975年2月，古巴工人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贯彻已经通过了十四个月的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接替培尼亚担任古巴工人联合会总书记职务的罗伯托·贝加向委员会所作的中心报告，在《格拉玛报》上整整登了四版。报告讨论了从糖季生产到狂欢节等大量活动中，工人运动的作用，但有关工人参加制定决策这一重要问题，报告只是说正在研究一项法令，以便使这种参与制度化。<sup>②</sup>1975年底，古巴共产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在国营企业中管理人员“是最高权

---

<sup>①</sup> 《关于生产和服务调节委员会决议草案》，1973年11月11—15日，哈瓦那，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

<sup>②</sup> 罗伯托·贝加：《古巴工人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的中心报告》，载于《格拉玛报》，1975年2月6日，第3—6版。

威”，对自己的职责和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负有“最大的责任”。决议进而说，管理部门将听取一个有工会代表参加的机构的意见，但工人参加管理将只限于讨论计划、分析计划完成的情况、研究奖金的使用和组织社会主义竞赛。<sup>①</sup>最后，1976年11月颁布的关于国家行政机构改组的法令，要求在所有中央国家机构和企业成立两种“新”型的委员会，但没有一种委员会将真正有工人参加。“领导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企业最重要的行政事务并作出决定，这种委员会的成员仅限于企业的“行政领导人”，而工人领导人则没有资格成为委员会的成员。（不过，在讨论有关工人的议案时，相应的全国工会总书记有权参加委员会会议。）“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任务是商讨与企业有关的科学技术问题，这种委员会是由“杰出的专家、很有资格的技术人员和行政领导”组成，没有工人参加。<sup>②</sup>

最后应该评论一下从1970年以来与工会改组同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从这些措施似乎可以看出政府加紧控制工人的倾向。1970年9月，劳工部长里斯克特谈到，为保证适当

---

① 《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的决议》，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6年1月11日，第10—11版。

② 《中央国家机构组织法》，第9版。人们会回忆起，1960—62年在国营企业中，临时建立了“技术顾问委员会”，但是这些委员会是由工人推选的代表组成的。参阅古巴经济专题研究：《共产主义古巴的劳动条件》（科勒尔·盖布尔斯，迈阿密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8页。除了本书谈及的委员会之外，十多年来在古巴还有“劳动委员会”发挥作用。然而，这些委员会并没有履行管理职能，只是起了调解的作用。它们试图在企业一级解决工人的冲突，它们的决定可以提交法院。全国代表大会现在正在研究一个修改“劳动委员会”法。参阅《劳动、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委员会关于劳动委员会组织与职能法案的报告》，载于《格拉玛报》，1977年7月15日，第2版。

地控制劳动力，已经采取了两个步骤：取消非农业私营成份（扩大国家对就业的控制，防止虚假就业的现象）和进行全国人口和住房普查（估量劳动力的规模以及职业和居住地点的分布状况）。<sup>①</sup>在这一部分将讨论的措施是：发动一场运动推动管理人员更严格地要求工人，改进工人身份证和劳动记录的制度，重新建立劳动定额以计算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实行反游手好闲法，以减少工人旷工的现象，并把游手好闲者变成劳动力，以及实行集体劳动契约。

1971年举行的生产大会，普遍讨论了促使管理人员更严格地要求雇员的运动。同年10月，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要求管理部门“要加强本部门，〔以〕形成严格要求的作风，而不是松松垮垮”。在这次会上，卡斯特罗把管理人员缺乏“严格要求的品质”斥责为“革命最坏的弊病之一”。接着，劳工部长谴责“蛊惑人心的管理人员”、政客以及那些四处奔走向工人施以小恩小惠的人物。他还说：“我们必须重申管理人员的作用，他们应该要求工人每日出勤，最有效地利用工作日，遵守规定的数量和质量指标，机器设备要保持良好的运转，不要浪费材料，并且应该采取对巩固劳动纪律有利的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sup>②</sup>1971年底党报《格拉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劝工人们对自己的同事要严格要求，警告说“谁因为怕惹麻烦而对有人不好好干活装看不见，谁就是他们的同谋，这

---

<sup>①</sup> 豪·里斯克特：《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4—5版，以及《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68年8月17日，第2版。另参阅《工人自由讨论》，载于《格拉玛报》，1970年9月8日，第5版。

<sup>②</sup> 引文与情况来自豪·里斯克特：《在第六次全国委员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第4版。



些人的态度是与工人阶级不相称的”。《格拉玛报》鼓励工人们“同这种态度作斗争，把它从我们的工业体系和工厂中消除掉。”<sup>①</sup>

国家雇用的工人（可能占劳动力的90%），每人必须有身份证才能找到职业，还必须有记录他的优缺点的完整的档案。优点之中包括：在糖季自愿（无偿）劳动，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加班不领加班费，推迟退休继续工作，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列入档案的缺点（指的是“对生产有消极影响、破坏劳动纪律以及反映觉悟不高的种种行为”）有：旷工，使用机器、原料和燃料粗心大意，未完成生产定额，未经允许就离开了在企业里担任的工作，在契约期满以前就离开工地，等等。“档案”还登记民事法庭、军事法庭、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对工人的制裁情况。<sup>②</sup>

正如在第二章中所说的，劳动定额是1963—65年第一次在古巴采用和实行的，1966—70年（当中国一格瓦拉主义盛行时）被忽视了，自1970年年中以来又作了规定，并且得到了加强。每个工人都有定额，规定他在一定的时间内应该生产多少产品。管理人员控制完成定额的情况（奖励超额的，惩罚未完成定额的），这是企业生产率的基础。上面已经谈到，工人的档案也登记工人在这方面的表现。

1971年春，政府颁布了反游手好闲法，规定十七岁到六

---

<sup>①</sup> 《一场正在进行的战斗》，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2月5日，第1版。

<sup>②</sup> 1969年8月29日公布的第1225号法；《劳动评定草案》，载于《格拉玛报》，1970年7月8日，第1版；《关于劳动奖惩草案》，同上，1970年9月12日，第3版；1970年10月15日第425号决议，同上，1970年10月16日，第1版。

十岁有体力和智力的男人必须参加劳动。此法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把游手好闲的人吸收到生产中来，在法律生效前，实际上已吸收了十万多人。另一个目的是减少日益严重的旷工现象。到1970年底，旷工的劳动力竟达到大约20%。旷工超过十五天是处在“犯游手好闲罪前期”，如果再旷工就是犯“游手好闲罪”了，刑罚从软禁到监禁在教养中心强迫劳动一到两年。<sup>①</sup>古巴工人联合会完全支持反游手好闲法。自宣布这项法律以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性会议检查法院的工作。在1971年末召开的古巴工人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上，里斯克特部长报告了违犯反游手好闲法的情况，批评了不报告旷工工人的管理人员，并告诫要严格执行这一法律。<sup>②</sup>1972年初，召开的全国劳动法全体会议提出了大约五十条建议（但未公布），以改进管理部门执行这一法律的情况，促进工人在加强劳动纪律方面的合作，使法院更好地运用这一法律，使被吸收为劳动力的游手好闲者变好。<sup>③</sup>

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企业管理部门和工人、工会之间实行“集体劳动契约”的办法。在数量方

---

① 1971年1月初，各报均刊登了这项法律草案（《反游手好闲法草案》，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月17日，第7版）。这项草案将在成千上万工人参加的会上进行讨论，工人将以“大量的、敏锐观察到的材料丰富这一草案”（《工人阶级的立法讨论会》，同上，1971年1月30日，第3版）。但是，3月份最后颁布的这项法律（1971年3月16日公布的第1231号法，同上，1971年3月28日，第2版），几乎没有作一点改动。

② 《古巴工人联合会声明……》，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3月28日，第2版；豪·里斯克特：《在第六次全国委员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第4—5版。

③ 赫苏斯·蒙塔内：《在全国劳动法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1月23日，第10—11版。

面,工人承诺完成和超额完成日、月、年的生产定额,节约原料和动力,以及提供无偿劳动。工人还要保证避免旷工、怠工和任何其他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工会应采取“说服的方法,使所有工人在各个方面作出保证”。行政管理部门和工会认真地监督契约的执行情况。每月和每年的生产大会当众讨论工人完成契约的情况,并将结果公布在工厂里大家都可以看到的<sup>①</sup>地方。

1975年初,有人会见了古巴地方工会的一些领导人和十五个最重要的、有名望的、效率高的(农业、工业、采矿和服务业)企业的一般工人,了解工人对国有化进程的反映。据调查人说,“那些被会见的工人的自觉性、革命性、政治认识和战斗性比普通工人高”。当问到地方工会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时,他们回答说:管生产(60%),管教育(44%),既管生产又维护工人利益(14%),维护工人利益(4%)。关于劳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他们说:管纪律(40%),管教育(33%),既管纪律又维护工人的利益(14%),维护工人利益(5%)。被会见的人中约86%的人感到企业的事情必须与工人协商,但只有52%的人认为管理人员必须答复工人的质询、建议和在生产大会上提出的问题,58%的人认为工人参加这样的大会是有重要影响的。<sup>②</sup>

概括说来,七十年代工会的主要作用较之六十年代似乎

---

<sup>①</sup>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议题》,第9版;《关于社会主义竞赛的决议草案》,1973年11月11—15日,哈瓦那,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第3—4版。

<sup>②</sup> 马里费利·佩雷斯—斯特布尔:《体制化与工人的反应》,载于《古巴研究》,第6期(1976年),第31—54页。

没有多大的变化：配合国家、党和企业的管理人员提高生产，加强劳动纪律。另一个职责是教育工人，而维护工人利益可能是最次要的任务。工人“新”获得的参与的权力不多，基本上只与生产有关；重要决策，有的涉及整个国民经济（例如投资与消费的分配），有的涉及本企业（例如录用和解雇管理人员），有的涉及工人自己的福利（例如确定工人的薪金），工人都不参与。工人参加“管理委员会”的许诺并未实现；1976年成立的委员会是由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没有工人参加。目前的趋势在企业里似乎要加强管理人员的权力和加紧对工人的控制。

### 小农群众组织的改组

巴蒂斯塔被驱逐后不久，革命的领导面临着一个至为重要的抉择：是把逐渐国有化的大庄园分配给耕种其土地的广大的无地的农业雇佣劳动者，还是不予分掉。<sup>①</sup>普遍的主张（这种主张在1959年土改中已实现）是，放弃已经分为小块的并被分成农、佃农和占地农所占有的土地的所有权，但反对把大庄园分掉、把农业雇佣劳动者变为私有的个体农民。政府对此从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理由（即为了阻止所有制倒退，保持对农业和农业劳动者的控制，避免由于把土地分成小块引起生产率下降）。大庄园（主要是甘蔗种植园和牧场）暂时被组成为类似合作社的组织，到1962年年中改为国营农场。一年以后，第二次土改消灭了中等的个体农民（古巴

---

<sup>①</sup> 关于革命后小农和农业工人的地位问题的详细论述，参阅梅萨一拉戈主编的《古巴的革命变革》，第11、12章。

的“富农”)。虽然古巴私有农民的反抗不能与苏联的富农相比,但在六十年代初,拉到山上去的埃斯坎布拉伊山的农民与经过游击战训练的政府军也发生过流血冲突。

1966年末,大约有二十三万四千小农控制了35%左右的耕地。然而他们都被吸收加入了全国小农协会,而全国小农协会是被纳入国家农业计划的,由全国土改委员会管理。私有农民不得不求助于政府机构供给种子、肥料、农具和提供信用贷款,并按官方定的低于市价的价格向国家(收购部门)交售部分农产品。由于政府购置农场和土地所有者退休或死亡(土地所有权不能继承),1967—71年,私有成份的规模进一步缩小(缩小到二十万零三千小农,占有耕地32%)。<sup>①</sup>此外,在一些地区收购的规模大大扩大,以致于包括全部产品(如哈瓦那的“绿色地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付给小农“租金”,并允许他为自己的消费使用农场一小块土地。1968年以前,小部分剩余农产品(这部分既不卖给国家也不是小农自己和家庭消费)大都高价卖给城市居民,他们或自己消费,或将其制作成别的商品或供服务部门使用,或拿到黑市上出售。在1968年“革命攻势”期间,政府严厉地限制这类活动,从此减少了市场上剩余农产品的买卖。小农虽然仍出售少量的东西以换取现金,但主要是以物易物,换取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产品。

1962年,当合作社改为国营农场时,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变成了国家的雇工。然而,有些是被私人农场所雇用,这些农场虽然受到政府的限制,但也还是开始兴盛起来。政府逐

---

<sup>①</sup> 有关缩小私有农业成份的材料来自何塞·阿科斯塔:《古巴的土地革命与经济发展》,载于《经济与发展》,第17期(1973年),第155—159页。

步设法减少私人雇佣劳动者的数量，从1962年的十五万人降到1966年的三万至六万人。这种情况，在1971年通过了反游手好闲法以后，发展得更快了。全国小农协会发动了一场运动，查明在私人农场半时工作或虽然全时工作但“生产率低”的大批游手好闲的人，并将他们调到国营部门。<sup>①</sup>在国营农场从事劳动的农业雇佣劳动者允许有为家庭使用和消费的小块自留地。1971年，以工人花在自留地上的时间比花在国营土地上的多为借口，取消了自留地。相当数量的农业工人（估计占总劳动力的6—10%）不愿意成为工会会员，他们持保守观点。1972年古巴工人联合会发动了一场运动，要在这样的农业工人中发展十五万会员。<sup>②</sup>

1971年底召开了全国小农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古巴革命“新阶段”和改组群众组织的一部分。关于代表大会的完整资料是无法得到的（报上只发表了卡斯特罗的闭幕词，广播了最后通过的决议）。但是，看来国家行政部门和私有农户之间以及私有农户和国营农场的雇佣工人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按照卡斯特罗所说，国家行政部门和国营农场工人“十分严厉地谴责了”私有农户，他们“被搞得狼狈不堪”。总理站在国家一边反对私有农户要求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假如一个人要使别人接受某种想法，有时必须采取粗暴手段。”<sup>③</sup>大会通过的四个主要决议暴露出会上发生冲突的主

---

① 哈瓦那电台1971年3月4日广播。

② 《古巴：工会》，第234、236页。

③ 菲·卡斯特罗：《在全国小农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1月9日，第2—4版。

要之点，也表露了代表大会怎样削弱了私有农户的地位。<sup>①</sup>

第一个决议主张逐渐将私有农户及其劳动力合并到国营部门，目的是消灭“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一切残余”。（尽管政府努力加速这一合并，但到1971年底，只有五万零五百五十六个小农，相当于总数的25%被合并到国营农场。<sup>②</sup>）决议要求这种合并将采取自愿的方式，不使用武力、暴力或强制的办法，但责成全国小农协会通过政治教育使小农确信合并的好处。

另一个决议是关于出售剩余农产品和与黑市作斗争的问题。有些小农要求代表大会废止惩办非法买卖农产品的1035号法。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个要求，而且卡斯特罗还建议对付那些不承认决议的小农：“那些从事黑市交易的个别人应该列为政治工作的对象。不肯改悔的分子，必须剥夺其一切权利，并以阶级敌人对待。”<sup>③</sup>还有两个重要的决议是关于完全纳入收购制度的私有农民的问题。为了使这些小农拿出部分时间在国营土地上劳动，代表大会决定，付给他们的“租金”不应该足以负担他们的全部生活需要。为国家而劳动的时间最终应该成为小农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在一个工人的国家里，产生一个吃租者社会阶级是不合理的”。代表大会也对分给小农以满足家庭消费的小块自留地表示了关心。虽然自留地没有取消，但代表大会说明将来自留地一定消失，小农要将全部劳动时间用在国营的土地上。

---

① 哈瓦那电台1972年1月13日广播。

② 阿科斯塔：《土地革命》，第158—159页。

③ 卡斯特罗：《在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第2—4版。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到 1975 年底，私人土地所有者的人数进一步减少到十六万二千一百二十六人，他们的耕地降到占全部耕地的 21%。<sup>①</sup> 因此，卡斯特罗在 1977 年就可以宣布：“在今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我们的国家几乎 80% 的土地在国营农场的手里，〔国营〕土地的百分比是最高的。”<sup>②</sup> 令人惊奇的是，在私人手里的五分之一的土地却生产 80% 的烟草和咖啡、60% 的蔬菜、50% 的薯类和水果、33% 的牲畜和 18% 的甘蔗。<sup>③</sup>

1977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小农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承认，根据前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战略，需要三十年才能完全将私人土地并入国营部门。为了加速将私人农场变为“农业生产的更高形式”的进程，代表大会可能仿效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力图争取自愿地把个体经营的小块土地集中起来组成合作社。每个新成立的合作社必须由农业部和全国小农协会批准。关于这个问题，卡斯特罗说，“控制是必要的，否则明天我们就可能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无法控制的合作化运动”。<sup>④</sup> 在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一个规定向合作社征税的决议，目的是为了资助国民经济和缩小合作社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差别。<sup>⑤</sup>

---

① 菲·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心报告》，第 6 版。

② 菲·卡斯特罗：《在全国小农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7 年 5 月 29 日，第 3 版。

③ 《直接来自古巴的消息》，1977 年 5 月 15 日，第 169 期。

④ 菲·卡斯特罗：《在全国小农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第 2—4 版。

⑤ 同上。



总之，没有完全纳入收购制度的小农迄今仍受到使他走这一步或将其农场合并到一个合作社里的政治压力。由于对农产品的非法交易实行更严格的制裁，小农为在市场上出售而生产剩余产品的积极性大大地降低了。另一方面，完全合并进来的小农为了越来越多地为国营土地劳动，必须逐步放弃“租金”和少在自留地里劳动。在古巴遗留下来的私有或半私有成分，它们的命运是清楚的，即全部被国营成分所吸收。

### 青年群众组织的改组

这项工作是加强群众组织这一进程的一部分。1970年曾公开承认，青年工作的放松，在政治、教育和道德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因此在青年中有“少数既不学习也不工作，或迫不得已才学习和工作的落后青年——这些人被我们社会某些阶层的最底层依然存在的旧思想所侵蚀，他们的行为是与社会主义道德相违背的。”<sup>①</sup>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海梅·克龙贝特说，这个联盟是1962年成立的，过了十年，“成员少得可怜”——二百多万青年中只有十二万盟员。<sup>②</sup>由于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没有达到提高青年的觉悟和自我约束的目的。在这一方面的失败转而又影响了如教育等其他领域。

尽管古巴革命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如，文盲率从23%减少到4%或5%，小学数目、在校学生、教职工和

---

<sup>①</sup> 海梅·克龙贝特：《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报告的摘要》，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4月9日，第2—3版。

<sup>②</sup> 同上；及哈瓦那电台1972年3月1日的广播。

毕业生人数增加了一倍，学龄儿童入学比例从56%增加到98%)，但据报道，仍存在严重的缺陷。1971年4月，在(十四岁至十六岁)学龄少年儿童总数中有三十万人既不学习也不工作。一年以后，显然是由于实行了反游手好闲法，这个数字降到了二十一万五千五百一十三人。这个数字仅相当于学生总数的12%，但随着年龄增加百分比也显著地增长(如，十四岁的学生中有23%，十五岁的有44%，十六岁的有60%)。退学率很高，在小学里，1965年入学的有79%没有读到1971年。农村地区学校的退学率(88%)比城市(66%)更高。初级中学的退学率比小学高(86%)。

对于这种现象，官方归咎于物质条件：学校设备不好，上学不方便，教师缺乏训练(小学只有39%的教师完成了学业，而中学仅有27%)。但据报道，学生上学的热情不高，或许因为他们被宠坏了：“从前是爸爸为学生付学费，后来是国家负担。许多革命的空谈，大量的政治灌输，但是人终究不是抽象的思想。大学还不如一个工厂教给人的东西多。”<sup>①</sup>卡斯特罗承认在学校中缺少系统的、不断的、每天的学习和纪律，“得奖学金的学生和一般学生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就是不愿意刻苦读书。”<sup>②</sup>

古巴革命非常强调而且作了很大的努力来吸引青年农民和工人进各种技术学校(特别是农业学校)，这一任务在六十年代中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后来这些学校在校学生的人

---

① 引自《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1月21日，第8版。

② 菲·卡斯特罗：《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同上，1972年4月16日，第2—4版。

数显著下降，1972年有些学校已经没有学生了。1971年，语言学校有二万四千零三十三名学生，而工业学校有一万六千二百零三名学生，农业学校仅有七千七百五十七名学生。卡斯特罗解释说，精神动力的观念已经破产，而又缺少物质刺激：“谁愿意到农村去工作？〔农村〕艰苦、贫困……年复一年没有变化，今天什么样，多少年后还是依然如故。”<sup>①</sup>

学生也表现出缺乏对社会主义财产的关心和责任感。据教育部长说，由于不经心，每年送到学校的书有50%丢失。卡斯特罗勃然大怒说，“当我们不得不教育我们的青年人需要关心社会主义财产时，必然是出了什么问题……游手好闲的人，不劳动的人，罪犯，是他们搞破坏。”<sup>②</sup>

青少年穿“奢华的外国流行式样的衣服”（女孩穿超短裙，男孩穿超紧身裤，留长发），听美国音乐，喜爱“颓废的”文学。在有些情况下，这些青少年“被反革命分子利用反对古巴革命”。据报道，在青年中发现娼妓和同性恋爱等“残余现象”。<sup>③</sup>1967年，全国各类犯罪活动中，未成年的人占41%；四年之后，上升到50%。<sup>④</sup>

据传闻，于1970年10月在古巴圣地亚哥奥连特大学发

---

① 同第134页注释②。

② 菲·卡斯特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第2—4版；贝拉米诺·卡斯蒂利亚，《在全国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5月9日，第4—5版。

③ 《第一次全国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宣言》，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5月9日，第4—5版。

④ 《法庭离我们人民更近了》，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69年5月11日，第7—10版；菲·卡斯特罗，《在纪念内政部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6月13日，第4、6版。

生了一起事件。显然是在一次学生集会上，四、五个参加者批评了政府的政策，并谴责卡斯特罗是独裁者。两天之后，总理来视察这所大学，召开了一次会议，同批评者之一进行了热烈的谈话。卡斯特罗离开以后，又召开了一次学生大会，开除了所有批评政府的学生。<sup>①</sup>

为了分析上述问题的根源和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在哈瓦那召开了两个全国性会议，即1971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和1972年4月召开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大会找出了以前政治工作的“严重弱点”，并发动了一场运动，吸收大批盟外青年入盟，至少对他们施加政治影响。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大会还决定提高干部和有战斗性的成员的政治水平。代表大会对儿童予以最优先的考虑，认为童年是将来发展共产主义思想的决定性阶段。青年联盟的政治工作应该在提高生产和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精心地利用物力以及在必要时加班加点等方面，“造就每个青年成为自我牺牲的战士”。此外还同意紧密配合教育部降低退学率并引导学生到最需要的地方去。青年联盟要求“尽早采取严格的革命措施”，来对付那些违反社会道德的青年，特别是那些既不学习也不工作以及那些对待社会主义财产漫不经心、马马虎虎和毫无责任感的青年。<sup>②</sup>

---

① 马丁·施拉姆，《今日古巴：大学“为所有人开放”，但是……》，载于《新闻日报》，1971年9月10日。施拉姆先生曾参观了这所大学，并就此事件与学生和教师进行了谈话。

②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宣言》，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4月23日，第7—8版。

卡斯特罗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提出了具体的措施。退学的问题可以通过“义务兵役机构”和“百年青年纵队”部分地加以解决。义务兵役机构在三年内每年约征召十万人，占十六岁至十七岁青年的三分之一，到1972年拥有三十万正规军。在1973年以前，绝大多数征召的义务兵编为“支援生产部队”。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主要在甘蔗田里），并进行军事纪律训练，有些人学了手艺。百年青年纵队是1968年组成的，征召了大约四万青年，1972年征召了约五万五千人。纵队是以军事化的旅组织起来的，从事建筑、灌溉和其他工程建设。原来组织这个纵队是打算进行为期一年的试验，但后来希望继续搞到1980年。为了解决其余的青年的问题，要把义务教育扩大到六年级以后，包括的年龄范围是（十三岁至十七岁），这个年龄的人退学率最高。要特别把这些青年集中起来，从事劳动与学习。<sup>①</sup>1973年年中宣布的三项法律，通过下面的规定，落实了卡斯特罗的某些建议：（1）支援生产部队和百年青年纵队（与其他劳动队一起）合并为“劳动青年军”，这是一个准军事组织，隶属武装部队部，专门从事农业劳动（特别在糖季）和其他“突击任务”；（2）新制定的“社会服务”计划是具有强制性的，没有当过义务兵或未曾在百年纵队服务过的毕业生必须到农村地区劳动三年；（3）既没有应征入伍也未从事过社会服务的青年将分配到劳动青年军劳动三年。<sup>②</sup>

---

① 菲·卡斯特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第5—7版。

② 劳尔·卡斯特罗：《在生产领域里正在进行的重要战斗》，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8月12日，第2—3版。

教育代表大会建议，根除“奢侈的外国服饰、习惯和行  
为”，防止“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叛逆集团”成为古巴青年的榜  
样。那些因个人“欲望与现实有矛盾”而违法或“违反社会道  
德”的少年必须拘留在校办工厂里。<sup>①</sup>两个月后，卡斯特罗提  
出，少年犯罪率高是由于少年免受刑事处分的缘故（革命前的  
刑法典对十八岁以下的青年规定了特殊的处理办法），他建议  
降低负法律责任的年龄。<sup>②</sup>遵照总理的建议，1973年5月，负  
法律责任的年龄降到十六岁。此外，对破坏国民经济的罪行、  
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和其他犯法行为，实行严厉制裁（直到无期  
徒刑）。<sup>③</sup>

可能为了防止学生中再出现造反的人，1971年年中，党  
的组织部长在哈瓦那大学宣布，建立“对不具备必要的道德条  
件的新老学生进行政治评定的标准”，而且声明，“只有革命者  
才有权受大学教育”。<sup>④</sup>

1972年末，一个同情古巴革命的美国记者问一位古巴官  
员为什么男孩子不许留长发。这位官员说，如果允许一个男  
孩子发型（或穿着或行为）与众不同，其他少年也就可以要求  
享有与众不同的权利。这就会引起争论，而我们认为这是不  
正确的。<sup>⑤</sup>

---

① 《第一次全国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宣言》，第4—5版。

② 菲·卡斯特罗：《在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第4、6版。

③ 《格拉玛报》，1973年5月26日。

④ 赫苏斯·蒙塔内：《在哈瓦那大学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于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7月11日，第4版。

⑤ 小乔·尼科尔森：《古巴内幕：一个记者的笔记，革命十四年以后》，载于  
《哈泼斯》，1973年4月，第57页。

上述1971—73年采取的措施,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些则不然。例如,据报道,1973—74年各级教育的退学率有显著的下降。<sup>①</sup>1974年4月召开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青年联盟成员增加到四十万(是1972年的三点三倍)。<sup>②</sup>但另一方面,第三次代表大会承认,在青年中仍然存在着老问题,如“思想上的严重缺点、无纪律行为、盲目地羡慕奢侈品、追求外国货,以及存在着政治破坏分子”。代表大会再次号召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抵制所有帝国主义者腐蚀〔青年〕的邪恶企图”和“最低级的资产阶级宣传放出的有毒的诱饵”。这种情况表明,消费品不足正造成囤积、不满和混乱。<sup>③</sup>

### 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与知识分子

古巴革命后的头十年,发展文化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有了显著的改进。出版书籍和杂志的数量增加了四、五倍。国家大力支持民族戏剧、电影艺术和民族芭蕾舞;修建了一个极好的造型艺术和舞蹈中心;为民族和世界文学作品比赛慷慨地提供资金;绝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得到令人满意的报酬或津贴。但取消版税;电影公司、剧院、出版社、杂志、报纸收归国有;文化、出版和电影事业集中在国家机构领导之下(分别

---

<sup>①</sup> 劳尔·卡斯特罗:《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立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4年4月14日,第2—3版;菲·卡斯特罗:《在庆祝建筑工人日大会上的讲话》,同上,1974年12月15日,第2版。

<sup>②</sup> 劳尔·卡斯特罗:《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同上,1977年4月17日,第6版。

<sup>③</sup> 安东尼奥·佩雷斯·埃雷罗:《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同上,1977年4月17日,第五版。

由全国文化委员会、图书局及古巴艺术和电影业委员会领导)；在国家主持的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的领导下，所有作家和艺术家都参加联合会组织，这就使得作家和艺术家完全依赖国家。国家运用这一权力来摆布这些知识分子：国家可以雇用或解雇他们；协助、阻碍或禁止他们的作品出版，放映他们的电影，上演他们的戏剧；开办和关闭出版社和杂志社；通过新闻工具进行评论和批评，促使作家和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革命的态度；授予他们国家奖或安排他们出国旅行以资鼓励，或把他们关在劳动营里以示惩处。

关于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卡斯特罗在1961年有一个笼统的提法：“参加革命，什么都有；反对革命，一切皆无。”1968年以前，政府对所有谨慎地不超出这些界限的人都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尽管这种平静也经常被打破。然而，在“革命攻势”期间，政府和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激烈地批判了有外国知识分子参加的评奖团主办的文学作品比赛中得奖的两位古巴作家。这两位作家是诗人埃维尔托·帕迪利亚和剧作家安东·阿鲁法特，他们都自称是革命者，但政府认为他们的作品含沙射影地批评了现政府有独裁主义性质。紧接着这一事件之后，在1969年又试图为奖励革命作品的世界文学比赛选出有战斗性的评奖团，并将一个被控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作家开除出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sup>①</sup>1970年底，卡斯特罗对“文化活动中的错误倾向”表示忧虑，

---

<sup>①</sup> 关于1959—70年事件的详情，参阅梅萨—拉戈主编的《古巴的革命变革》一书中洛德斯·卡萨尔著的关于文学的章节和胡利奥·马塔斯关于电影和戏剧的章节。



宣布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他要求马上召开，但不得不推迟到1971年4月——将成为讨论这些问题的场所。<sup>①</sup>

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2月初，一名古巴政府雇用的技术人员名叫劳尔·阿隆索·奥利维，曾被指派在迪蒙于1969年访问古巴时充当他的助手，这时被控告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入狱。对奥利维的指控是，他曾把自己调查的黑市价目表交给了迪蒙。<sup>②</sup>3月20日，诗人帕迪利亚被关进监狱。这个消息泄漏到国外后，4月9日一大批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让·保罗·萨特、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凯兹、卡洛斯·弗恩特斯、奥克塔维奥·帕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联名写信给卡斯特罗，对监禁帕迪利亚表示关切，对“用镇压的手段对付行使批评权利的知识分子和作家”表示关切。<sup>③</sup>十天之后，卡斯特罗间接地回答说：“有那么几位先生妄想施加思想影响，搞文化殖民主义……他们想从纽约、巴黎、罗马、伦敦和西柏林那些地方教训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必须毫不含糊地表示反对……不允许〔在这里〕推销和维护腐朽透顶的社会的产物——颓废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sup>④</sup>

在代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卡斯特罗抨击了“〔古巴〕文化运动中的新殖民主义分子”，他们已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

---

① 菲·卡斯特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第4版。

② 《奥利维案件》，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2月21日，第7版。

③ 《世界报》，1971年4月9日，第23版。

④ 菲·卡斯特罗：《在纪念吉隆滩胜利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5月2日，第5版。

响”，他们“奴颜婢膝地抄袭颓废艺术”。帕迪利亚向内政部递交了一份认罪书后，于4月25日被释放。两天之后，即代表大会结束的前三天，帕迪利亚向聚集在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总部的一百名作家和艺术家读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在这封信里，他承认了所有“反对古巴革命的错误”，控告迪蒙和卡罗尔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交待了他与几个联名给卡斯特罗写信的人的联系，揭发了出席会议的四名古巴作家的“错误”（一名是他的妻子，另外三名是他的亲密朋友）。其中三个被控告的作家站起来承认了错误，并请求宽恕，只有一个试图为自己辩护，断言这是假的，后来却遭到了联合会一个官员的严厉批判。<sup>①</sup>

在这不断加剧的紧张气氛中，代表大会于4月30日通过了最后宣言，提出了关于文化事业的更强硬的路线。今后，对于作家和艺术家来说，仅仅宣布自己是革命者不批评现政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创作政治性的作品来证明自己有战斗精神：“文化和教育一样，不是也不可能是非政治的或无倾向性的。非政治主义不过是文化领域里一种反动的可耻的观点。艺术是古巴革命的一种武器，一种抵制敌人渗透的武器。”宣言提出，宣传工具“是思想教育的有力手段，宣传工具的利用和发展不应靠自发或临时应付”。宣传工具不应分散在各国家机构手中，而应集中在“一个单一的政治—文化领导之下”。给

---

<sup>①</sup> 帕迪利亚关于自我批评的声明是由古巴在巴黎的通讯社拉丁美洲通讯社发表的。1971年4月29日的《世界报》和1971年5月26日的《纽约时报》都摘要刊登了这份声明。西班牙语的全文刊登在《美洲之家》，第11期（1971年），第191—203页。

宣传部门配备工作人员应该与大学和艺术协会一样，“必须考虑政治思想条件”。为了检查评奖团的革命资历和选出最革命的作品，宣言还建议修改文学作品比赛章程。宣言中有几段涉及到“外国影响”：（1）谴责那些“躲在西欧和美国等腐朽、颓废社会的首都充当帝国主义宗主国文化特务”的拉丁美洲作家（显然是指在给卡斯特罗的抗议信上签名的那些拉丁美洲人）；（2）警告说“许多假革命作家，他们在西欧冒充左派而实际上坚持反社会主义立场，这些人将被揭露”（这是针对迪蒙和卡罗尔）；（3）同“帝国主义的电影、电视和艺术”可能进行的渗透作斗争；（4）要求对邀请外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建立“严格的制度”，以免请来的人在工作和思想方面都不符合古巴革命的要求。<sup>①</sup>

所有这些建议，卡斯特罗在他向代表大会致的闭幕词中都立即采纳了。他说，要为图书局规定出版物标准和出版的先后顺序。“少数有特权的人写些没用的、颓废的东西……有时印了一些书（显而易见是指1968年出版的帕迪利亚诗集），而这些书连一本、一章、一页，甚至一个字母也不应出版！……我们的杂志只向革命的作家开门。”接着，卡斯特罗为以后的文学作品定了规则：“任何人要想当评奖团成员〔或〕获得奖励，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就是说，他必须是一个“坚定的、不犹豫的、不三心二意的”革命者。最后，卡斯特罗告诉“欧洲的假左派”和“可耻的拉丁美洲人”，他们再也不会成为评奖团的成员或古巴政府的客人

---

<sup>①</sup> 《第一次全国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宣言》，第5—6版。

了：“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帝国主义的间谍人员，现在你们知道，你们是不允许到古巴来的！我们的大门永远是关闭的！”<sup>①</sup>

5月20日，六十名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作家、电影工作者、艺术家在第二封信里回答了卡斯特罗。他们指出，只有通过折磨才可能使帕迪利亚认罪，而这使人回忆起“斯大林主义最不光彩的时刻”，包括其“教条主义的愚民政策”、“文化排外主义”以及“镇压制度”。<sup>②</sup>一周之后，帕迪利亚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认罪完全是自愿的。（然而，他在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会议上的讲话里，巧妙地提到了一个多月来他同〔内政部〕官员开的许多会，使他最后认识到应当“钦佩和喜欢”这些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卡斯特罗在一次纪念内政部成立十周年的讲话中，为国家保安人员的正直进行辩护，并且愤慨地谴责说，“有些可怜虫在国际上说一个持反革命立场的作家作自我批评是因为他在肉体上受了折磨”。接着，卡斯特罗承认，古巴革命正遭到“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立场”的攻击。<sup>③</sup>

这年夏天，一些美国学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其

---

<sup>①</sup> 卡斯特罗：《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5月9日，第7—9版。

<sup>②</sup> 1971年5月20日《世界报》和1971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这些信件和其他材料均收集在洛德斯·卡萨尔编的《帕迪利亚案件：古巴文学与革命》（纽约，新阿特兰蒂达出版社，1972年），关于此事件的精辟的分析，参阅何塞·伊格莱西亚斯，《一位古巴诗人处于困境：埃维尔托·帕迪利亚案件》，载于《纽约书评》，1971年6月3日，第3—8页。另参阅《自由》（巴黎）第1期（1971年）和（1971—72年）刊载的有关材料与讨论。

<sup>③</sup> 菲·卡斯特罗：《在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第3版。

中很多人从前访问过古巴，而且也曾期望他们再次来访，这时发现他们的签证已被吊销或根本没有从古巴拿到希望领到的签证。<sup>①</sup>秋天，一个设法进入了古巴的报界人士报道说，还有一名作家一直处于困境并且失掉了工作，但这位报界人士谈了（从与政治官员和作家会见中得到的）印象，即清洗不会再继续下去，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接受了教训，政府也想要抑制国外的不利的宣传。<sup>②</sup>美国加勒比事务专家弗兰克·麦克唐纳，曾于1970年在古巴逗留过两个月，1971年5月应邀到哈瓦那大学讲学，而且发表过一些同情古巴革命的报道，然而竟在1971年圣诞节前夕被捕了。麦克唐纳被指控为间谍（根据这一罪名可判处三十年徒刑或死刑），单独监禁了三个月，经常受到国家保安人员的审讯。他最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但被驱逐出境，他的笔记被没收，理由是他为写一本书搜集了“极端机密的社会经济情报”，因此违犯了古巴政府对这类调查实行“冻结”的规定。<sup>③</sup>

1973年，思想运动的潮水还没有减退。古巴报纸攻击由福特基金会这样一些机构主办的美国学者在拉丁美洲进行的“社会问题研究”，将这样一些活动描写成间谍活动，并谴责说

---

① 1971年6月—12月作者通过个人了解的情况。在那些被拒绝进入古巴的人中有两位著名的政治科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而另一方面，美国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却比较容易进入古巴。

② 施拉姆：《今日古巴：大学“为所有人开放”，但是……》。

③ 《美国作家描写在古巴监狱的岁月》，载于《洛杉矶时报》，1972年6月13日，第4版；弗兰克·麦克唐纳：《来自古巴监狱的报告》，载于1972年9月—73年8月的几期，由现代世界事务研究所出版。（特别参阅该刊第18期，第6—7页。）

美国日益加紧对这个地区进行“文化渗透”。<sup>①</sup>一个美国政治学家，在六十年代曾几次访问过古巴，写过一些同情古巴革命的文章，这时古巴政府也拒绝发给他入境签证，理由是他同福特基金会有关联。研究古巴爱国主义者、作家何塞·马蒂的两名美国专家，也都几次到过古巴，这时却受到古巴《大胡子鳄鱼》杂志的攻击，理由是他们的作品对何塞·马蒂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忽视了他的反帝观点，同时，这两个人还为了组织马蒂讨论会和研究所而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援助。<sup>②</sup>古巴政府还禁止广播电台转播美国和英国的流行音乐和民间乐曲（包括有反抗精神的歌曲），说这些音乐使青年产生离心倾向。<sup>③</sup>

1974—77年，随着美国总统易人，接着又出现了紧张关系缓和的气氛，先前采取的措施有一些有所松动或不再实行，古巴的广播又开始播送美国流行音乐和民间乐曲；很多美国学者又允许访问这个岛国（包括福特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的高级官员）。但是古巴知识分子和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面并没有放宽。古巴共产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艺术和文化的决议以及新的政治

---

<sup>①</sup> 奥古斯托·E·贝尼特斯，《边缘：一起社会学界的间谍案件》，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3月4日，第10版。

<sup>②</sup> 参阅比尔希略·佩雷拉和莱昂纳多·阿科斯塔：《反马蒂运动》，载于《大胡子鳄鱼》，第65期（1973年），第19—24页和第66期（1973年），第12—15页。然而在1974年7月，古巴政府却邀请了一位福特基金会高级官员访问古巴。

<sup>③</sup> 《所有的古巴电台禁放美国音乐》，载于《纽约时报》，1973年4月22日。

宪法都肯定了七十年代初期的政策。1977年，新设立的文化部领导人阿曼多·阿特在授“美洲之家”奖时说，“假如哪个评奖团授奖于一篇违反古巴利益或社会主义利益的作品，‘美洲之家’就将在拉丁美洲文学运动面前痛斥它的无耻行径。”<sup>①</sup> 1977年3月，阿特在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组成员举行的一次会上，详尽地阐述了作家在古巴革命中的作用。<sup>②</sup> 他一开始就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已经变得更加尖锐，既然文学领域也是一个战场，就希望古巴作家准备进行（而不是回避）这种思想斗争，更加关心党的路线，以工人的生活需要以及古巴革命的成就为依据，创作出“更具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接着，阿特提到“少数人”以“古巴革命的裁判员”自居，散布“异端思想”，损害了文学界，因为它“唤起了人民对作家的工作自然产生的怀疑”。然而，异端作家已“受尽了苦头”；他们“给自己出难题，〔而且〕作为作家一直未能发展”。文化部长自称他不是教条主义者，但他坚持认为：“为了发展革命文学，作家必须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一个不能深刻理解古巴革命的作家，便“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最后，阿特说，文化部要求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解决〔这些问题〕，并大力推行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原则”。他还鼓励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组织讨论会，以提高作家和艺术家的思想，并使他们“在一整套共同思想的

---

①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7年1月30日，第5版。

② 阿曼多·阿特：《在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组会议上讲话的记录摘要》，同上，1977年4月24日，第4—6版。报纸没有登载作家们的意见，只公布了阿特的答复。

基础上”团结起来。<sup>①</sup>

### 苏联式的体制化

1970—77年，在古巴政治结构中实行的变革，显示出古巴正经历一个苏联式的体制化过程，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十个特点：

1、通过分散权力，削弱政府的个人统治。六十年代盛行的迷信领袖超凡魅力和个人至上的统治制度，似乎多少已被一个与苏联极其相似的专家—官僚统治的制度所代替。

2、通过制定新政治宪法（深受苏联宪法的影响）和中央国家机构组织法以及其他立法措施，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

3、中央政府、党和军队的职能分立。在六十年代这三种机构都掌握在卡斯特罗及其核心集团手里，结果使它们的职能没有明确的界限。现在有一种明显的趋势：把这三个机构分开，给每个机构规定专门的职能。权力的中心虽有某些扩大，但仍集中在卡斯特罗兄弟手上。

4、在中央政府内，把立法和行政职能分开（过去由部长会议行使），将这两项职能分别划归新设立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国务委员会。司法现在正式由中央政府掌管。通过全国选举建立人民政权机关。每个新机构在苏联制度中都有其相对应的机构。

5、逐步建设好曾一度停滞的古巴共产党，使它有效地行使政治指导的职能。古巴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正在扩大，并正

---

<sup>①</sup> 同第147页注释<sup>②</sup>。



在接受思想灌输。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古巴共产党党纲，选出了它所有的官员。

6、军事职能集中于武装部队，武装部队实行专业化和等级化。民兵逐渐并入武装部队，并为最后取消民兵规定了时间表。武装部队的规模已经缩小，集中承担严格的军事职能，至于他们过去执行的生产任务，则交给另外一个机构。军衔经过两次改革，改变了六十年代军衔朴素的特点，采用了类似苏军的复杂的等级制度。

7、恢复并加强了工会，但是仅限于作为政府的传送带这种苏联概念的框框之内。通过地方工会的选举、全国工会的改组以及古巴工人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工人运动已经恢复活力。然而，尽管1970年说得娓娓动听，工会的首要目的仍然是在完成生产任务方面同行政合作，而不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曾许诺的工会参加企业管理一事一直限于生产问题，真正新的参加管理的职能还有待于作出安排并付诸实施。古巴工人联合会现行的章程规定，工会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虽然必须遵循党的政策），但有迹象表明，工会仍受政府控制，例如政府操纵地方工会的选举，全国工会改组以与中央各部和机构平行（这体现两者更好的结合），政府在古巴工人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或会议期间为讨论划框框。由于有了较好的身份证和档案登记制度，改进了计算产量的办法和对工人旷工的控制，国家加强了对劳动力的直接控制。

8、增加政治压力，促使私有农业加入国营部门，这一点和东欧（除波兰外）是共同的。小农协会在结构方面始终未作重大改变。但要求这个组织对其成员做政治工作，以便使他们

扩大对国家(“收购部门”)的交售量,减少供自己消费的生产,以及使他们的土地全部加入国营部门或合作社(集体农庄)。那些受私人农场主雇用的人也感到有压力,要求他们转而为国营农场服务。

9、改组主要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扩大其成员,改进对成员的政治教育,与政府共同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纠正青年工作中的错误。这些措施包括:由以军队形式组成的劳动队(如支援生产部队、百年纵队、劳动青年军)进行征召,以减少退学人数;降低犯罪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和对某些罪行实行更严厉的制裁,以打击少年犯罪行为;同西方的服饰、习惯和行为作斗争,以防在青年中出现与众不同的现象和反叛态度,加强青年的团结并使他们更加顺从。

10、使教育和文化政治化,并加紧对这方面的控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事业方面,实行更强硬的路线,以防止出现背离官方思想的偏向,要求作家和艺术家创作更富有战斗性的作品,控制西方对艺术的影响,集中控制通讯宣传工具并使之政治化。要求西方的顾问、杂志撰稿人、文学作品比赛的评奖人和来访者无条件地支持古巴革命。

1970年下半年,为卡斯特罗许诺的改革而设计的图样是,以六十年代古巴典型的动员方式,进行一场分散权力的、民主的、独立的和群众参政的运动。而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则是一个体制化倾向,其特点是,中央采取控制措施,实行教条主义和行政官僚政治,而且也 and 苏联的制度一样,对群众参政加以限制。结果不同,原因何在?

在第一章里阐述了苏联怎样扩大对古巴的影响,诱使卡

斯特罗改变他在中国—格瓦拉主义时期所热烈赞同的思想，以便使之适应传统的苏联思想。第二章以充分的证据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古巴经济结构在七十年代明显地改变了，照搬了苏联体制。将在第四章讨论的古巴对外政策的变化也显现出苏联的印记。本章所分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肯定了这样一个假设，即现在的体制化进程基本上是用苏联的模子铸出来的。

## 第四章 对外政策：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道路

古巴在六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内是与西半球其他国家相隔绝的。古巴领导人热衷于奉行游击中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的原则。为了促进大陆革命，在哈瓦那建立了一个泛美组织。政府向拉丁美洲国家派遣远征队，支持这些国家的颠覆活动和训练它们的游击队。古巴认为与那些不符合它的严格革命准则的国家没有重建关系的任何可能性，并且发起了一个激烈反对美国的运动。

在七十年代新政策的指导下，钟摆慢慢摆到另一极端：接受了走向社会主义的“非游击战”道路；向拉丁美洲输出革命的做法已变为用口头声明表示支持；与拉丁美洲十几个国家一个一个地重新建立了外交和（或）贸易关系，其中大多数都不是革命国家；在与拉丁美洲几个游击队领袖以及起义运动的关系上已经发生分歧；并且开始与美国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美洲国家组织的政策也放宽了，接受各种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并且允许其成员国与古巴重新建立关系。而美国也结束了它在越南的卷入，改善了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并和古巴互派了外交官。到1977年末，美国和古巴关系完全正常化所剩下的唯一障碍看来就是古巴在非洲的军事卷入了。

## 对拉丁美洲实行现实政治

1962年1月，美洲国家组织同意把古巴从该组织中驱逐出去，声称古巴自称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和苏联建立军事联系，这是与泛美体系不相容的。1964年7月，美洲国家组织根据委内瑞拉提供的关于古巴派遣远征队的证据，同意断绝与古巴的外交、经济和运输联系。当时，只有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反对对古巴进行制裁，但后来智利和乌拉圭也接受了美洲国家组织的这一决议。古巴则对拉丁美洲革命组织增加援助，只有通过这一办法来打破它在本半球的孤立状态。另外，在1966—67年，切·格瓦拉、雷吉斯·德布雷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宣称，“古巴式的”农村游击中心是拉丁美洲革命的唯一道路。

六十年代后期，有三起事件使古巴停止向国外派遣远征队，并且明显减少对拉丁美洲一些游击队和革命运动的援助：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之死与随之而来的游击队的失败（以及先前在阿根廷、危地马拉、秘鲁和委内瑞拉的失败）；古巴经济的恶化迫使古巴把国家的全部资源和力量集中到国内；与苏联的和解，这种和解使苏联得以对古巴施加压力，促使古巴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正常化。<sup>①</sup>七十年代初期，委内瑞拉游击队领袖道格拉斯·布拉沃谴责卡斯特罗如同三十年代斯大林在苏联的作法一样，为巩固本国的社会主义而放弃大陆革命。

---

<sup>①</sup> 参阅埃内斯托·F·贝当古，《向拉丁美洲输出革命》及欧文·路易斯·霍罗维茨，《古巴共产主义的政治社会学》，载于梅萨-拉戈主编的《古巴的革命变革》，第105—141页。

卡斯特罗总理作了回答，他为古巴“有权利也有责任”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辩护，并且警告说，将来游击队战士要想得到援助，就必须符合古巴的标准。<sup>①</sup> 1970年以来，几乎再没有听到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声音，这个组织是为促进大陆革命于1967年在哈瓦那建立的。勃列日涅夫和卡斯特罗两人在历次讲话中也都保证，古巴将不试图向拉丁美洲输出革命。

为了打破在本半球的孤立状态，也由于受到苏联的压力，古巴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日益妥协，首先接受了“进步的军事”政权，然后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最后接受了常规的军事政权和代议制民主。1969年年中，为了使拉丁美洲国家与古巴恢复关系，卡斯特罗曾提出三个先决条件：（1）拒绝美洲国家组织的制裁；（2）谴责“美国帝国主义”所犯下的反对古巴的“罪行”；（3）革命。而且他还说，古巴决不回到美洲国家组织，古巴宁愿等待，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直等到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发生暴动，建立起拉丁美洲革命国家组织。<sup>②</sup> 过了不到一年，卡斯特罗又用一个新的条件代替了所有这些先决条件，即这个国家的举动应不受美国的约束。<sup>③</sup>

秘鲁是向古巴提供机会实践其新的现实政治的第一个国家。那时，即1968年，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推

---

① 菲·卡斯特罗：《在弗·伊·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0年5月3日，第2—5版。

② 菲·卡斯特罗：《在为生产一千万吨糖举行的动员大会结束时的讲话》，同上，1969年7月20日，第5版。

③ 菲·卡斯特罗：《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报》，1970年4月23日，第2—4版。

翻了民主的、但是软弱无能的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政府，宣布进行革命，并且把美国的石油工业收归国有。从此以后，古巴和秘鲁关系逐渐热呼起来。1969年卡斯特罗称赞秘鲁的领导人，说这是一种“新现象”，即“一批进步军人起了革命作用”的现象；1970年，秘鲁发生了破坏性很大的地震，古巴为了帮助灾民，提供了慷慨的援助；1971年秋，贝拉斯科邀请一个古巴代表团出席了在利马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七十七国集团”会议；1971年后期，卡斯特罗（在他从智利回古巴途中）在利马机场稍事停留，并会见了贝拉斯科。1972年初，秘鲁在美洲国家组织中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该组织成员国可以单独与古巴重新建立关系，如果它们愿意的话。这项动议虽然没有通过。但是，同年7月秘鲁还是与古巴重新建立了关系。

1970—71年左派的托雷斯将军统治玻利维亚，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有可能仿效秘鲁的榜样，但是保守主义者班塞尔将军在1971年后期发动军事政变，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1971年以后，古巴一直在讨好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领导的军政权。他实行了几项较小的社会经济改革，并且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对美国进行挑战。1971年底，古巴海军扣了两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他们宣称这两艘船只以前曾侵入过古巴，并说其中一位船长（美籍古巴人）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美国政府表示愿意帮助巴拿马，要求古巴归还被扣船只和船长。卡斯特罗对美国这一举动立即予以谴责，说这是美国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要转移巴拿马对运河的注意力，并破坏巴拿马与古巴的关系。他请托里霍斯派一架飞

机到哈瓦那接运没有参与过侵略行动的全部船员。一个巴拿马代表团很快来到古巴，他们听取了被古巴所指控的那些船员的交待，接受了一些条件，并且赞扬了卡斯特罗，说他尊重巴拿马的主权。<sup>①</sup>1972年，巴拿马支持秘鲁在美洲国家组织中提出的动议，巴拿马空军的飞机也对古巴进行定期飞行，不但运载政治家，而且运载大学教授和学生。同年晚些时候，托里霍斯仿效古巴对关塔那摩基地的先例，拒绝收取美国每年交付的运河区的租金。1973年，巴拿马不顾美国的反对，把在运河问题上发生的争端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得到了古巴、秘鲁，苏联和中国的强烈支持。同年3月在巴拿马城举行的理事会会议期间，托里霍斯将军谴责了对古巴实行的禁运，外交部长胡安·安东尼奥·塔克宣布巴拿马不久将承认古巴。<sup>②</sup>1975年两国终于重建关系，托里霍斯将军于1976年访问了古巴。

1969年，爱德华多·弗雷的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开始与古巴进行贸易交流，并且于1970年签订了一项总额为一千一百万美元的两年贸易协定。同年晚些时候，人民阵线（即由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激进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分裂出的左派“统一人民行动运动”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的马克思主义候选人、卡斯特罗的朋友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阿连德就任后第十天，智利就与古巴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于

---

<sup>①</sup>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2月26日和1972年1月2日。1973年3月，古巴释放了最后两名出生于古巴的犯人中的一人，作为对巴拿马表示的友好姿态。

<sup>②</sup> 同上，1973年3月25日，第8—11版。



1971年初，两国签订了一个新的贸易协定（贸易额增加了六百万美元）。<sup>①</sup>1971年和1972年卡斯特罗和阿连德进行了互访。然而，1973年9月智利发生政变，成立军政府，两国关系立刻就中断了。

1971年，卡斯特罗在乌拉圭的选举中支持乌拉圭人民阵线（即广泛阵线）。这个阵线是一个比智利的人民阵线更复杂的联合阵线，它是由两个传统政党（“白党”和“红党”）分裂出的派别和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人组成，并由已退休的利维尔·塞雷尼将军领导的。非法的城市游击队运动，即图帕马罗斯，不能参加选举，同时，尽管它怀疑人民阵线能否解决问题，但是并没有反对它。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输给了执政党的保守主义候选人胡安·玛·博达维里。1972—73年，军方摧垮了图帕马罗斯，解散议会，取缔共产党，并且关上了可能与古巴重新恢复关系的大门。

1971—72年，古巴和由七十八岁的政治家、准独裁者何塞·玛丽亚·贝拉斯科·伊瓦拉领导的传统的厄瓜多尔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和解。他在任期内（以及在此以前两次担任总统的短暂时期中）没有采取过任何革命措施，但是他扣了进入厄瓜多尔单方面建立的二百海里领海内的大约五十艘美国渔船（厄瓜多尔在战略上对古巴很重要，因为预计到七十年代末它将成为拉丁美洲第二个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在柯西金总理访问哈瓦那之际发表的苏古公报中，双方都赞扬了厄瓜多尔的“自主态度”（以及巴拿马的自主态度）。

---

<sup>①</sup> 开发公司：《智利经济新闻》（1971年2月27日），第3页。

卡斯特罗在从智利回国途中，在基多机场稍事停留，并且会见了贝拉斯科·伊瓦拉及其内阁部分成员。这种友好关系在1972年初中断了，因为发生了推翻贝拉斯科·伊瓦拉的军事政变（这在他的生涯中是第三次了！）。新的军政权发表的一些声明非常谨慎，而且尽管1972年它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站在秘鲁人一边，却没有跟随秘鲁立即与古巴重建关系。1973年3月，在基多举行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会议期间，古巴代表团团长罗德里格斯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罗德里格斯·拉腊将军。当记者询问两国间是否会很快重建关系时，罗德里格斯以外交语言回答：“我们并不着急”。<sup>①</sup>

墨西哥从未接受美洲国家组织孤立古巴的决议。尽管发生过几次争端，使两国关系紧张和冷淡，但是外交关系和小额贸易一直没有中断。1972年初，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古巴实行革命接管以来，两国第一次互派了外贸代表团。古巴感兴趣的是，购买墨西哥的润滑油、工业品和药品（购买药品一事说明，苏联为在古巴建立制药工业答应提供的援助，还没有兑现），吸取在矿物和石油制品的工业加工方面的技术经验，用烟草、罗姆酒和矿产来交换。墨西哥外贸银行表示愿意资助这项生意，1973年3月签订了一项协定。两个月后，墨西哥和古巴签订了一项关于处置飞机劫持者的协定。<sup>②</sup>

六十年代后期，牙买加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入了美洲国家组织。这两个国家没有说它们不受1964年美洲国家组

---

<sup>①</sup>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4月1日，第8版。

<sup>②</sup> 《对外贸易》（墨西哥），1972年3月；《拉丁美洲》（1973年3月16日），第83页；《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6月13日，第3版。

织决议的约束，但也不与古巴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是比较合乎传统的政权，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有一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曾指责古巴训练它的一些公民进行革命战争。然而，1971—7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1971年后期，古巴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之间互派了贸易代表团，同时在1972年初，一个更加开明的党在牙买加取得了政权。1972年春，两国都投票赞成秘鲁在美洲国家组织中提出的动议，卡斯特罗对于它们的这种行动表示赞赏。同年10月在西班牙港举行的英联邦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议上，牙买加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巴巴多斯和圭亚那，巴巴多斯是在七十年代初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决定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于1972年12月执行了这个决定。1973年9月卡斯特罗对圭亚那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行了短期访问，在西班牙港会见了这四个说英语的加勒比国家的总理，对他们与古巴重建关系表示感谢。<sup>①</sup>

在阿根廷，总统亚历杭德罗·拉努塞将军就任后很快就决定进行总统选举，结果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1973年3月进行了自由选举，庇隆主义候选人埃克托尔·坎波拉博士取得胜利，并在5月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应邀参加了就职典礼，三天后阿根廷和古巴重建了外交关系。以胡安·庇隆将军取得胜利为结局的新的选举巩固了两国间的和解。同年8月，阿根廷给予古巴十二亿美元的贷

---

<sup>①</sup> 《加勒比，古巴改邪归正？》，载于《拉丁美洲》（1972年10月20日），第229页；《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12月24日，第13版和1973年9月16日，第1版。

款，以购买农业、筑路和铁路设备。阿根廷经济部长何塞·赫尔瓦德后来宣布，鉴于阿根廷对古巴的新贸易政策，美国公司在阿根廷的分公司必须进行合作。同年底，克莱斯勒—费弗雷汽车公司与古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贸易代表团开始谈判，阿根廷通用汽车公司也答应向古巴出售一千五百辆汽车。福特汽车公司很快也参加进来。于是这三家汽车公司要求美国财政部给予必要的授权，以便向古巴出售汽车。1974年初，由赫尔瓦德部长率领的包括这三个美国公司的代表的贸易代表团抵哈瓦那，并且宣布这三个美国公司将不顾美国财政部的决定如何而向古巴出售汽车。同年4月，华盛顿最后同意授权。<sup>①</sup> 尽管庇隆去世和他的夫人伊萨维利塔被军事政变所推翻以及阿根廷反共军人政权的镇压日益加剧，但是阿根廷与古巴的外交和商业关系仍然继续保持。

在中美洲也开始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1972年底，古巴派遣两个“医疗队”去帮助地震的受害者，这次地震使马那瓜遭到毁灭（耐人寻味的是古巴打开秘鲁人的门户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医疗队受到公共卫生部长的接待。<sup>②</sup> 古巴声明说，这一行动是向遭受灾害的尼加拉瓜人民表示团结，而并不意味着对尼加拉瓜独裁者小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的支持。但是，即使这种态度在三年前也是很难想象的。另一方面，当

---

<sup>①</sup>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5月20日和6月3日，第1版，及1974年3月10日，第2版；《拉丁美洲》（1973年8月31日），第280页，（1973年12月7日）第387页，（1974年3月1日）第66页；《时代周刊》，1974年2月11日，第38页；《纽约时报》，1974年4月19日，第1版。

<sup>②</sup>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1月7日，第8版。

时哥斯达黎加总统何塞·非格雷斯（卡斯特罗以前的另一个主要敌人），1973年在波多黎各古巴流亡者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劝告他们采取现实主义态度（鉴于美国与中国的和解），并且坦率考虑古巴与美国之间和解的可能性。<sup>①</sup>1973年后期，洪都拉斯与古巴重新恢复了贸易关系，签订了一项二百三十万美元的从古巴购买食糖的协定。<sup>②</sup>1977年，哥斯达黎加和古巴同意互派领事。

最后，是古巴与委内瑞拉的关系。1963年，委内瑞拉曾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进行制裁。由于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态度改变，1969年后，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拉斐尔·卡尔德拉总统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绥靖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使委内瑞拉共产党合法化，对同意尊重民主进程的积极从事革命的人实行大赦，以及缓和与古巴的紧张关系。1972年，委内瑞拉教育部和农业部的高级官员访问了古巴；进行了一些专业、学术和体育交流；古巴的新闻机构拉丁美洲通讯社可以在加拉加斯建立分社；在1963年登陆中被捕的两名古巴游击队员中的一名也被释放了。（1967年被捕的另外一名古巴游击队员于1974年初获释。）1973年初，卡尔德拉声明说，在委内瑞拉的游击队员问题已经解决，古巴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冲突已大大减少，委内瑞拉与古巴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在积极发展，委内瑞拉政府赞同古巴加入国际机构（如七十七国集团），同时，尽管委内瑞拉在下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上

---

<sup>①</sup> 古巴的流亡者对非格雷斯的建议的反应是消极的，只有几个人例外，如卡斯特罗的前财政部长鲁福·罗佩斯·弗雷斯克特，这是很有意思的。

<sup>②</sup> 《拉丁美洲》，（1973年9月7日），第28页。

不会正式提出古巴问题，但是将非正式地讨论这个问题。同年4月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是由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斯·卡尔瓦尼主持的，他对于“意识形态多元论”这一新原则的通过起了决定作用。所谓“意识形态多元论”就是美洲国家组织接受具有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sup>①</sup>就在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正在举行的同时，基督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洛伦索·费尔南德斯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从委内瑞拉向古巴运送石油的可能性问题。<sup>②</sup>卡斯特罗在1973年五一节讲话中，表示欢迎委内瑞拉最近采取步骤废除与美国的商务条约，并且宣布，如果委内瑞拉与国际石油公司发生严重争端，古巴将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不管它的经济制度如何”。这是卡斯特罗第一次这样公开讨好委内瑞拉。<sup>③</sup>同年6月，委内瑞拉向美洲国家组织提出一项动议（最后遭到失败），根据这项动议只需简单多数票（而不象以前那样需三分之二多数票）就可撤销对古巴的制裁。过了不到一个月，委内瑞拉与古巴签订了一项反劫持飞机协定。9月，卡斯特罗赞扬委内瑞拉在美洲国家组织中采取的“进步”行动，并且说，古巴将欢迎卡尔德拉总统访问哈瓦那。10月，由一名部长而且是卡尔德拉的亲密朋友率领的一个委内瑞拉官方代表团到了古巴，引起了一阵将要立即重建关系的说法。<sup>④</sup>

---

① 马文·豪：《委内瑞拉开始与古巴接触》，载于《纽约时报》，1973年4月22日，第17版。

② 《时代周刊》，1973年4月16日，第38页。

③ 菲·卡斯特罗：《在国际劳动节游行时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5月13日，第3版。

④ 同上，1973年7月15日，9月16日和10月21日。

当1973年12月反对党候选人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属民主行动党）在国家选举中当选总统时，这种热呼起来的趋向暂时停止了。佩雷斯在其政纲中对古巴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政策，但是在1974年底他与古巴重建了关系。

上述情况说明，古巴虽然遇到了一些挫折，但它却以日益妥协的态度来对待持有不同革命立场的拉丁美洲国家了，<sup>①</sup>这包括：前智利阿连德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一些自称革命但多半是改良主义的或者根本没有改变现状的国家（如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一些不侈谈革命的传统政权（如巴巴多斯、哥伦比亚、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以及保守的甚至是镇压性的军人政权（如阿根廷、厄瓜多尔）。当卡斯特罗在智利时，一个匈牙利记者问他：“你在讲话中曾多次说，实现社会主义有许多道路，在这方面你能否把拉丁美洲的情况对我们作一个概括的介绍？”卡斯特罗采取“坎廷弗拉斯的作法”（即故意造成混乱和矛盾，也就是墨西哥著名喜剧演员马里奥·莫雷诺用以摆脱困境的作法），回答说：

我不记得说过有许多道路，我也许说过不止一条道

---

<sup>①</sup> 古巴不仅仅与拉丁美洲国家，而且与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改善了关系。1970—73年间，古巴与日本、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英国、西班牙和瑞典的贸易显著增加，达到五亿比索。古巴通过出口糖、镍、烟草和罗姆酒来进口（运输、农业、工业和建筑的）设备，并接受这些国家的技术援助和贷款。参阅（斯德哥尔摩），1971年7月15日，《古巴》，巴克莱银行经济情报部出版社（伦敦），1971年12月17日，《古巴：从教条到实际》，载于《波尔沙评论》（伦敦），1972年4月，及《古巴与非社会主义世界联系扩大》，载于《拉丁美洲商情》，1972年4月20日。1971年底，卡斯特罗说，古巴正处于打破经济禁运的过程中，古巴的国外市场日益扩大，可以出售古巴能生产的所有产品。见《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1月21日，第8版及1971年11月28日，第4版。

路，这也还有待于证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被证明。另外还可能出现略有不同的新道路。……这里有一条新的道路，即智利的进程。这种略有不同的道路很可能成为某一进程的开端，但是我们不能预示它的未来，秘鲁的情况就是这样。

一位智利记者试图得到卡斯特罗更具体的说明，又问：“鉴于拉丁美洲最近十年的革命斗争经验，你认为革命中心〔即游击中心〕理论现在是服从于其他斗争形式呢，还是这种论点仍然适用？卡斯特罗使用外交手腕避而不答。<sup>①</sup>

### 与老盟友的冲突

古巴革命所实行的新现实政治引起了一系列冲突，因为抛弃了一些追随卡斯特罗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是反对本国政府的，而古巴却与这些政府实现了缓和。古巴表现的原则或思想同那些新盟友之间也有一些矛盾。正如卡罗尔所指出的那样，1968年卡斯特罗区分敌友的标准主要是看他们对苏联的态度如何。三年以后，当卡斯特罗与苏联达成妥协时，区分敌友的标准变为主要看他的盟友对美国的态度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位古巴领导人都欣然接受当时和他共同对抗其主要敌人的国家作为盟友，不管该盟友的国内制度怎样。卡斯特罗访问智利时，一位冰岛记者把这种矛盾的现象对他巧妙地提了出来：

你自称是一个革命者，但同时你又说要和任何执行

---

<sup>①</sup> 《外国记者招待会》，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2月19日，第8—9版。



独立政策〔独立于美国〕的国家建立关系。在我看来，这两种立场之间似乎有矛盾。一个可能是民族主义的立场，而另一个可能是革命的立场。如果明天你发现厄瓜多尔或阿根廷对你表示友好（而你又决定接受），那么你就会陷入象苏联援助伊朗和玻利维亚或者象共产党中国援助巴基斯坦所遇到的同样的矛盾。

卡斯特罗回答说：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准确地认识现实的观察家，而不成为一个坐在象牙塔里评价世界问题的理论家的话……你必须懂得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受条件或现实约束的原则……。如果各国政府与古巴建立关系的话，这将是今天美帝国主义最不高兴的事情，这是无视帝国主义通过其殖民机构所强加于人的协议，而美洲国家组织也就是这样的机构……。如果厄瓜多尔政府要求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的话，那是不会有矛盾的。因为我们认为其他任何分歧或其他任何问题都从属于这样一个基本点：反对美国的摆布。<sup>①</sup>

当时可能还要问的问题是：对厄瓜多尔的革命者怎样看，对厄瓜多尔和古巴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怎样看？这个冲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在秘鲁、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和其他国家实

---

<sup>①</sup> 同第164页注释<sup>①</sup>，第15版。卡斯特罗还解释说，他与佛朗哥的西班牙日益改善关系，是因为在六十年代西班牙曾反对美国施加压力孤立古巴（同上，第13—14版）。（1971年底，古巴与西班牙签署了一项新的四年贸易与支付协定，包括一项最惠国条款。）关于1971年卡斯特罗赴智利访问和在利马与基多稍事停留的详情，参阅乔治·W·格雷森：《卡斯特罗访问南美的意义》，载于《世界事务》，第135期（1972年），第220—239页。

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要不是1971年玻利维亚发生政变,使得古巴和1967年杀害格瓦拉的那支武装部队中的一个人领导的军政权之间未能和解的话,那么玻利维亚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1969年,卡斯特罗开始称赞秘鲁军政府,当时该政府仍继续关押着两名亲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战士:乌戈·布兰科(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和埃克托尔·贝哈尔。1970年底两人获释。获释以后,两人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一个反对军政府,另一个则在军政府里工作,但是两人对卡斯特罗都持批评态度。由于布兰科的坚决斗争,他在1971年9月获得了政治流亡的权利;然而他没有去古巴而是到了墨西哥。(他的目的地本来是可以由布兰科或古巴政府来决定的。)后来他接连移居阿根廷、智利,最后又回到墨西哥。布兰科曾经说,当他在领导游击队时,他没有得到古巴声称已经向他提供的人力和物力援助,而仅仅得到了哈瓦那电台的支持。现在“优秀的游击队员卡斯特罗认为,不使用武力推翻现政府也可能在秘鲁实现社会主义。”布兰科又说道,当他听到古巴电台支持“代表剥削者”的而不是真正革命的军政府时,他“丧失了信心”。<sup>①</sup>几乎与此同时,贝哈尔说秘鲁和古巴在对待连续性和变革的态度上是对立的。他说他支持本国军政府,因为它在为发展而开辟财源方面和在国家控制的程度方面采取了实际而灵活的态度。这样,秘鲁就接受了美国、日本、苏联和国际机构的经济援助,以保证国家的独立,同时在国内采取了私人提供资金的

---

<sup>①</sup> 乌戈·布兰科:《没有土地就只有死亡:秘鲁的农民斗争》(纽约,开路先锋出版社,1972年),第63、74页。另参阅《乌戈·布兰科离开墨西哥》,载于《国际新闻》,1972年7月10日。

办法，以免对人民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而且有利于增加国内的政治自由。相反，贝哈尔指出，古巴已从过去依赖美国转到依赖苏联，同时一切都实行集体化，使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并且在政治上建立了绝对的国家控制。<sup>①</sup>

在智利，左派革命运动是一个卡斯特罗派的运动，它与阿连德的阵线之间的冲突使卡斯特罗处于困难地位。左派革命运动鼓励非法占用土地，于是违背了阿连德的警告；它还要求撤销阿连德答应保留的一些机构；最后，左派革命运动要求更迅速地进行更深刻的革命变革，然而阿连德却试图巩固已有的进程。这种冲突在卡斯特罗访问智利的最后几天表现出来。卡斯特罗在抵达圣地亚哥机场时谨慎地说：“我们不把我们的革命当作一个模式……。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也不能说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如果我们对你们说：‘就照我们做的那样做吧’，那是荒谬的。”<sup>②</sup>他肯定是为了使阿连德高兴，才在告别词中说：“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传授，而是为了学习，为了观察智利发生的……一些特殊情况。这些情况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不寻常的。这是一个革命进程（以前他曾指出“一个革命进程不是一次革命”），这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在这个革命进程中，革命者们正在试图和平地进行变革。”但是另一方面（他采取了左派革命运动的立场），他直截了当地否认他到智利来是为了了解选举、议会和出版自由的情况，并且指出这是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

---

<sup>①</sup> 海因茨·鲁道夫·桑塔格，《与埃克托尔·贝哈尔的讨论》，载于《自由》（巴黎），第1期（1972年），第44—52页。

<sup>②</sup>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1月21日，第9、12版。

终是要被人民消灭的。照他所说,这些东西常常被用来迷惑、欺骗和分裂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试图把他们争取到“反革命事业”中去,以此来削弱革命力量。“在这种思想斗争中,形势对革命者是不利的;〔因为他们〕与反动势力不是势均力敌的。”卡斯特罗接着说明了反对派在智利所使用的高超技术(这种技术使他很伤脑筋,例如记者们提出一些轻率的问题,学生们提出批评),并且声称革命者在动员群众方面没有表现出什么能力(这也曾使他心烦意乱,因为只有很少的人到圣地亚哥体育场去听他的告别演说)。卡斯特罗力图使人相信古巴比智利有更大的动员能力,因为古巴有智利所没有的动员机构和手段。卡斯特罗最后说,他在智利看到的東西使他更要坚持古巴的模式。<sup>①</sup>于是,他就在最后时刻违背了关于不干涉智利内政的诺言,劝告阿连德取消所有那些形成“独特的”智利革命进程的机构,而采取国家动员的作法。

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政变,破坏了智利四十年的宪政传统,推翻了民主选举的政府,并且使阿连德送了命。这对通过民主的、和平的方法到达社会主义的企图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了卡斯特罗派的主张。关于后面这一点,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解释,阿连德的立场是唯一可以采取的立场,如果使革命激进化,只会促使军方更早地进行干涉。卡斯特罗强烈地谴责了这次政变,指责美国政府是政变的策动者,宣称阿连德是一位光荣的伟大的烈士,邀请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国家体育场智利人民为卡斯特罗举行的告别大会上的讲话》,同上,1971年12月19日,第2—4版。另参阅记者招待会,第9—11版。

阿连德夫人及其女儿访问古巴，并且发动了一个反对军政府的运动。然而，当问到卡斯特罗，古巴是否将通过输出革命的方法试图在智利重建社会主义时，卡斯特罗否认说，那种行动是不可能的。甚至更重要的是古巴官员和报刊用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基督教民主党对政变的支持，把它说成是党内个人和右派的一个决定而不是整个运动的决定。<sup>①</sup>这种谨慎态度大概是为了避免更加难堪，为了不丧失对委内瑞拉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当时古巴正在与它达成一项谅解。

古巴领导为试图挽救同墨西哥的联系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六十年代后半期，墨西哥是唯一与古巴有外交关系、航空联系和有些贸易来往的拉丁美洲国家。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墨西哥从古美关系破裂中得到直接利益：扩大了对美国的食糖出口数额。墨西哥逐渐改善了同美国人的关系，迪亚斯·奥尔达斯和约翰逊、埃切维里亚和尼克松总统间的会晤就是证明，并且墨西哥警察当局同美国情报机关合作对去古巴的旅行者进行检查（在他们护照上盖章并对他们拍照）。古巴对墨西哥的贸易额不大，而且总是有赤字。1969年，有几架墨西哥飞机被劫持到古巴，墨西哥驻哈瓦那大使馆的一名成员也被卡斯特罗指责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并且被驱逐出境。<sup>②</sup>1968年，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向政府提出抗议的数百

---

<sup>①</sup> 同第168页注释<sup>①</sup>，1973年9月23日，30日和10月7日。后面这一期刊载了卡斯特罗提供的政变详细经过。

<sup>②</sup> 古巴报刊对这些问题中的某些问题的唯一反映是《对一些墨西哥报纸的答复》，载于《格拉玛报》，1969年8月18日。另参阅帕特里夏·纳尔逊：《墨西哥—古巴关系》，载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11月11日，第4版。

名墨西哥学生被打死、打伤或被监禁；几名大学教授和知识界人士也被关进监狱。发表的新闻报道暗示，古巴是这次学生闹事的后台，这次事件被说成是破坏即将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左派的阴谋。使墨西哥左派感到沮丧的是，古巴不但没有谴责大屠杀和大规模的监禁，而且还派了运动员参加这次奥林匹克运动会。1971年，墨西哥政府破获了一个小游击中心，并且报道说，这个游击中心的成员曾通过苏联从中联系，在北朝鲜受过训练。随后，在新闻宣传运动中，有些报纸指出古巴也与此事有牵连。但是古巴人再次保持沉默，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不想影响在几个月以后互派贸易代表团的缘故。

古巴和圭亚那之间关系的建立，对反对党，即六十年代卡斯特罗的亲密朋友契迪·贾根的人民进步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几乎在建立关系的同时，一家亲政府的杂志说，因为有人盗用了卡斯特罗以前送给贾根的两千万美元的款项，所以卡斯特罗和贾根之间的友谊就中断了。<sup>①</sup>1973年9月，卡斯特罗访问圭亚那时，有人向他询问古巴对一些反动政权采取什么立场和对它们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斗争。他回答说：“需要采取什么斗争形式，这要由人民来决定，而不是由我们来决定。”<sup>②</sup>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古巴对招致不幸的弗朗西斯科·卡马尼奥·德诺上校在1973年2月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远征的谨慎态度。卡马尼奥是由于美国干涉而镇压下去的1965年多米尼加起义的领袖；1967年后他已经销声匿迹，尽管人们普遍猜测

---

① 《新民族报》(乔治敦)，1972年10月14日。

②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3年9月16日。

他在古巴。他率领一支人数很少的游击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登陆并在一周后被杀，他的游击队也散伙了。古巴报刊只报道了这个灾难性事件的经过，而且采用的是国际通讯社的电讯（例如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埃菲社），而没有表示赞同这个行动。一名幸存的游击队员和卡马尼奥的侄子逃到了墨西哥。他们说，这次远征不是从古巴而是从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岛出发的。<sup>①</sup>

卡斯特罗的下面两段话概述了目前古巴政府关于向拉丁美洲输出革命和支持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立场：

拉丁美洲任何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没有必要害怕古巴的武装力量……。古巴政府从来没有想用古巴军队的武器到本半球任何国家推进革命。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是愚蠢的，荒谬的。<sup>②</sup>

我们同情革命运动。然而，如果在一个与古巴有关系并尊重我们主权的国家里发生革命运动，尽管我们同情那个革命运动，但是我们将不给予支持。<sup>③</sup>

### 美洲国家组织内部的变化

十年来，卡斯特罗对古巴重新回到美洲国家组织的可能

---

① 古巴的报道刊登在1973年2月11日、18日和25日的《格拉玛每周概要》上。另参阅《拉丁美洲》，（1973年2月23日）第57—58页，（1973年6月1日）第176页。

② 菲·卡斯特罗：《在吉隆滩胜利十五周年主要庆祝仪式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报》，1976年4月16日。

③ 菲·卡斯特罗接见费尔南多·莫拉伊斯。《与非德尔·卡斯特罗会见四个小时》，载于《请看》（巴西），1977年7月13日，第43页。

性一直表示拒绝，憎恶美洲国家组织，说它是一个“肮脏的、讨厌的、腐败的巢穴”，是一个“丧失信誉的、令人作呕的污水坑”，是一个“美国的殖民地部”。有一次，卡斯特罗说，只有“把帝国主义者及其傀儡首先驱逐出去”，古巴才能重新回到美洲国家组织；后来他先提出由拉丁美洲革命国家组织而后又提出由拉丁美洲人民联盟来代替美洲国家组织。（请注意，1971年提出的第二个名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需要而去掉了“革命”一词。）<sup>①</sup>

在这个问题上美洲国家组织的官员们处境尴尬：他们受到卡斯特罗断然拒绝，也受到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强烈批评，同时这个地区的一些最独裁保守的国家也和强大的美国勾结起来强烈反对作任何改变。1971年11月，为了避免再出现智利那样的情况（阿连德单独与古巴重建关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加洛·普拉萨在墨西哥开始磋商关于同古巴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除公开赞成的国家支持外，他似乎还得到了玻利维亚（当时处于左派人物托雷斯的统治之下）和一些不抱偏见的民主国家的赞同。但是由于保守的军政权和美国强烈反对而停止了这个行动。<sup>②</sup>

1971年春，尼克松对中国采取的主动姿态，产生了进而对古巴采取主动姿态的可能性。美洲国家组织大多数成员国担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动员大会结束时的讲话》，第5版；《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第2—4版；《在纪念吉隆滩胜利主要活动的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5月2日，第6版。

<sup>②</sup> 本杰明·韦尔斯：《更多的拉丁美洲国家似乎都愿意结束对古巴的制裁》，载于《纽约时报》，1971年8月14日，第3版。



心失去它们的替罪羊，失去能够带来大量美援的诱饵，如同台湾一样。不抱偏见的少数国家对背着它们签订的令人难堪的古美协定表示忧虑。加洛·普拉萨急忙要求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把对古巴政策的任何变化随时通知他和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同时他重新努力在美洲国家组织范围内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妥协。古巴外交部很快拒绝了关于恢复古巴为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的任何建议，但是愿意单独与拉丁美洲国家恢复关系。临近年底的时候，秘鲁在美洲国家组织中提出一项动议，即其成员国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受约束地作出各自的决定，但后来撤回了这项动议。1972年5月，秘鲁重新提出这项动议，在美洲国家组织特别会议上，外交部长梅尔卡多·霍林将军为这一动议作了辩护。<sup>①</sup>最后表决结果（十三票反对，七票赞成，三票弃权）反映了一些料想不到的情况：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据说是赞成的）投了反对票，而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据说前者是反对的，后者是赞成的）都弃权了。<sup>②</sup>在这次会议进行的同时，卡斯特罗在索非亚发表了强硬的讲话，拒绝对古巴实行任何“中立化”，支持拉丁美洲革命，这个讲话对这次表决可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拉丁美洲在1972年下半年和1973年上半年所发生的变化，使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问题的表决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973年4月，美洲国家组织大多数成员国接受了“意识形态多

---

<sup>①</sup> 同第172页注释<sup>②</sup>；《秘鲁：结局》，载于《拉丁美洲》（1972年6月2日），第169—170页。

<sup>②</sup> 《古巴：从教条到实际》和《古巴与最近美洲国家组织的表决》，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6月18日，第12版。

元论”的新原则，同时加洛·普拉萨说，下次大会也许会撤销对古巴的制裁。<sup>①</sup>当时，美洲国家组织中有十一个国家坚决主张撤销制裁，六个国家强烈反对，而七个国家尚未明确作出决定。这是一年之内发生的显著变化，但是仍然只需要八票（成员国的三分之一）就能维持这项制裁。1973年五一节，卡斯特罗说，“意识形态多元论”新原则使得1962年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的决议（宣布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和“泛美体系”是不相容的）无效了。卡斯特罗声明说，正是美洲国家组织才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并且还表示，如果不把美国排除到美洲国家组织之外，古巴就拒绝回到该组织中来，他讲这样的话也是无助于打破僵局的。（他还增加了一个新条件：把美洲国家组织总部搬到某个拉丁美洲国家。）<sup>②</sup>

1973年6月，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委员会拒绝了委内瑞拉的一项动议，这项动议提出用十二票的简单多数而不需要用十五票的三分之二多数来撤销对古巴的制裁，并且允许每个国家单独决定关于同古巴重建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的问题。以前据说尚未明确作出决定的两个国家（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投票赞成这一修正案，从而使赞成与古巴和解的国家增加到十三个。另一方面，智利的军事政变把坚决的赞成票一下子变成了同样强烈的反对票。1974年初，美国为缓和拉丁美洲的紧张关系而采取了两个重大步骤：在没收美国资产问题上与秘鲁达成一项协议，并且在运河问题上与巴拿马

---

<sup>①</sup> 加洛·普拉萨是于1973年4月26日，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的今天和明天”的讨论会上讲这番话的。

<sup>②</sup> 菲·卡斯特罗，《在国际劳动节游行时的讲话》，第2—3版。

建立了谈判基础。同年2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泛美外长会议上，这两件事产生了明显的结果。尽管在议事日程中列上了美国的经济制裁问题，并且五个拉丁美洲国家也曾非正式要求讨论与古巴的关系问题，但是这次会议对于这个议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然而，在1974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本半球另一次外长会议上，阿根廷建议（得到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支持）邀请古巴参加将于1975年3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下次外长会议。这个建议几乎是全体一致通过的。<sup>①</sup>

1974年11月，美洲国家组织在基多开会，再次讨论对古巴改变政策的问题，但是没有取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在赞成改变政策的国家中有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有五个国家〔原文如此。——译注〕弃权（玻利维亚、巴西、危地马拉、海地、尼加拉瓜和美国），而只有三个国家投票反对（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sup>②</sup> 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不愿意再玩弄美洲国家组织的把戏，几乎立即决定与古巴重建关系。美国总统易人和不愿依赖美国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将取得必要多数的威胁日益增加，终于导致一项妥协：1975年7月29日，美洲国家组织在哥斯达黎加开会，同意对其成员国不进行约束，以便使他们能够单独决定其对古巴的政策。（这项制裁

---

<sup>①</sup> 参阅《纽约时报》，1974年4月19日，第1、12版和1974年5月6日，第8版。《格拉玛报》以积极的态度报道了此事。参阅《格拉玛每周概要》，1974年4月28日，第12版。

<sup>②</sup> 关于基多会议的详情与对会议的分析，参阅《美国—古巴和解的圆桌会议》，载于《皮特杂志》，第30期（1975年5月），第31—38页。

没有正式撤销，因为正式撤销需要得到所有赞成这项制裁的拉丁美洲国家立法机构的批准。)由于先前在基多会议上曾经弃权的四个国家：玻利维亚、危地马拉、海地和美国态度的改变而取得了多数。<sup>①</sup> (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对于古巴问题立场的改变，见表7。)

美国对古巴的态度既已改变，显然美洲国家组织也就可以使古巴问题失去“爆炸性”。尽管在哥斯达黎加会议后，本半球与古巴完全重建关系的国家再没有增加，但是，美国已经开始了与古巴和解的长期进程。

**表7 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对古巴问题的立场(1970—75年)**

立 场	1970年	1972年 5月	1973年 6月	1974年 11月	1975年 7月
赞成和解的国家	4	7	13	15	19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1	2	8	11	11
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3	5	5	4	8
犹豫不决的国家	5	3	5	6	2
反对的国家	14	13	6	3	3
合 计	23	23	24	24	24

资料来源：参看正文中的说明。

### 美国和古巴和解的条件

六十年代后期，美古关系的和解主要是个学术讨论的问题，尽管提出了几项实际的建议，但是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sup>②</sup> 然而，七十年代上半期，一个现实政治时代开始了，这个

<sup>①</sup> 参阅《纽约时报》，1975年7月30日。

<sup>②</sup> 例如，1968年，古巴科学院院长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与试图促

时代为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在美国方面，与中国达成了谅解，与苏联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而且结束了越南战争；在古巴方面，对拉丁美洲的革命输出减少了，并且对该地区的不同制度采取了更加妥协的态度。这些情况和其他一些事情使两国为谈判提出的一些条件的重要性降低了，或者使这些条件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是两国主要领导人个人之间的矛盾成了两国和解的主要障碍。<sup>①</sup>

1969年10月——鉴于拉丁美洲军事独裁政权的数目日益增加——尼克松总统实用主义地声明说，在将来，美国将根据这些国家的现实情况与它们交往。这就说明美国为什么要同巴西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和对秘鲁采取妥协政策的道理。美国官员们再没有提出以古巴社会制度与泛美体系不相容作为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理由。“泛美体系”从来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一般泛指代议制民主加上市场经济，这

---

进交换学者和出版物的美国知识分子举行了会谈；为了促进学术交流，1968—69年达成了国会图书馆拉丁美洲基金会协定和拉丁美洲研究协会的协定；1968—69年，纽约泛美关系中心为了向美国政府推荐对古巴的新政策而举行讨论会；1969年，福特基金会为在古巴进行实地考察提供了经费。另参阅约翰·N·普兰克：《我们应开始与卡斯特罗对话》，载于《纽约时报杂志》，1969年3月30日，第29页；欧文·路易斯·霍罗维茨：《美国—古巴关系：超出了隔离圈》，载于《汇刊》（1969年4月），第43—47页；理查德·法根：《美国—古巴关系》，载于耶尔·H·弗格森主编的《当代泛美关系：理论和问题文选》，（纽约，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72年），第192—230页（这是法根向1968—69年泛美关系中心会议作的报告）；豪尔赫·I·多明各斯：《驯服古巴泼妇》，载于《对外政策》，第10期（1973年），第94—116页。

<sup>①</sup> 关于美国和古巴关系的背景，参阅科尔·布莱齐尔：《肃清美国影响》，载于梅萨—拉戈主编的《古巴的革命变革》，第43—80页；爱德华·冈萨雷斯：《美国与卡斯特罗：打破僵局》，载于《外交》季刊，第50期（1972年），第722—737页。

一公式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中现在已不存在，在美洲国家组织内部则已被“意识形态多元论”这一新原则所代替。）然而，美国政府坚持它为了与古巴恢复关系而确定的其他两个先决条件：（1）断绝与苏联的军事联系；（2）停止在拉丁美洲的颠覆活动。在1970—73年整个时期中，美国总统、国务卿和负责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在对美国国会、美洲国家组织、拉丁美洲国家和新闻机构的报告中）一再重申，古巴在这两方面并没有改变其立场。<sup>①</sup>1971年，美国国务院承认“古巴对颠覆分子主动提供援助的水平明显降低了”，但是指出，古巴顽固地拒绝回到美洲国家组织中来，这就说明美国改变态度的时机并不成熟。

这种僵局由于发生了一些加剧当时紧张局势的事件而略有改变，这些事件是：把美国飞机劫持到古巴；一批古巴流亡者截获或袭击古巴渔船；1970年后期，苏联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港建立了一个潜艇维修基地；1971年底，古巴海军扣了两只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最后一件大概是所有事件中最严重的事件：美国国务院说这一事件对自由贸易和加勒比海的航行是“一个不能容忍的威胁”；来源于美国五角大楼的消息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正处于戒备状态，并且还说，如果有关国家政府提出要求的话，他们将去援助受到袭击的任何外国船只；另

---

<sup>①</sup> 例如：罗伯特·A·赫特威奇1970年2月在电视节目“鼓动者”中的讲话，1970年7月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1971年9月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以及1973年2月向国会的报告；1970年3月国务院向美洲国家组织所作的一份报告；1971年3月国务卿罗杰斯在国会的讲话；1971年7月查尔斯·阿普尔顿·迈耶对新闻界的讲话；1971年4月和1972年1月尼克松总统对新闻界的讲话。

据海军报告说，驻扎在关塔那摩（属古巴领土）的军舰将被派往加勒比海参加与古巴军舰可能发生的对抗。<sup>①</sup>

两国只在个别情况下有积极的交往，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交往是在1973年签订了反劫持协定。而这个协定也只是在1972年11月当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几乎对美古两国都造成灾难的情况下才促成的。（劫持者们威胁要让飞机在橡树岭原子中心坠毁，而且在哈瓦那着陆也引起了严重问题，因为飞机已被联邦调查局人员的子弹击伤。）两国通过瑞士驻哈瓦那大使馆立即开始讨论，并且于1973年2月15日在哈瓦那和华盛顿同时签署了这项协定。这个文件授权两国将飞机或船只劫持者驱逐出境，或者由其本国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审判。在后一种情况下，对由于“纯粹政治原因”而采取的劫持行动可考虑从轻处理，但是劫持者应具备以下条件：（1）“的确是死亡的危险迫在眉睫”；（2）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离开这个国家”；（3）没有搞敲诈勒索（通过这种手段获得的任何资金必须立即归还）；（4）对乘务员、旅客或其他人员的身体没有造成损伤。这些条件，加之美国机场对旅客的严密检查，使劫持飞机的事件大大减少。协定中另一项条款规定，对于那些策划、准备或参加远征队，以便对另一方的领土、飞机或船只进行暴力行动的人，要给予惩罚。<sup>②</sup>这显然是想要保护古巴不受流亡者的袭击，并且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项协定在美国没有得到公开宣传。

1971—72年，卡斯特罗多次谈到他提出的关于同美国和

---

<sup>①</sup>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1年12月26日和1972年1月2日。

<sup>②</sup> 同上，1973年2月25日，第3版。

解的先决条件。卡斯特罗访问智利时说，同美国达成一项谅解并不一定要求美国有一个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的政府上台，而只需要一个现实主义的政府（“有一个高瞻远瞩和通情达理的总统”），即能了解美国、拉丁美洲和世界的形势和愿望，因而能采取和平政策的政府。按照卡斯特罗的说法，尼克松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他在过去一直搞侵略，是反动的：“尼克松决不能访问古巴！”古巴将一直等到在白宫有一个合适的人就职为止。这个理想中的政府为实现与古巴的关系正常化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结束越南战争；（2）结束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宪兵作用，即是说，不能象过去那样进行任何干涉。<sup>①</sup>

1972年5月，卡斯特罗在保加利亚索非亚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否认了一条新闻报道说的他正计划在华沙会见尼克松。他说：“我们对这种会见根本不感兴趣，〔并且〕将拒绝〔这种会见〕。”他还说，古巴决不会接受美国的两项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将不作任何一点让步。”卡斯特罗的论点是，既然古巴过去能克服美国给古巴造成的最大的困难，“〔现在〕对美国作任何让步，对我们来说都将是极其愚蠢的。”他接着说：“应该由尼克松采取一些行动。”他应当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满足卡斯特罗在智利提出的两个条件：（1）结束越南战争；（2）结束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以及另外两个条件：（3）解除对古巴的经济禁运；（4）从关塔那摩撤除海军基地。卡斯特罗又说，古巴将等待两年、四年、十年，直到这些条

---

<sup>①</sup> 同上，1971年12月19日，第10—13版及乔治·纳塔森：《卡斯特罗说：尼克松不代表世界现实》，载于《美洲时报》，1972年5月13日，第2版。



件得到满足时为止；他还说，“基辛格和所有那些顾问以及‘大智囊’决不能到哈瓦那来，也决不能与我们举行任何会晤。”<sup>①</sup>

卡斯特罗在1972年7月26日的讲话中重申，古巴对“尼克松的卑劣的政治手腕和肮脏交易”将关上大门。同时，他满意地看到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出现的“美国政策的进展和新提法”，看到“总统候选人之一〔麦戈文〕赞成解除对古巴的封锁。”然而，他猛烈地攻击民主党纲领中的另一观点，即古巴不能变成苏联的军事基地。“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我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任何〔美国〕政党的纲领都没有权利确定关于古巴的各种先决条件。”最后，他重申了在保加利亚列举的关于开始与美国恢复关系的谈判所必需具备的四个条件。<sup>②</sup>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双方提出的谈判条件的有关变化。很明显，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是争论的问题，美国已把重点全部集中在对外事务上。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在过去十年中，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古巴加强了与苏联的军事和经济联系；因此，美国要求古巴对其苏联朋友关上大门，结果适得其反。如果美国不首先作出某些保证，古巴就不会与苏联断绝关

---

<sup>①</sup> 《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6月4日，第6版。两个星期以后，古巴报刊只提到第三项和第四项条件而没有提前两项条件。10月，卡斯特罗则提第一、二项条件，而没有提后两项条件。12月，他没有提第一项条件（越南战争已接近结束），也似乎愿意在第四项条件上作出让步。1973年5月，他明确地不再提第一项条件，而重申第二项和第三项条件（尽管颠倒了次序，使本国的问题优先于泛美问题），他还说第四项条件仍然有效，只是处于次要地位。

<sup>②</sup> 菲·卡斯特罗：《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十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载于《格拉玛每周概要》，1972年8月6日，第6版。

系。否则，古巴就会易于受到美国的袭击。1962年，苏古军事联系对美国的国内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但是，在导弹危机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苏联显然是履行了，苏联在西恩富戈斯建立潜艇基地的时候，它对美国作了解释。（1974年初，基辛格博士显然承认了这些事实，并且表示，美国已放弃要古巴断绝与苏联的军事联系的要求。<sup>①</sup>）美国的第二个条件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盟国的安全。然而，那些盟国为了得到更多的美援，往往夸大了实际的威胁；有的则设法（在有或没有美国援助的情况下）破获远征队或者打败来自古巴的游击队。1968年以后，古巴大大减少了对拉丁美洲输出革命的努力。由于古巴对拉丁美洲各种不同制度持日益妥协的态度——正如这份研究材料所表明的——古巴已证明它能成为一个和平的邻居。苏联对西半球古巴形势正常化的关心也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因素；<sup>②</sup>因此，苏联对古巴日益增加的影响反而有助于弥合在实现美国提出的两个谈判条件中的一个条件方面存在的差距，然而扩大了另一个条件的差距。将来美古完全重建关系时，美国的两个安全目标大概终将达到；与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和平关系

<sup>①</sup> 《欢迎勃列日涅夫》，载于《时代》，1974年2月11日，第37—38页。

<sup>②</sup> 1973年底，苏联报刊明确表示，欢迎古巴与美国和解：“甚至在美国，有些政治家和知名人士也认真地发出越来越高的呼声，认为有必要重新考虑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古巴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令人信服地说明，古巴希望和各国人民特别是和拉丁美洲人民和平友好相处。”1973年9月8日《消息报》，转引自乔治·沃尔斯基：《十五年后的古巴》，载于《现代史》，第66期（1974），第14、35页。1974年塔斯社在评论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时说，“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次访问将给西半球的政治空气带来缓和”。转引自《拉丁美洲》，（1974年2月8日），第47页。

将会增加古巴对苏联的独立性，甚至会使古巴对其邻国采取更加合乎传统的外交政策。有两个条件，起初美国并没有提出，是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增加的：一是古巴没收的美国公民的财产应予赔偿，二是要求古巴尊重人权（下文详述）。

古巴人提出的第一个条件由于越南战争的结束而实现。（卡斯特罗在1972年12月和1973年5月的讲话中就不再提这个条件了。）关于第二个条件，美国最近一次对拉丁美洲的公开干涉，是十多年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鉴于美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越南的遭遇，这种行动是否还会重演，是值得怀疑的。然而，美国对该地区暗中干涉，如同在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发生的那种情况，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1974年，在墨西哥举行的本半球外长会议上，基辛格声称，将来美洲各国关系的基础将是不干涉内政，放弃使用武力和强制手段，以及“尊重这些国家选择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sup>①</sup>只要古巴答应放弃干涉，美国也可以答应放弃干涉。关于古巴人提出的第三个条件（卡斯特罗在5月1日把这个条件提为第一个条件了，他还说，要进行任何讨论都必须先满足这个条件，并且要无条件地满足），这个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不会对美国有什么重大的不利，而且可能还有某些好处。经济禁运开始时曾给古巴造成严重问题，但是后来大部分问题已被克服。1974年初，美国政府允许其在阿根廷的汽车子公司向古巴出售小汽车和卡车，从而放宽了禁运；在1975年，又把这项措施扩大到美国在国外的所有子公司以及大部分产品。然而还存

---

<sup>①</sup> 《纽约时报》，1974年2月21日和25日，第C—14页和C—3页。

在一些困难：运费增加（古巴的主要市场从九十海里移到六千海里以外去了）；古巴通过中间人购买美国零件要付高价（据古巴人说，要多付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价钱）；运输方面存在困难（古巴的商船仅能载运古巴贸易的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东欧货物的品种比较少而且质量低（与美国相比）；并且古巴人对来自苏联集团的进口货要付较高的价格。<sup>①</sup>但是，古巴能够销售它的全部产品（实际上存在生产不足的问题），几乎也能从社会主义国家或市场经济国家买到它所需要的各种产品。禁运反而使古巴人为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好找到了借口，并且使他们以此作为宣传手段，藐视美国，说它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扼杀小国。如果放弃了这种在经济上不起作用的禁运，就可能改善美国在国外的政治形象。第四个条件是关于美国从关塔那摩撤走的问题。按军事专家们的看法，这个海军基地今天已失去战略意义，而且实际上对美国也没有必要。这个基地所具有的值得怀疑的心理价值（“尽管卡斯特罗反对，我们仍然呆在那里”）也由于它经常引起发生严重事件的危险而抵消了。（卡斯特罗似乎把这个条件放在次要地位；他在1972年12月贬低了这个条件的重要性，尽管他在1973年5月1日又重申了这个条件。因此这个条件是可以谈判的。）1974年年中以来，卡斯特罗曾多次在讲话和接见中说道，与美国谈判有一个先决条件：单方面地、完全地、无条件地解除禁运。其他条件（例如关塔那摩）没有完全放弃，但是在重要性和时间上现在都降到了次要地位。

---

<sup>①</sup> 菲·卡斯特罗在《在主要活动的大会上的讲话》（第6版）中，简单地解释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经常有人指出，卡斯特罗和尼克松的个人之间的仇恨是他们达成和解的主要障碍。卡斯特罗通常把尼克松斥之为“战犯”和“法西斯分子”，而且古巴报刊在拼写尼克松的名字时总是用H（而不是用X），以及用政治漫画嘲笑美国总统，从而使问题更加恶化。尼克松则在1959年任副总统时，就对卡斯特罗表示厌恶，而且据说他的亲密朋友查尔斯·（“贝贝”）罗伯佐（古巴移民的后裔）和尼克松的出生于古巴的侍从也经常散布这种情绪。1974年8月，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这就消除了美古和解的主要障碍。福特总统很快采取主动，经过暂时的挫折后，卡特总统进一步推进了美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 对话的开始

1974年11月，福特就任总统后刚刚三个月，美古就在纽约和华盛顿开始了秘密会谈。显然采取主动的是基辛格，而卡斯特罗则立即派出两名特使。在持续一年的会谈中，双方都提出了阐明各自立场的文件，并且就几个关键性问题进行了讨论：赔偿从美国公民或公司没收的财产，发还在美国冻结的三千万美元的古巴资产，贸易和禁运，释放政治犯，古巴家属的团聚问题，相互船舶检查权和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地位。1975年夏，为了向古巴表示诚意，美国在美洲国家组织哥斯达黎加会议上表决时改变了它的态度——从弃权改为赞成——并且由于允许在国外的美国子公司与古巴进行贸易，而部分解除了禁运。在此期间，古巴通过派遣军队和军事顾问深深地卷入了安哥拉内战（到年底为止，全部人员已达二万

二千人)，他们的武器是苏联提供的。<sup>①</sup>此外，古巴于1975年秋发起了关于支持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拉丁美洲会议。同年11月，美国泛美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D·罗杰斯向在华盛顿参加秘密会谈的古巴使者提出警告，古巴在安哥拉的军事干涉如果继续下去，将使会谈停止下来。古巴人没有答复罗杰斯，也没有再开会。<sup>②</sup>这些情况，以及在不久以后进行的总统选举中福特受到共和党右翼的攻击，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发展趋势。12月，福特总统声称，古巴对安哥拉和波多黎各采取的行动“排除了与古巴改善关系的任何可能性……终止了关于同古巴建立友好关系的任何尝试”。<sup>③</sup>菲德尔·卡斯特罗愤怒地回答福特说，古巴不能为了与美国建立关系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对外政策。使局势复杂化的是，1976年古巴流亡者袭击了一艘古巴渔船并造成几名渔民死亡；10月6日，古巴流亡者恐怖分子又在古巴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上安放了一颗炸弹，这颗炸弹在空中爆炸，造成全机人员死亡。卡斯特罗指责中央情报局卷入了在飞机上安放炸弹的行动和其他危害古巴的行动。为了进行报复，他还废除了美古反劫持协定，宣布这个协定六个月以后失效。

---

① 古巴军队在非洲的卷入不仅仅限于在安哥拉，据美国报刊报道，在索马里、莫桑比克、刚果、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南也门等国都有古巴军事顾问、游击队教练员和技术人员。（1975年11月26日的《迈阿密先驱报》就是一例。）1977年，卡斯特罗得意洋洋地用五周时间访问非洲八国时，时常接见古巴的官兵、顾问和技术人员。

② 参阅戴维·宾德：《1975年美国 and 古巴进行会谈讨论两国关系》，载于《纽约时报》，1977年3月29日，第1、8版。

③ “福特说古巴在安哥拉的活动损害了缓和以及我们与古巴的关系”，同上，1975年12月21日。

吉米·卡特当选总统打破了对话中出现的僵局。<sup>①</sup>卡特在1977年1月就职后立即中止了对古巴的侦察飞行,并且通知古巴政府,从安哥拉撤军将不成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后来,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公开声明说,美国在与古巴进行谈判方面不再坚持任何先决条件。卡斯特罗在会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比尔·莫耶斯时,回答美国的友好表示说,他认为卡特是个有道义感的人,这个人可能遵守国际原则,并且可能结束美古间长达十六年的敌对状态。然而,卡特总统在2月和3月的一系列声明中,提出了实现与古巴“关系完全正常化”的下列条件,有老的,也有新的:(1)古巴不干涉西半球国家的内政;(2)减少对非洲的军事卷入;(3)尊重人权和释放政治犯。美国总统解释说,这些是关于“完全正常化”(例如在两国建立大使馆,完全的贸易自由)的条件,而不是关于“谈判”的条件。在古巴方面,卡斯特罗重申,美国应当解除禁运,这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但不是“进行接触”的先决条件。当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公开表演这种有趣的政治双簧的时候,双方代表已经在忙于谈判两个重要协定了:一个是关于海上边界和捕鱼权协定,另一个是关于互设“照管利益办事处”的协定。现在已经公开了的会谈,是于3月在纽约开始、4月在哈瓦那继续进行的;除上面列举的这两个主要问题外,双方还讨论了古巴卷入非洲事务的问题,赔偿美国财产和尊重人权的问题。4月29日,美古签署了渔业协定;协定确定以美国和古巴海岸间的海上重叠地区的中线为边界,允许古巴渔船(经

<sup>①</sup> 本节以下所述的大部分情况来自卡梅洛·梅萨-拉戈:《1977年美国 and 古巴和解大事记》,载于《古巴研究》,第8期(1978年)。

美国许可)进入美国海域和港口,并且为美古合作进行渔业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sup>①</sup> 6月3日,美古签署了关于互设照管利益办事处的协定:每方可设一个由一名顾问为首的、由八到十名成员组成的小型代表团,美国在哈瓦那悬挂瑞士国旗,而古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悬挂捷克斯洛伐克国旗。<sup>②</sup>

为了保持这种势头,两国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步骤。美国方面:(1)国务院让禁止美国公民去古巴旅行的规定期满失效;(2)财政部批准美国访问者在古巴的费用支出;(3)对古巴学者、技术人员和艺术家给予签证的政策大大放宽了。古巴方面:(1)尽管反劫持协定已于4月15日失效,但是卡斯特罗答应继续执行;(2)释放了因贩运毒品罪而在古巴被捕的几名美国犯人;(3)卡斯特罗答应允许大约一百名美国公民的古巴人家属离开古巴与其家人重新团聚;(4)卡斯特罗和罗德里格斯对美国重要的来访者说,古巴在安哥拉的军事力量已经缩减了一半,古巴根本没有卷入扎伊尔与加丹加的冲突,而且除了回击外国军事干涉和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古巴不会再向国外派遣战斗部队;(5)古巴邀请南达科他州的一个篮球队、明尼苏达州的一批实业家以及许多美国的政界人士和学者访问古巴。1977年4月,劳尔·卡斯特罗在和美国记者谈话时说:“〔美国和古巴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正在一砖一石地重建桥梁……。如果双方都在重建这座桥梁,我们就可以在完工时握手,既没有胜利者,也

---

<sup>①</sup> 关于协定的细节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在1977年5月25日《流浪者》和1977年5月27日《纽约时报》上发表。

<sup>②</sup> 《格拉玛报》,1977年6月3日。



没有失败者。”<sup>①</sup> 这一系列事情的高潮是，1977年9月1日在华盛顿和哈瓦那正式建立了“照管利益办事处”。

将来的情况会是怎样呢？卡斯特罗和卡特两人对迅速地完全重建关系都表示了谨慎的看法。卡斯特罗在会见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巴巴拉·沃尔特斯时甚至说，他并不期待在卡特本届任期内重建美古关系，但是可能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或者更晚一些时候重建关系。这些讲话，以及美古关系没有取得明显的新进展，使得一些美国观察家认为这是关系逐渐冷淡或者将趋于冻结的迹象。反过来，也可以把这解释为良好的迹象，说明两国都理解了进程的复杂性和今后长期而艰巨的谈判的复杂性。双方都需要时间去研究形势，研究他们的谈判策略和涉及的问题，然后才能确定进一步采取什么步骤。<sup>②</sup> 但是看来已经建立了——通过照管利益办事处——继续对话的基础。

美国在1961—74年执行孤立古巴和观望的政策，使古巴革命越来越苏联化，越来越实行极权主义，结果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减少了，古巴进程固有的特点消失了。美国最初对古巴政权消极的国内方面表示关切（不管是口头的还是真正的），现在考虑的却是美国对外事务方面的利益了。美古关系的正常化可能有助于古巴获得某些独立，而且也许会使古巴人民得到更多的自由并减轻他们的经济困难。这些结果决不

---

<sup>①</sup> 转引自詹姆斯·纳尔逊·古德塞尔：《劳尔·卡斯特罗希望古巴与美国架起和平桥梁》，载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7年4月11日。

<sup>②</sup> 关于美国在以后的谈判中应采取的策略的详尽讨论，参阅作者的《美国和古巴和解的经济原因》，载于布莱齐尔和梅萨—拉戈合著的《世界上的古巴》。

是事先保证可以取得的，而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关心。如果美国决定采取主动，并且在谈判桌上不忽视古巴人民的利益，那么它就可能使目前中央集权的、教条主义的和依赖苏联的古巴政权慢慢转变成较为民主、较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以这个建议来结束这一章，在现实政治的时代，有人可能认为这个建议是相当天真的，是浪漫主义的，但是对那些梦想在明天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人来说则不然。

## 第五章 分析过去,展望未来

本书前四章叙述了七十年代古巴发生的变革,并提出了造成此种变革的一些因素。本章第一节要分析和阐明这些变化的相互关系,更明确地指出这些变化的原因。为了这个目的,采用了一个连贯的综合各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特点的模式,来分析古巴在其社会主义历史的不同时期的情况。对1968年和1973年古巴与苏联的制度也进行了对比。这一节还要讨论七十年代古巴变革的原因以及古巴可能采取的其它作法。本章的第二节试图展望一下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古巴制度的各个特点将怎样表现出来。这一展望,是根据对比1973年古巴和苏联制度的特点和假定目前两国之间差异缩小的趋势将继续下去这两个方面而提出来的。最后,还对促进或阻碍这种接近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进行了估价。

### 综合分析的尝试

我的论点是,在古巴制度的某些方面(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并不是相互无关的,也不是由孤立的互不联系的原因所引起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是由一系列互有联系的力量引起的。为了讨论和检验这些设想,我们将使用一个模式,这是我以前设计的用以进行比较并使各社会主义

制度最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特点联系起来模式。<sup>①</sup>（见表8）

这个模式是一个被“中心点”分为两个域连续统一体，它有两个相反的“极”，X（正极）和Y（负极）。每一极都代表着一个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制度，其特点是由十六对相反的变数表现出来的（例如，变数1在X极中是政治职能集中于一个集团手里，而在Y极中则是分散政治职能）。X极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特点是，强调思想发展（目标是造就“新人”，搞世界革命，等等），实行动员制度，有取消市场的倾向。在现实中，代表X极的有几个国家（例如中国、古巴），这些国家在它们历史的某些时期，曾试图越过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或者至少是打算迅速地通过这一时期），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Y极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物质发展（与理想主义目标相反的现实主义目标），政治行政管理进程体制化，有适应市场的倾向。在现实中，代表Y极的也有一些国家（如南斯拉夫），这些国家承认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并暂缓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最终目标。

在时间上（1968年年中）这是一个静态对比，因为每一个

---

<sup>①</sup> 我在《古巴的革命变革》一书的最后一章（第510—524页），首次运用这种模式的最初形式阐述和分析了1970年可供古巴选择的几种道路是否可行。我预言古巴有可能仿效苏联的经济改革制度，这已被最近这段历史所证实，并写在这本书里了。我的经过改进了的模式，以《全面对比社会主义制度的连续统一体模式》为题，发表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第21期（1973年），第573—590页。为了这个模式，我曾于1972—73年在匹兹堡组织了一个“对比社会主义制度之方法”的国际讨论会。讨论会的论文包括我自己的大大扩充了的模式，载于卡尔·贝克和卡梅洛·梅萨—拉戈合编的《对比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和经济论文集》（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中心，1975年）。

被选择的国家自从实行社会主义以来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有些国家沿着直线运动(如南斯拉夫),而另一些国家则按照循环方式运动(如中国)。因此,谈论某个国家的“一种制度”而不顾哪个时期是不合适的。例如,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时期(1918—20年)不同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28年),不同于斯大林时代(1929—53年),也不同于(1965年以来)实行经济改革制度的时期。另一方面,在第一个长期计划的最初几年中,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制度有许多特点是与斯大林制度相同的。古巴的中国—格瓦拉主义制度(1966—70年)在1968年“革命攻势”中发展到顶峰时,表现出与中国的“大跃进”制度(1958—60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68年)[原文如此。——译注]有极其相似之处。选择1968年年中进行对比,是因为模式里列举的大多数国家此时已经达到了一个时期发展的顶点,此后,运动的方向或速度便发生了变化。

在模式中所选择的十六对变数包括了各种制度中最不同的特点,而所有制度中相同的特点(如工业的集体化)则没有列在其中。对变数做了质的估价,而不是进行量的估量。(这种估价是根据发表的关于这五个国家的消息,并由大约二十个专家定的等级。)这一套变数是根据X极来判断每一种制度的极化强度,共分五个标度:2=最强;1=强;0=中等;-1=弱;-2=最弱。从一种制度的全部得分可以看出它在连续统一体中应当处于什么位置。(在模式中选择这五个国家进行对比,是因为在1968年它们的情况是两极和中心的最好的典型。)十六个“最强”级(总分为32),只有在X极所表示

的理想制度中才能取得，而在实际上接近这一制度的是中国和古巴的制度。相反，十六个“最弱”级（总分为-32），只有在Y极所表示的理想制度中才能取得，南斯拉夫与之接近，捷克斯洛伐克次之。十六个“中间”级（总分为0）形容处于完全中间的状态，苏联接近这种状态，但倾向于Y极。在连续统一体的两极上，理想制度中的每一套变数都有其内聚性。在现实制度中，变数有其相对的内聚性，也就是说，它们趋向于互相加强，并且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sup>①</sup>

模式表明1968年年中，古巴和苏联距离是多么大。前者列于二十七级，与中国处于同一级，并迅速接近X极。苏联是-2级，并慢慢离开中心接近Y极。古巴有十四个变数居最强，一个居强，两个居中间，没有弱或最弱。相反，苏联有六个变数居最弱或弱，五个居中间，五个居强，没有最强。两种制度之间距离二十九分。

在表9中，使用了同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模式，但为了简化，删去了两极和中心。此外，表8中的对比是静态的，而表9中的对比则是动态的。表9从四个阶段的高峰来探讨自1961年实行社会主义以来古巴制度的演变：1962年实行具有斯大林主义特点的苏联制度；1965年试验两种相反的制度（比较中国大跃进的制度和苏联的经济改革制度）；1968年实行中国—格瓦拉主义（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把中国的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制度应用于古巴）；1973年转向苏联的经济改革制度。在表9中对古巴的变化的估价，大致同第

---

<sup>①</sup> 关于这个设想的详尽论述参阅作者的文章：《全面对比社会主义制度的连续统一体模式》，第586—587页。

表 8 1968 年年中社会主义制度的静态对比

对 比 项 目	X 极	中 国	古 巴	中 心	苏 联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南 斯 拉 夫	Y 极
1. 政治职能集中于一个小集团超过政治职能分散	2	2	2	0	-1	-2	-1	-2
2. 动员超过制度化	2	2	2	0	-2	-1	-1	-2
3. 军队的权力超过党的权力	2	2	2	0	-1	-2	-2	-2
4. 在文化表现形式上严格控制超过灵活性	2	2	0	0	1	-2	-2	-2
5. 集中制订计划超过分散制订计划	2	1	0	0	1	-1	-2	-2
6. 国家派出管理人员超过自行管理	2	0	2	0	1	0	-2	-2
7. 在挑选管理人员上忠诚超过专长	2	2	2	0	0	-1	-1	-2
8. 公社和国营农场超过集体农庄和私营农场	2	2	1	0	0	0	-2	-2
9. 空想的产量指标超过现实的产量指标	2	2	2	0	0	-1	-1	-2
10. 资本积累超过消费	2	2	2	0	1	0	-1	-2
11. 靠预算提供资金超过自筹资金	2	0	2	0	0	-1	-2	-2
12. 精神鼓励超过物质刺激	2	2	2	0	-1	-2	-2	-2
13. 搞平均超过按等级	2	2	2	0	-1	-1	-2	-2
14. 充分就业超过高的劳动生产率	2	2	2	0	1	-1	-2	-2
15. 同外部世界隔绝超过同外部世界联系	2	2	2	0	-1	-1	-2	-2
16. 致力于世界革命超过赞成共处	2	2	2	0	0	-2	-2	-2
合 计	32	27	27	0	-2	-18	-27	-32

资料来源：根据卡梅洛·梅萨—拉戈写的《全面对比社会主义制度的连续统一体模式》，载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第 21 期（1973 年 7 月），第 573—590 页。

表9 古巴制度各阶段高峰时期以及与1973年苏联制度的动态对比

对比项目	古巴			苏联 1973年
	1962年	1965年	1968年	
1、政治职能集中于一个小集团超过政治职能分散	2	1	2	0
2、动员超过制度化	2	1	2	0
3、军队的权力超过党的权力	2	2	2	1
4、在文化表现形式上严格控制胜过灵活性	-1	-1	0	1
5、集中制订计划胜过分散制订计划	1	0	0	1
6、国家派出管理人员超过自行管理	2	2	2	1
7、在挑选管理人员上忠诚胜过专长	1	1	2	0
8、公社和国营农场超过集体农庄和私营农场	1	1	1	0
9、空想的产量指标胜过现实的产量指标	1	0	2	0
10、资本积累超过消费	1	1	2	1
11、靠预算提供资金超过自筹资金	2	1	2	0
12、精神鼓励超过物质刺激	-1	-1	2	-1
13、搞平均超过按等级	1	1	2	-1
14、充分就业超过高的劳动生产率	2	1	2	1
15、同外部世界隔绝超过同外部世界联系	1	2	2	-1
16、致力于世界革命胜过赞成共处	2	1	2	-1
合计	19	13	27	-4

资料来源：根据第一章表1和散见在本书中的其他资料。



一章表 1 中所概述的特点相符合，尽管在表 1 中它们的排列次序有所不同。

表 9 清楚地说明，1962—65 年古巴向中心转移，这样就接近了苏联的状况。1961—63 年试图把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应用到古巴，其结果是：实行中央计划；改变了以前（1959—60 年）实行的消费主义政策，以增加资本积累；在新近实现集体化的国营部门里建立了财政预算制度；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古巴革命固有的特点仍然是明显的：迷信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的领导；实行动员；军队占优势（1961 年成立的革命统一组织，1962 年就被卡斯特罗分子所控制）；空想的产量指标所反映出来的游击主义；厌恶技术专家；搞平均主义；强烈地支持大陆革命。1964—65 年，古巴由于部分地实行苏联已经试验过的经济改革，更接近于苏联，例如，实行自筹资金和权力分散的作法，其结果，在某些经济部门中也出现了比较实际的产量指标。此外，成立了古巴共产党，并同某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亲苏的共产党实行了暂时的妥协，减少了在这些国家内的游击战。

但在 1966 年实行中国—格瓦拉主义，产生了一个显著的向相反方向的转变：卡斯特罗成了古巴革命的无可争辩的理论家（在罗德里格斯被免职和格瓦拉出走之后）；着重强调动员，而若干组织机构则衰落下去（例如：党、工会、中央计划委员会）；军队极大地扩大了它的影响；一些曾经参加过关于选择制度的论战的报刊被封闭了（并采取了反对异端知识分子的措施）；虽仍保持集中制订计划，但在决策的时候，则多从政治角度考虑了（小的或部门的计划也被大的国家的计划所代替）；提出了宏大的糖的生产指标；迷恋于资本积累；取消了自

筹资金；为了造就“新人”，大讲精神鼓励和平均主义；工作定额下降，劳动生产率完全被忽视；输出革命增加了势头。

古巴脱离苏联而走向 X 极，在 1968 年上半年达到了顶点。然而，数月前切·格瓦拉之死就已决定了输出革命的命运。8 月份，卡斯特罗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改变古巴的外交政策（变数 15 和 16）；与苏联和解；对拉丁美洲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以摆脱这一岛国所处的孤立状态。尽管对外政策发生了这些变化，（变数 1 到 14 所代表的）古巴的国内政策直到 1970 年才开始改变。食糖歉收所造成的经济混乱，证明发展计划是行不通的，塑造“新人”的基础也瓦解了。古巴欠苏联的债务要用天文数字来计算，而要把这个国家从它所陷入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就迫切需要大量的援助、可行的经济计划和组织工作。苏联愿意推迟偿还债务的时间，提供更多的贷款和技术援助，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古巴的出口商品，条件是古巴必须合理地使用这些援助，必须履行在出口方面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意味着古巴的制度不得不改变成苏联的样子。卡斯特罗接受了这笔交易，这在表 9 的 1973 年栏目中已显示出来，古巴已明显地向连续统一体的中心移动：卡斯特罗的权力分散，政治职能分立（将人民社会党的老党员提升到高级职位上来）；减少动员，走向体制化；发展党；加强对思想和文化教育的控制；重新实行大的长期的技术规划；恢复工会的活力，使之能够对生产问题提出建议；强调管理技能；提出合理的产量指标，特别是糖的产量指标；减少投资的比率，相应地提高资本效能；重新实行自筹资金；恢复物质刺激；承认工资差别；关心劳动生产率，承认局部地区出现的失业现

象；宣布古巴和苏联之间在思想上完全一致，古巴成为苏联在第三世界中无条件的辩护士；通过与十几个拉丁美洲国家重建外交和（或）贸易关系和停止输出革命，摆脱了古巴被孤立的处境；创造了同美国进行谈判的条件，开始——即使勉强地——接受和平共处。1968年古巴接近X极，在连续统一体中与苏联相差二十九分，而在1973年古巴接近中心，与苏联只差十分。在1968—73年间，在连续统一体中，古巴向左移动了二十一分。（参见表9中的最后两栏，1973年古巴制度同苏联制度的比较。）

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古巴是否因为面对国外和国内战线上的失败（1967年格瓦拉之死和1970年的经济混乱），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得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地回顾一下古巴的特点是必要的。<sup>①</sup>古巴是一个缺少许多极重要资源而发展程度又低的岛国，它一贯要在经济上依赖另外一个国家。古巴外汇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糖（约占它出口商品的百分之八十），其次是烟草和镍。古巴缺少基本的能源（石油、煤或流量大的河流），它所需要的石油，大约百分之九十八仰赖进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基本上是美国或苏联提供的），主要依靠进口的物资和配件以及外国的技术援助。绝大部分制成品必须进口。尽管有好的自然环境，而且扩大了农业的基础，但由于计划的错误、不正确的鼓励、气候

---

<sup>①</sup> 本节的其余部分分析了1970年以后古巴向中心和Y极移动的原因。关于在连续统一体中社会主义制度向这一极或那一极发展的原因的概括论述，参见贝克和梅萨—拉戈合编的《对比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中我的文章，第108—115页。

的因素（飓风与旱灾）以及过度集中生产蔗糖，妨碍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因而保持较高的粮食进口比例。

六十年代初期，苏联取代了美国，提供资本、中间产品和制成品，同时，又以石油和粮食换取古巴的糖和其他原料。古巴无力扩大出口，而用自己的产品替代进口商品的可能性又小，结果同苏联的国际收支赤字不断增加。这些赤字大部分是以苏联的贷款来弥补的；1970年古巴欠苏联的外债超过三十亿美元（等于六十年代古巴每年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六十年代，由于中断了同西半球（除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外）的所有国家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因此把发展贸易和寻求外资的方向转向西半球是不可能的。在六十年代的前半期，中国的援助是少量的，1965年中国和古巴发生对抗，使得两国之间的贸易锐减。尽管在1966—68年古巴和中国的制度有相似之处，但两国之间的来往不多。在这一时期之末，中国受到了文化革命所造成的国内混乱的严重干扰。当时，西欧和日本因为知道这个岛国的偿还能力很差，它们也不愿意疏远美国，所以没有向古巴提供大量的贷款。第三世界的国家或者没有独立，或者不感兴趣，或者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援助古巴。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在1967年反对以色列的战争惨败以后，正处于混乱之中。

七十年代，以稳定的大规模的食糖生产为基础的发展计划，从理论来说，能够产生一大笔盈余，以逐步偿还苏联的债务，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使古巴增强独立性。然而，这样一个计划是否可行，事先并没有经过认真分析，而主要是由卡斯特罗个人决定的。他全面地直接地卷入了食糖生产计

划，1970年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牌，但是吃了败仗。最后的产量（八百五十万吨）和指标（一千万吨）之间的差额，恰恰是古巴（在满足国内消费和所承担的出口任务以后）开始减少外债所需的余额。此外，在七十年代，产量再超过七百万吨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在六十年代的后半期，古巴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许诺，糖的指标将会完成，他们的损失会得到补偿，到七十年代日子就好过了。所以，没有达到目标，在心理上是一个打击，同时非糖部门的生产下降也加重了这一打击。明显的结果是不满、怀疑、撤回劳动力。卡斯特罗的威望受到严重的损害，他的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作为在古巴革命中起团结作用的力量下降了。

在那个时候，美国本来可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它可以联合墨西哥、智利和秘鲁，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为古巴重新加入西半球提供方便，使古巴除苏联外还有作出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显然，在美国政府有影响的集团内对此策略曾经进行过某些考虑。（例如，1971年初，兰德有限公司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用电子计算机对若干古巴领导人进行了计算分析，按照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立场以及可能恢复邦交的态度，对他们进行了分类排队。<sup>①</sup>）然而，在那个时候，尼克松正在制订同苏联缓和的初步细节，任何使古巴中立化的行动都将严重地妨碍他的策略。对美国来说，同苏联搞缓和比使古巴中立化重要得多。最后一点是，美国人可以清楚地预见到，苏联加强

---

<sup>①</sup> 这项研究是由路易吉·R·埃瑞迪（1976年以前曾任基辛格的拉丁美洲事务顾问）、爱德华·冈萨雷斯和戴维·F·龙德菲尔德进行的。见冈萨雷斯：《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第226页。

对古巴的控制，就会使经济负担继续压在苏联的肩上（而不是压在美国的肩上），并将减少向拉丁美洲输出革命。

继续坚持中国—格瓦拉主义制度是行不通了。经济上，它会使形势更加恶化，而没有任何真正的在最后会好转的希望。政治上，将会使群众的不满情绪加剧到危险的程度，为严重的冲突或骚乱（如同五十年代德国、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情况）创造条件，最终将摧毁对卡斯特罗仅有的一点支持。实行某些经济改革以立即缓和群众的处境（如，增加消费、减少义务劳动），但仍保留古巴制度的其他特点，这种妥协的可能性也不得不排除，因为这将需要从东欧以外的国家（如美国）得到大量的经济援助，但这是办不到的。所以，看起来，对卡斯特罗来说，唯一真正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向苏联人屈服。卡斯特罗不得不放弃他的部分权力，古巴不得不放弃它的独立，但是他和古巴革命将继续下去。

### 对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展望

首先让我们设想，到七十年代末期，苏联目前这种对古巴的影响将继续下去，苏联的经济改革制度将基本保持不变。基于这两个前提，人们可以预言古巴将继续向连续统一体的中心移动，并消除同苏联的差距。利用前四章所提供的情况和表 8 中的两栏，可以初步地展望一下七十年代最后几年古巴制度的十六个特点将会如何发展。<sup>①</sup>

---

<sup>①</sup> 除极少数例外，1974年年中（在本书第一版中）使用这个模式所作的预言已在 1975—77 年实现了，因此，在这一节中已被删去了。少数证明不对的预言也被删去了。最后，增加了一些新的预言，并对少数过去的预言做了订正。

政治职能的分立和卡斯特罗权力的分散将继续下去。这位总理可能化较多的时间去外国访问，而把较少的时间用在经济决策等国内的技术问题上。减少动员和加强体制化的趋势将继续下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倾向也将继续下去。古巴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将会增加，可能扩大一般党员中工人的比例。将召开古巴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颁布党纲和各项规定。党的威信和影响将得到提高，几乎和军队一样。军队基本上将限于承担军事的职能。除小农协会以外，大多数群众组织都将扩大其成员。工会将继续保持活力，但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政府的传送带。在文化的表现形式方面，尽管增加同外部世界（特别是同拉丁美洲，也可能同美国）的交往可能产生有利于灵活性的倾向，但严格控制的局面将会继续下去。

随着 1976—80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贯彻执行，利用电子计算机，更精确的统计数字以及技术人员来加强中央计划工作的作法将进一步发展。尽管工会和工人们对于生产问题所提的建议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国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将继续掌握决定权。人民政权机关将提供群众的某些反应，并允许群众参加县和省的行政机构的管理，但基本上要受上级控制。随着会计、经济和技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其中许多人正在苏联学习）人数的增加，以及逐步以科学技术专家代替政治干部（或者政治干部提高自己的技术），将会继续强调技术。由于私有农民死亡、国家购买、扩大收购、加入合作社以及减少这一经济成分中的雇佣劳动者，私营农业将更加缩小。

确定产量指标时，将会十分谨慎，注重实际。国民生产总

值增长的比率可能比较小,然而将稳步增长,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或者说,按人口平均增长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现代化的工业部门、镍、渔业和机械化的农业将要稳步地增加产量。糖产量将为五百万至六百万吨。如果 KTP-1 型联合收割机能按预定的计划生产出来(并达到预期的效能),糖的产量将会逐渐上升,大概能达到七百万吨。其它方面的农业收成就很难说了。缩小私营农业,对农民缺少适当的鼓励,这对产量和效率来说,都会是消极的因素。投资率很可能规定在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二。制成品的消费量将会增加,如果实现食糖生产机械化和糖价回升,就将(通过增加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食品定量供应的现象。即使不在所有经济部门中也将在大部分经济部门中实行“经济管理制度”,并重新采用经济核算、自筹资金、信用贷款、利息、利润、企业之间的商业关系与国家预算。要使价格更好地调节分配,价格制度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题目,也可能需要进行改革。

物质刺激将继续实行,并同劳动技能和生产率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将货币过剩量减少到能够应付的程度,来进一步使人们的收入和消费品取得平衡。而通过扩大工资差别,用价格代替定量以及冻结(或减少)现有的、免费的社会服务事业,可能会增加不平等现象。劳动定额将在工业方面定得更加科学,从而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在非机械化的农业中,仍会面临严重的困难。将继续发给生产奖金,然而,如果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利用义务劳动和加班加点的情况就会减少。同样,如果局部范围的失业成为更加经常的现象,



就可能实行计划生育,或输出过剩的劳动力,可能输往美国。

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将重新同古巴建立外交和(或)贸易关系,其中可能有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厄瓜多尔。古巴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家领导人的互访将频繁起来。虽然古巴不可能回到美洲国家组织(除非它进行明显的改组),但古巴将加入本半球的一些机构,其中有些机构是同美洲国家组织有联系的。如果古巴不进一步卷入非洲,美国和古巴关系正常化的趋势将继续下去。如果美苏缓和继续下去,这样的正常化不会导致古巴的“中立化”,但将在贸易、贷款、石油和备件供应方面给古巴以更大的灵活性,并使古巴少支付运费。古巴同美国的经济关系恢复到什么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古巴对苏联和经互会的依赖程度。尽管古巴可能会在亚洲和非洲保留军事顾问和类似的人员,也许会有选择地往一些亚非国家派军队,但古巴将停止向拉丁美洲输出革命,并逐步接受和平共处。<sup>①</sup>

现在让我来谈一谈若干外部和内部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左右苏联对古巴的影响,也会间接地影响上述展望的精确性。为了减少对苏联人的依赖,古巴将不得不寻找另外的贷款、石

---

<sup>①</sup> 自1975年以来,卡斯特罗在安哥拉的军事卷入(变数16移向X极,向致力于世界革命的方向发展),背离了古巴制度向Y极移动的趋势,也是与在西半球继续发展和平关系背道而驰的。古巴在安哥拉的冒险,尽管从中获得了明显的政治利益(即在第三世界部分地恢复了古巴的革命形象,增强了古巴对付美国和苏联的力量),但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也有某些政治损失(即1975—76年古巴和美国友好关系的恢复停止了,也使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又产生了对古巴干涉的忧虑)。古巴在非洲的积极的军事卷入,始终是古巴和美国关系完全正常化最严重的障碍。

油和军事援助的来源，以及能取代苏联的贸易伙伴。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由于美苏缓和及古巴人对美国的不信任，美国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苏联。美国虽不能促使古巴完全不依赖苏联，它却可以帮助这个岛国减少当前对苏联的依赖程度。但是美古关系将有助于推动古巴走向 Y 极，这就是说，走向苏联推动古巴所走的同一个方向。不过，某些变数，譬如在文化表现形式的灵活性上，情况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已经排除了中国取代苏联并扭转古巴当前的发展方向的可能性。阿拉伯国家能够在石油方面取代苏联人，但是不能在资本设备、军援和其他必不可少的供应方面取代苏联。西欧虽有潜力，但是它们对充当苏联的角色不感兴趣。智利的军事政变、秘鲁的改良主义和阿根廷的保守主义，几乎完全排除了在拉丁美洲出现一个既能联合成为一个反美的轴心又能充当同苏联讨价还价的对手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可能性。在当前的情况下，拉丁美洲没有条件也不愿意取代苏联，而是忙于设法同美国签订协定，以便利用原料的高昂价格，从中获得利益。<sup>①</sup>

在国内，即使古巴的经济继续恢复，也不足以明显地减轻

---

① 古巴不顾意识形态和关系的变化继续依赖苏联，这是对拉丁美洲和北美的社会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的挑战。海略·贾格拉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古巴向社会主义过渡，使得它对美国来说是独立了，但毫无疑问，它又全面地、明显地依附于苏联了……。一个国家仅仅通过制度〔或意识形态〕的改革，不能摆脱它的依赖性，非要适当地改造结构〔“国家的生存力”〕不可。古巴由于受到孤立，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足，缺乏改造结构的条件，因此，一直存在着依赖状态。”参阅《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拉丁美洲》，载于《经济季刊》第 41 期（1974 年），第 425 页。详见海略·贾格拉布：《政治发展：一般理论和拉丁美洲情况的研究》（纽约，哈泼—罗出版公司，1973 年）。

其对苏联人的依赖程度。卡斯特罗不再享有他在六十年代所拥有的指挥一切的权力。亲苏集团和年轻一代的科学技术专家，在目前的体制化、专业化和注重实效的进程中，都是既得利益者。这些人的力量日益强大，再与苏联相结合就可能使卡斯特罗无法再度实行动员、激进化和理想主义。卡斯特罗本人是一位极其精明的政治家，现在也可能已经意识到，要保持自己的权力，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古巴革命沿着目前的道路继续前进。即使他由于在这个进程中减少了一点作用而感到不快，他也只好妥协了，因为没有适当的人能够取代苏联人。如果不发生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而这在政治上是不能排除的，我们将会看到，在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和八十年代初期，古巴将沿着上面展望的方向发展。



